

温相自选集——党史杂谈（第一辑）

原创作者：温相

目录

1. 毛泽东、周恩来关系始末
2.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重要干部使用上的交汇处
3. 毛周邓三位一体
4. 毛泽东、彭德怀与红三军团历史上的一桩公案
5.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也曾身兼数职
6. 刘少奇问牛荫冠：“什么叫流氓？”
7. 刘少奇与林彪
8. 周恩来的“双黄蛋”
9. 周恩来的“警醒”与日本人的“麻痹”
10. 周恩来的三场表演
11. 关于中央苏区肃反运动的若干质疑
12. 许继慎与白雀园肃反
13. 夏曦与“湘鄂西大肃反”
14. 党史上的“通奸往事”
15. 北京·总参·中办
16. 从对陈毅的“始乱终弃”看两段政治布局
17. “懂政治”的黄克诚
18. 关向应其人其事

19. “苦孩子”张太雷
20. “苦孩子”沈泽民
21. “抵制日货”的祖宗—方志敏
22.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李兆麟杀子
23. 义愤填膺之余—巩天民小传
24. 李涛与李荒
25. 高自立任职小考
26. 党史上两位“妨主”的“黑”秘书
27. 重读“胡风事件”
28. “蒋干宋美龄”—略谈冯雪峰
29. 宿命—翦伯赞剪影
30. 遇罗克牺牲的零意义
31. 温故斯大林
32. 斯大林不够成熟的地方
33. 斯大林他妈问：“中央书记是多大的官儿？”
34.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涵义
35. 一个上访者的足迹—胡耀邦冥诞慨叹
36. “两组一会”—“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重要的爪牙

1. 毛泽东、周恩来关系始末

举凡提及毛、周关系的，都要谈到他们各自性格特征的契合度。然而，始终没有什么人说到周恩来性格中一个特为重要却又经常被忽略的要点，即残忍。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同毛的深度契合才会导致他们几十年关系下来合作的基本态势。

至于最后二人的搏杀实际上也是在合作范围内，周恩来从不反对任何旨在维持体制的种种做法包括极端的，只是在具体操作和实施上角度有所不同而已。有关周恩来的“残忍”比较突出的几个例子就是杀害顾顺章一家（有人肯定要说那是地下斗争不得已，全然忘了蓄意伤及无辜本身就是犯罪中的极品）即著名的骇人听闻的“爱棠村事件”，长征前夕有计划地肃反，大饥荒时代的授意销毁档案，文革中的“清队”等。有人回忆，在杀害遇罗克之际，周甚至说了一句话：“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其实，一批接近周的人回忆中都有过一些相近的东西，就是说周一旦翻脸，同样是疾声厉色，毫不假以辞色的模样。但这一点貌似又被经常扭曲或者塑造为“亲者严，疏者宽”的调门以至于让它背后真正的色调给轻易的逃脱了。

何方回忆反右时期，外交部内部整乔冠华、龚澎两口子，陈毅等人上纲很高，周却不发一语，反倒是上纲很高的陈毅主张放乔、龚一马，直到这时周仍不吭气。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周曾经的秘书吴奚如下场，等等。诸如此类，几乎也很少有人去想一想，一个“身如雨点村村到，心似玲珑面面通”的人怎么会粗心大意到了如此地步？

究其根本无非是四个字“我不能倒”。如此与大毛的“朕即国家”如出一辙。还用研究吗？在杀掉顾顺章一家时，意外地留了一个活口，那就是顾的小女儿。此前，这一举动一度也让人感到周的不同凡响之处，尤其联系到文革中的“抢救运动”，那种所谓的“大树参天护英华”的手段。而说到底凡是有了这类印象的都无疑地彻底地错了。对于无关紧要的闲棋冷子，丢掉一两枚无关宏旨，反而又会“彰显”周的“情怀”，况且，顾顺章女儿和侄子的幸免于难更是周留下作为同顾顺章日后继续勾兑的一个筹码与铺垫。这对于一个长期游走政治江湖顶层的关键人物来说，简直如同 ABC 一样简易，一样必修。

事实上，毛泽东一生做类似的事也很多，最明显的是放出灾荒时期不吃肉的烟幕，在文革灾难横扫之际给福建的李庆霖寄去稿费几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等等，或者一觉醒来问问张三去哪了，李四又去哪了？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感慨“老人不多了”等等。这些举动对于他们这类“影圣”级别的人物来说，真的不值一提，如果还有人深陷其中的话，基本可以自封为“自干五”了。

长征前夕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了大批军政骨干，其后周恩来一句“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一笔带过，有人要把这笔账算在王明、博古头上，这倒也不能说冤枉他们，但周如果不直接参与不深度参与，其谁能信？所谓最高三人团，不过是“二人转”，只有博、周拿主意。其中，博古不论是资历、能力还是人脉都无法与周相提并论。这就如同日后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解放”军以上干部时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插不上嘴一样。

而且，大搬家一样的撤退这种伎俩能瞒过博古能瞒过长期典军的主任其人吗？回过头来看，毛一生做的几个最为人诟病的大勾当中，只有一个人全程参与并且负责洗地甚至擦屁股，那就是周。惟其如此，毛深忌周乃至必欲将其置于死地，也惟其如此，周才能与毛始终周旋到底并最终迫使毛几乎与之同归于尽。

毛当然知道周是靠不住的，但也知道只有周担任维持会会长才会将局面进行下去，因此，即便心中万分恼怒主任的乖觉和奸狡，也要予以容忍下去，而且某些时候还要拉拉手，表示亲密。但随着毛健康的衰弱和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感到留下周是个祸害，必须在有生之年将其除掉，这才有了后来的那一场大戏。

不过，毛还是犯了一个几乎和林彪事件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周固然死在他的前面，但也把他彻底给拖死了。为了除掉周玩弄的那些花招彻底得罪了高层仅有的一批左派大佬，包括邓和李先念在内。林生前批大毛说绝则错。这话有道理。除掉周这一幕是毛做的最绝的一件事。周之于毛不仅有恩，而且有功。这在一个习惯于人治环境下的所有人来说，这么做委实太恶了。

周留下的警卫人员高振普等人晚年在回忆录还不得不哀鸣说毛对周的关怀太晚了太晚了，虽皮里阳秋、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毛，但内中的哀怨却是人人都能

听懂的，想想看连家奴都这么个看法，更遑论他人了。正因为周有了如此结局，才让一部分人看清毛泽东、江青这对夫妇的本来面目，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再无任何人可以在他们的视线之内。这也就是毛尸骨未寒，老婆就被端掉的部分诱因。所以说，章太炎挽黄克强的那副对联的上联用在毛和周身上非常恰当：“无公则无民国”，换言之，无周则无毛。周之死日也是毛盖棺之时。

2.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重要干部使用上的交汇处——兼谈周恩来的资历

在江西中央苏区一直以来有“四大毛派”一说，指的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后来林伯渠写过一首诗，说的也是这件事：“偶忆往事便心惊，邓毛谢古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除开“四大毛派”之外，李井泉还说过一个“四小毛派”，即肖、陈、李、余。即肖劲光、陈正人、李井泉和余泽鸿。

“四大毛派”和“四小毛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当中好几个人都曾经担任过毛的秘书或者秘书长（其实也是秘书），比如李井泉，比如古柏，比如谢唯俊。

而他们的另外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中间有好几个人曾经同周恩来的关系比较密切，甚至非常密切。比如邓小平、比如余泽鸿、比如肖劲光。

从比例上说，各自同毛、周的渊源是一比一的程度。

中共“六大”以后，中央规定，军事干部的分配工作一律由周恩来统管，也就是说军事干部的去向由周来决定。肖劲光同周的渊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后来苏区黎川失守，中革军委问罪肖，乃至有处决肖劲光的动议，在关键时刻，还是周的发言解决了问题。肖劲光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不怎么提周的作用，反复称颂毛的功德，稍有党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彼时，毛已经靠边站，周的话才是“谕旨纶音”。关于这一点，官修本的《肖劲光传》中总算提了一句。比较有趣的是，肖劲光的“回忆录”中说：“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去‘红大’当教员。”事实上，这位“负责同志”就是周恩来，不知为何肖劲光隐其姓名。

余泽鸿在上海工作期间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这个角色类似于后来的中组部副部长或者秘书长，据当事人回忆，中组部兼任部长周恩来对组织部的安排首先要同秘书进行沟通，然后才能下达和下发。余泽鸿在同的周恩来的工作配合上始终深得周的满意。如果不是后来考虑到余泽鸿本人在上海的“名气”过大，是不会轻易安排他去苏区的。

至于邓小平与周的渊源已然是尽人皆知，无须多着笔墨了。

对于“四大毛派”和“四小毛派”，毛是非常看重的，文革中因激动而死的陈正人撬动了毛对于后期老干部的安排休养的闸门。而党内高层能在核心人事问题上与毛纵横交错的，也仅仅是周恩来一人而已。

所以，尽管文革的预定步骤是打倒刘少奇之后安排打倒周恩来，或可说这种步

骤从建国初期“高饶事件”中已经初露端倪。但始终未能付诸行动或者出于半流产状态，当与周的这种雄厚的资历有密切关联。

3.毛、周、邓—“三位一体”

毛周一体，难以分割，至少在毛看来也是如此，且从历史上看，没有周，岂有毛？（展开一点说，毛周邓三位一体，毛为脑袋，周为身体，邓为四肢，庶几不负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之纶音）

从红四军“七大”之后的“九月来信”到推翻项英之于“富田事变”的结论再到长征前夕劝说毛离开江西一道奔走以及遵义会议左袒毛。

就这四件事而言，件件都是有大德于毛，有大恩于毛。虽说中国传统型政治家从不论及“报恩”一说，但这些政治家至少还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实力，还要考虑利害。

当日，“富田事变”一案始终难翻，有人窃以为是为毛遮羞，可是毛已死多年，何以余威尚在？无外乎活人不愿意翻案，活人又是谁？

有一点值得琢磨，戴向青大作《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一书出版于1994年，按照惯例，该书至少应该在1993年就必须送审了。而我们都知道，邓颖超病故于1992年。天底下可有如此巧合之事？

“富田事变”是有的人一生最大的心病之一，其时能否决项英决定的无外乎三人，王明、博古以及周。而《博古传》也好，《张闻天传》也罢，都讲述了一个事实，即王明北去，中央常委人选由王明和周共同决定报请远东局，这才有卢福坦向周毛遂自荐担任总书记一事的由来。由此可见周的地位。

以周的为人精细，他岂不知长征期间中央队三人团“担架上的秘密”？那么，之前劝说毛一道长征，是否涵盖了这日后担架上的内容？

尼克松等人多描述毛、周性格迥异处，外人普遍以为有人之欲扳倒周在于周属于党内温和派云云，其实这是大谬不然，周何尝是什么“温和派”，他同毛一样，都是强硬派，只不过双簧而已。杀伐决断在周而言，一点都不差，只不过周有时候轻易不会像有的人那样一勺烩。

有人之所以想要摠倒周，核心在于周熟知有人的底细且党内再无第二人如此知情。试想，一人在漫天扯谎之际岂容深度知情者安然在侧？

1969年夏，张春桥以学习、注释《毛选》为名，召朱永嘉、肖木等人神吹“党史”，后来王知常对党史工作者们说：“你们研究了多少年的党史，还不如我这几十天知道的多。同春桥同志一起读《毛选》那些天，是我一生中得益最大的。”

再试想一下，以张春桥一个“三八式”的资格，配谈党史？他所知的那些“猛料”当然是有人告诉他的。而有人纵论党史为何挑选张春桥这样的“儿童团”？道理也是明摆着的。

1954年起草宪法时，毛发表过一个观点：“人不能想到哪儿就到那儿，得有制度；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乡下人就是乡下人，不能随便来回移动。”终毛之世，农民一直被死死地压在土地上。除了少数人因为考上大学或者提干，否则农民身份某种意义上说是世袭罔替的。毛自己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应该说他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在他的治下，中国人至始至终都在为吃饱而奋斗。

而邓则有所更动，“既让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草”在邓看来显然行不通，至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于是邓提出了“改革开放”。至今还有人拿邓当初发表的《党和国家制度》那篇文章说事，自然不排除借钟馗打鬼的道理。但要说起这篇文章代表了邓什么民主开明的思想，那可真是大谬不然了。当年邓抛出这篇文章的目的旨在消除“英明领袖”那点子残羹剩饭，这同毛大谈民主以抵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如出一辙，并非真的要在中实行什么新的主张。

邓的政策让中国人吃饱了饭，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有干部问老百姓说新

旧社会怎么对比？老百姓说旧社会我们生活的牛马不如。干部问那么新社会呢？老百姓说如了。休说是人，即便是动物，吃饱饭也是第一需要。但如果仅仅吃饱了饭或者说就为吃饱饭而生活，那也不是人。

外国的圣贤启蒙民主，而咱们中国的圣贤启蒙主民。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吃饱饭的运动也是由此而来。邓的思维其实从一件小事上便可以看出来他究竟会迈出多远的步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否定文革时，曾有人推动要求全盘否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正是这次全会为文革全面推动奠定了组织基础。但这条建议被邓否决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了全票当选的常委只有四人，分别是毛、林、周、邓。邓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层面的历史了，反右之不能客观评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后来者如以为邓如何开创一个时代云云，实在是拎着猪头跑错了庙门。

毛时代，崇尚政治说教，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大家多数比较含糊。而到了邓时代，尽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未必是存心或许残存了点“乌托邦”的原理，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批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占有改变了中国人贫富的格局。

所谓改革于今看来，毛虽然是将农民死死地压在土地上，可到底对“城里人”还没有进一步的算计，否则梁漱溟还不至于说什么工农对比有“九天九地”。而邓时代以及后邓时代，土地已经彻底地将中国所有阶层的民众死死地纳入到了计划当中，一套房子成了大多数人一生的所有追求和梦想。年轻时买房还贷，中年时拆迁买房，老年时卖房供儿。从上古时代就被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境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终于成了现实。

在毛邓纵横捭阖的中间穿插了周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所谓“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周恩来多年以来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这个定位，他让所有的人或者说多数人充分理解上面的意图，你有委屈你有抱怨你有反抗你有抵触，经过周的安抚，剩下的只有执行。文革中陈毅抱怨乱，周说有主席掌舵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陈毅马上不吭气了。周“传教布道”，像一位风尘仆仆的牧师，既令上层一大批人为之感动，也让下层几乎所有人涕零。在周死后，长安街大家集体送别，其实周并没有走远，他的空间很快被其他人或者其他条款、政策所填补，只不过不再由一个人独立完成这么高难的演出。看看去年央视黄金时段推出的电视剧《营盘镇警事》便可知道，周的身影已然下乡了。

4. 毛泽东、彭德怀与红三军团历史上的一桩公案

1965年5月24日，汪东兴在饭后的一次闲谈中问起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构成。毛泽东告诉他，井冈山的红军由四支部队组成，一支是他自己率领的秋收起义的人马，一支是王佐、袁文才的土著武装，一支是朱德、陈毅带过来的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的部队，还有一支则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的队伍。以后，红四军主力开往赣南、闽西，留守井冈山的就剩下了彭德怀和王佐、袁文才。

毛的这番话基本勾勒出井冈山武装即“朱毛”红军的原型。虽然这四股力量以“朱毛”为简称或代表，但细究起来，冠以“朱毛彭”红军也不为过。1928年1月，《江西省委报告》称：“加强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会同袁文才、毛泽东两部（有二千余人武装）农军及朱德部武装暴动，占领西南各县，形成割据局面。”由是可知，当时袁王（袁文才、王佐）以及毛所部的人数在二千人上下。而彭德怀在1928年7月发动“平江起义”时麾下已然拥兵2500余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会有：“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一类的说法。

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从成立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辛酸的过程。内中很多情节虽不乏为岁月所湮没者，但其顽强的折射出的信息至今不免令人掩卷长思。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平江暴动所部与朱德、毛泽东会师。彭部由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三十团，红五军番号取消，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身份兼任三十团团长。彭与朱毛虽系首次见面，却非常高兴。高兴之余，他慷慨地将红五军在万载地区的筹款以及各种物质毫无保留地转赠给了红四军和地方党委。本来红五军到井冈山的任务是联络红四军，联络后需要返回湘鄂赣。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前委）作出决议希望红五军留下镇守井冈山。从组织系统上说，彭德怀并没有一定要听命于红四军前委的责任。而且，彭德怀本人也认为红五军初来井冈山，情况不熟悉，守山不适宜。可红四军前委坚持要求彭德怀留下来，彭出于大局观念，说服了自己和红五军其他干部，挑起留守的重担。

1929年4月上旬，当彭德怀向红四军前委汇报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时，毛泽东提出，当初让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是不应该的。5月间，红五军扩编为红四军第

四、第五两个纵队。由于在撤离井冈山过程中，红五军受到严重的损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划拨一部分干部和武器弹药充实到红五军中去。可是，林彪却故意给红五军拨了一批坏枪。而这仅仅是彭德怀他们遭遇磨难的一个小小的开头。

1929年7月上旬，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中共永新县委和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上，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要攻打安福，解决给养问题。彭德怀以安福城高易守等客观事实反对邓乾元的意见，随即遭邓乾元等人的否决。晚年的彭德怀回忆到此还不无沉痛地说：“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彭德怀发动平江兵暴依靠的是四个重要的助手，即黄公略、邓萍、贺国中、李灿。安福一战，贺国中、李灿一死一伤，（李灿后因伤势复发赶赴上海治疗，在上海被捕，旋即被处决。）尤其是贺国中的死，彭德怀久久难忘。20世纪五十年代，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在北京街头散步，偶遇一人相貌非常接近贺国中，彭德怀一再对浦安修说：“这个人长得太像贺国中了，可以拿他当模特画一幅像留作纪念。”

安福一战的经验教训还没有来得及总结。邓乾元就给中共中央写去了一份《湘赣边界特委报告》，正是这份报告引来了中央巡视员潘心元（又作潘心源，化名彭清泉），而潘心元肩负着“彻底解决袁王问题”，从而酿就了袁文才、王佐的悲剧。

1929年10月，奉命赶往鄂西的邓乾元联络宜昌暴动部队未果，转而同程子华接上了头，进而部分地参与了大冶兵暴。大冶兵暴的果实被编入红五纵队，邓乾元得任红五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再度与何长工搭班子。本来大冶兵暴的人马的入伙无疑壮大了红五军的力量，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红五军历史上一桩政治公案的发轫。

1930年7月上旬，新组建不久的红三军团军前委书记彭德怀与刚刚履新的红八军政治委员、军委书记邓乾元在是否攻打长沙一事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邓乾

元则要求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攻打武汉。当时是李立三暂时主持中央工作，冒险主义占了上风，攻打武汉也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钟期光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就直言不讳地评价邓乾元“是个文人，不懂军事”。相比钟期光，被邓小平称之为“懂政治”的黄克诚对邓乾元的评价就温和得多。黄克诚说：“邓乾元既有文化水平，又有相当的工作能力，是位很能干的干部，只是思想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太深……”但黄克诚也同时回忆说：“会上，一部分同志，尤其是红八军的同志，极力主张按照中央的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彭德怀没有接受邓乾元等人的意见，继续率部攻打长沙，一举将其攻克，史称“一打长沙”。“一打长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共产国际给予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对来访的斯诺说“一打长沙”是“对全国革命运动的反映是非常大的”。直到1944年延安整风时期，周恩来还在报告中如此评价“一打长沙”——“1930年红军打下了长沙。不管红军打长沙的政策对不对，但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游击战争处在高潮中。”

长沙是1930年7月27日被攻克的。8月上旬，彭德怀以红五军殿后，率领三军团和大批长沙群众向浏阳方向撤退。撤退到浏阳的当晚，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彭德怀要求红八军继续前进三十里，让红五军在浏阳修整，红八军代军长何长工强调八军连日来劳累，已经休息了，可否延迟到次日拂晓再行出发，军团部不同意，何长工则坚持要八军休息到次日拂晓。可是次日一早，军团部传来命令，以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不服从命令，撤销其政治委员职务。以上过程是中共党史学会为邓乾元撰写个人传记时留下的内容。

作为这一突发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的何长工在回忆录中如此提及：“我们决定第二天拂晓再走，军团却要我们继续前进，让五军在浏阳宿营。我估计敌人在晚上一般不敢轻易行动，于是就让邓乾元同志去军团请示，让部队休息半夜，拂晓再走。邓回来说彭德怀不同意，让八军再前进15公里。这时部队已熟睡，我也睡得迷迷糊糊地说，还是休息到明天拂晓再走吧，出了事我负责。没想到第二天竟突然下命令撤销邓乾元政治委员职务，并派来保卫队缴了他的枪，牵走了他的马，说是因为昨天夜里不执行命令。弄得我当时也心里紧张，惶恐不安，心想不知会对我怎么办，下面部队也有议论。但我知道彭德怀同志的个性，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说服部队要执行命令，不准随便议论，就带领部队继续向平江前进了。记得当时部队很疲劳，处理此事军团没有开什么会议。”

《何长工回忆录》中的这段回忆与中共党史学会编撰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之《邓乾元传》里转引的何长工的《红三军团的建立与两战长沙》一文颇有出入。据该传转引何长工的话是：“虽然那天晚上和军团领导吵了几句嘴（以后才知道），未坚决执行命令，是不对的。但军团部当时也没开什么会，把问题讲清楚，就撤销他的职务，并缴枪牵马，此事处理得过于草率。以后并说，八军当晚开会要和五军分家等，我和健在的八军几位老战友都不知道有这个会。”

这两份均源自于何长工的回忆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处。共同点都是说邓乾元被军团部领导缴枪牵马且无会议决议。不同处是说邓乾元同彭德怀吵了嘴。而问题的实质则在于“分家”一说，即俗称的“分裂”。那么，彭德怀是不是仅仅会因为邓乾元同他吵了嘴便“不教而诛”呢？彭德怀到底因为什么同邓乾元吵了嘴？何长工他们几个健在的红八军的老人没有听说过邓乾元开会闹分家是不是就等于并无此事了呢？我们再来看其他相关资料的披露。

先来看所谓“吵嘴”，何长工回忆的吵嘴原因是红八军是否开拔。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据《彭雪枫传》披露，8月5日，红三军团到达浏阳东乡，因分配住房问题，邓乾元与彭德怀发生争执，受到彭的批评的邓乾元提出“五、八两军分家”，声称“脱离前委的指挥”。8月6日又擅自召开红八军军委扩大会议，并写信给红三军团前委，提出“与红五军的关系，在手续上要弄一个清楚，前委可派人出席，我们要马上行动了。”关于这一点，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的《彭德怀全传》中也予以确认。据该全传转引彭德怀在1970年写的《第三次简历材料》中所载，1930年8月7日，邓乾元给红三军团前委去信，指责彭德怀反对中央攻打武昌，有宗派主义，还责问彭德怀为何“红五军走在前头，撤出长沙时又走在后头”；又指责彭德怀“军阀出身，政治不可靠”。邓乾元还进一步地在红八军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红八军脱离红三军团，单独向鄂东南活动。

袁国平的妻子、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邱一涵于1945年2月5日发表在《拂晓报》上的回忆彭雪枫的文章《忆彭师长、学彭师长》说：“早在长沙时，红八军一部分领导干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他们为着许多生活上的琐事无原则纠纷，散布对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的不满，诬指彭德怀同志有部落观念。……以后他们竟又发展到要和五军分家，走上完全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道路。”

另据时任支队政治委员（拟任纵队政委）的黄克诚回忆：“途经浏阳古港时，彭德怀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撤了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的职务。因为邓乾元同志要率红八军单独行动，彭德怀同志对此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了红八军的一些同志，邓乾元原是湖南大学的学生，既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又有相当的工作能力，是个很能干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太深，又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他的这种盲动观点对部队影响很大。为了统一对部队的指挥，彭德怀同志只好不准他带兵了，过了不久，邓乾元同志调任红三军团秘书长。”

黄克诚的回忆虽然含蓄，可也到底指出了邓乾元的观点已经影响了部队且上升到了对部队的统一指挥的大问题大原则。

接下来我们再看“开会”，何长工在两段有出入的回忆中都提到“军团没有开什么会”。其中，《何长工回忆录》中提到的没有开会指的是处理邓乾元的职务问题；《红三军团的建立和两战长沙》中提到的没有开会指的是既没有开会研究处理邓乾元，邓乾元也没有开过会讨论分家的事宜。事实上，前引的《彭德怀全传》、《彭雪枫传》以及《黄克诚自述》中都提到了“开会”一事，既包括邓乾元擅自召开红八军军委扩大会议，也包括彭德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批评邓乾元的错误。

我们不妨进一步来梳理一下当时的情况。由于邓乾元召开的红八军军委扩大会议造成的影响，隶属于红八军的原一纵政治委员（1930年8月任红八军红六师政治委员）的彭雪枫及时地向红三军团政治部和前委做了汇报。当时政治部主任就是邱一涵的丈夫袁国平，因此邱一涵的回忆也是很有价值的。邓乾元不仅对彭德怀不满，对军团政委滕代远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不满。早在邓乾元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时就不同意滕代远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6月，邓乾元向彭德怀提出，新组建的红三军团政委一职不宜由滕代远担任。攻克通山，滕代远、袁国平决定没收敌方开设的商店，被邓乾元指责是违反了中共“六大”的决议。

彭德怀接到彭雪枫的报告，感到事态不妙，遂给何长工写了一封短信，将此事告知何长工，要求红八军停止分裂行动，团以上干部立刻来浏阳永和市出席前委会。何长工接信后同邓乾元率领一干人等参加了前委扩大会议。这次军团前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委托滕代远主持的，会上讨论了邓乾元的来信，最后与会者一致反对邓乾元提出的“分家”主张，决定对其予以党内处分。8月15日，红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再次召开包括红五军、红八军和红十六军的党代表会议，邓乾元继续坚持己见，还给会议写了信。这种对抗的态度导致他被“脱离红军，交给特委训练”。只是这样一条重要的史料，不知为何《彭德怀年谱》中并未收录。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邓乾元在反对彭德怀攻打长沙时，尽管也提出过要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进攻武汉。但邓乾元同时也认为“夺取武汉遥遥无期，打长沙也是军事冒险主义”。从后来发展的态势来看，邓乾元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至于说邓乾元为什么会把工作中的分歧处理到如此难堪的境地，由滕代远传记组编写的《滕代远传》转引彭德怀的看法是：“地位观念作祟，抱有个人意图。”

失势的邓乾元于1932年年初调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被划定为“AB团分子”。1934年长征前夕死亡。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念及邓乾元时说：“邓乾元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太可惜了。”

张爱萍晚年忆及老上级彭德怀曾深情地对子女说：“彭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对干部一视同仁，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下面的干部也一样，……一个领导人自己很正派，带出的部队风气也就正派。”张爱萍的这番话用在红三军团的主要领导者身上是恰如其分的，可谓定评。

由邓乾元引发的这场风波虽以邓的落职告一段落，但红三军团历经磨难的进程仍旧向前推荐。哈达铺整编前后包括草地行军后期的种种景象又不得不令人想到浏阳宿营的那一晚，红二纵队副司令员刘亚楼和十一大队政治处主任的嘴脸又不能不令人想到邓乾元的影子。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5.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夕也曾身兼数职

众所周知，中共“七大”是毛问鼎中央宝座的发轫。在这次大会后的选举活动中，毛兼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和军委主席四个职务，其中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一直兼任到死。而在此之前，毛一度身兼数职，总数多达 10 个。

1937 年年底的“十二月会议”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七大筹委会主席。

1941 年 1 月 20 日，中央军委建立主席团，成员包括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以毛泽东为主。

同年，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凯丰、王明七人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实际上在延安已经成为领导核心的代名词，至于工作会议的召集人无一例外则是毛。

1941 年 9.10 日到 10.22 日，“九月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新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归口管理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同时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

中央还决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兼任组长。

新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表面上是作为整风工作的预备机构，实际上则属于中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域的总管所在。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成立清算党的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康生、王稼祥、任弼时、彭真组成，毛泽东为首。

根据“九月会议”精神，中央成立中央研究组即中央学习组又作高级学习组，毛泽东兼任组长。

1942 年，毛泽东建议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毛泽东任主席兼第一组组长，康生任副主席兼秘书长。

同年，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政治指导，归口管理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邓发、林彪、彭真三人。

1943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在政治局、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中央宣

传委员会书记。同时，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提名林彪、彭真为副校长。

1944年5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兼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中央决定，在全会期间，政治局、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全会主席团负责。

1969年3月3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的确，在每一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后，那些“应运而生”的机构诸如肃反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中央文革都会适时消失（或者暂时消失，中央文革消失不久，又“应运而生”了中央组织宣传组），领袖的肩膀上也倏然卸去了不少重担。只是，人们同时也会发觉，领袖的“威望”比以前更高了。

6.刘少奇问牛荫冠：“什么叫流氓？”

牛荫冠（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供销总社主任等职）晚年回忆他与刘少奇的一段谈话，殊堪玩味。

1937年10月，刘少奇亲自起草了一份《山西农会章程》，据薄一波回忆，这个东西后来用牺盟会的名义发表了。当时这份章程转入到牛荫冠手中时，牛在刘少奇的原稿中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这一加可不得了，引来了刘的长篇议论，即刘、牛谈话。

刘少奇一见牛荫冠，劈头就问：“你知道什么叫流氓？”牛荫冠当然只有听训的份儿了。刘少奇接下来说：“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们拦在外头呀！”牛荫冠听到此处才如梦初醒，敢情流氓还有这么多层含义。

而且，将近十年以后，牛荫冠自己也体会到了这个“勇敢分子”们的力度，他的老爹，被中共追谥为“爱国民主人士”的牛友兰在晋绥土改运动中被活活穿鼻而死。据牛荫冠的同学赵俪生回忆，适时，牛荫冠就是土改组组长，坐在主席台，他老爹牛友兰跪在下边。不仅如此，赵俪生还回忆说，牛荫冠牵着穿了老爹牛友兰鼻子的铁丝游街示众。关于牛荫冠拉着他爹的事，现场还有很多目击证人，且都有公开文献资料披露，这里不多说了。牛友兰死后42年被中共平反，牛友兰平反后两年多牛荫冠也一命呜呼。

从目击者留下的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牛荫冠已经在刘少奇的教育下成长为“一名勇敢分子”，当时就有人夸牛荫冠“不容易”。

如果说牛荫冠还只是个“雏儿”的话，那么王世英这样的老资格被刘少奇给教育明白的也不下少数。王世英有过一个困惑，就此请教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王说：“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不如此，人家就不高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纠正

道：“你不是学坏了，是学好了，什么都要求人家和你一样，坐在那里正正派派……谁也不敢接近你……所谓好坏之分，应当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不过，王世英这个“学生”显然没有牛荫冠那么好忽悠，后来“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以至于早早地被赶去了全国政协。

现在回过头来看刘少奇之所以晚年遭遇横死，大抵在这两次谈话中也稍露端倪。

在第一次与牛荫冠的谈话中，刘承认“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这至少说明刘还知道什么叫正派，什么叫农民运动的；第二次与王世英谈话中，刘又承认“什么都要求人家和你一样，坐在那里正正派派……谁也不敢接近你”、“吹牛拍马不好”。这也说明刘还知道正正派派坐在那里是不容易被人接近的，吹牛拍马属于不正派的举动等等。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有了这么浅显的底线，所以，在后来的那场革命中，刘被推翻前浪的后浪的勇敢分子们给搞死了，被搞死前刘还深感冤屈。但是他的老婆孩子则比他聪明很多，若干年后便主动做了勇敢分子，和那个最大的勇敢分子的家属坐到了一块去了。

不知此刻，他们是否也想起了刘的那句语录：“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7.刘少奇与林彪

戚本禹他们评《清宫外史》时，连康生都还不清楚毛已然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而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康生便已从毛的谈话中觉察到毛准备让林彪靠边站的信息，其时不过间隔69年九大上树立林为接班人一年多的光景。

为何康生前番迟钝而后番警醒呢？不独是因为有了参照物，更主要的是刘少奇在党内成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有二十三年之久，这还是从1943年，毛、刘、任三驾马车正式起航算起，如果从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刘独撑华中算起，已然二十五年之久。

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康生作为旁观者尚且糊涂的地方，刘同样也不清楚，至少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如同历次运动那样紧跟便可以免祸，殊不知，此次发动文革大有不打倒刘誓不收兵的架势。而这点刘后来终于明白了，但也还没有想到不但要打倒他，而且还要将其置于死地，自然这点刘是被转移到开封以后才明白的。

毛不按常理出牌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林利欲熏心也是自取其辱的主要原因。所谓“猪油蒙了心”一定是在利欲诱惑大于理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所谓不修今生修来世，虽是无奈之语，可也是一种信仰的境地，可惜林彪并不具备。林本人实际上正是毛当初说过的“革命的同路人”，林本身未必具有这种虔诚的类似教徒般的信仰，且不论这种信仰是否正确。如果一定要说信仰的话，林一生的信仰就是一个字：“权”。

事实上，毛也正是因为看穿了林的这个软肋，才敢于放胆说“随他去”的话，因为在毛看来，失去了“权”的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日后即便林到了苏联，出版了回忆录，其作用又能翻出几尺浪来？

比如我们今天阅读张国焘回忆录，谁又能不去质疑张的回忆录的真实性的一面呢？

也惟其如此，前苏联才发明了一种惩罚，叫做“驱逐出境”。

林当初说过：“绝则错”，实际上他的外逃也是“绝则错”的翻版。

后来批判林彪说林彪信奉孔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孔子当初提倡：“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道理，可理论不联系实际，也只能是空谈。

在传统政治中，“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是根本行不通的。孟子还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而我们直到今天歌颂的也还是诸葛亮与岳飞，如果真的有谁做到了“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那也不过是重复了“遗臭万年”的把戏罢了。

朱棣政变以前同刘伯温的儿子刘璟很要好，政变以后拉拢刘璟，刘璟说了一句话：“殿下万世逃不过一个‘篡’字。”

如今看来，刘璟的话应验了，朱棣可以杀了刘璟，这点他做到了，但他做不到后代说他没搞政变没篡位。

如果说什么是中国，这也许就是中国。

所以，处在弥留之际的刘少奇尽管没看透这场游戏的开幕，却毕竟看透了中国，所以，他选择沉默，宁可把塑料瓶捏成了葫芦状，也不发一言。

而刘的这一选择为他的后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也为他的后代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也所以，林豆豆实在没必要冒充窦娥，她怪也只能怪她老爹老妈当初没给她留下这些许空间。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纵观林的一生之为人处世，何尝有过“让”字，为人臣者不懂得“让”的哲学，最后横死也是必须的。

8.周恩来的“双黄蛋”

提起冯玉祥这个名字，几乎与朴素二字是天然的结合，一套粗布军服几十年穿下来，还要配上粗粮、粗话以及大家看不见的粗瓷大碗。

关于冯玉祥的粗瓷大碗，千家驹晚年有过回忆。

抗战期间，冯玉祥在广西桂林乐群社请客，用的就是粗瓷大碗。据千家驹介绍，这种粗瓷大碗是冯玉祥落难山西建安村时专门在一个土窑厂里订制的。因为瓷器携带不方便，1933年冯玉祥在山东泰山休养时便又让副官专门跑了一次山西，再度订制了一批粗瓷大碗运回来。而且，每次出门在外，冯都要让人携带这些粗瓷大碗，千家驹行文到此不免感慨说：“土瓷价格虽廉，但加上副官的旅费、运费以及种种费用，实在比当地的精瓷器还要贵好几倍。而且战时交通运输困难，还要随身携带款待客人，以示俭朴，实在未免矫情过甚了。”

与此同时，千家驹还回忆了另外一件事：本来乐群社自己就备有厨师，但冯玉祥为了让人们感到朴素的含义，就派人到外面去找山东籍的厨师过来做烧饼给大家吃，战时的桂林到哪里去找山东籍的厨师呢？可冯玉祥就能找到。不过，这样一来，烧饼还能是烧饼吗？叫烧钱还差不多。

然而，上述内容比起另外一位表演艺术家来，实在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周后来经常工作到深夜，要有夜宵，雷英夫回忆周最爱吃的夜宵是细面条卧鸡蛋，而且只能卧一个鸡蛋，以示节俭，当然，偶尔碰上了双黄蛋，雷英夫说：“他就更高兴了。”

为了让周“更高兴”，诸如周经常去开会的地方，都特别备有双黄蛋。

只是从鸡屁股底下摸出的双黄蛋的概率的确要比土窑厂烧制的粗瓷大碗概率低得多了。

本来戏演到这一步已经让很多傻逼们热泪盈眶了，没想到接下来大米饭和烧麻雀的故事又令更多的傻逼们大脑一片空白。

在庐山期间，大毛拉表示不要搞那么麻烦，国家现在还很困难，人民群众不容易，就吃点米饭吧，吃点麻雀吧。

于是，组织人去附近抓捕麻雀，有人回忆说：“挖出两块脯子肉来，脯子肉很少很鲜，几十只麻雀的脯子肉总共才一小碗，用油爆炒，正好够他吃一次。”

大米呢？也不是白给的，有人又回忆说：“大米是专门从北京带来的，每天厨师都一粒一粒地经过细挑拣，负责做饭的徐师傅说，这些米在北京已经通过警卫战士拣过一次，但在这里还要拣一次才放心。”

说起来，老大就是老大，连朴素都是无法复制的。

9. 周恩来的警惕与日本人的麻痹

以往人们往往追念周的细致入微的料理，因为缺乏独立思考，总以为这样的素质值得夸赞，更没有进行有效的对比，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不妨重温两则范例，让大家做一认真的比较。

1949年3月下旬，负责安排劳动党进入北京城的方文在得知包括毛周在内的很多巨头谈话可能延至深夜的消息后遇到了一件小事。给毛开车的司机临时肚子疼请假。方文就同意这位司机先行会宿舍休息，次日一早再来。方文特别提到毛的专车是防弹的，这在当时属于顶配。

在上车时，周问了方文一句：“主席的车呢？”方文回应是司机病了。周当时没说什么。在香山寺下车后，周找到方文质问道：“你为什么准许主席乘坐的那辆车的司机休息？”方文回答：“他病了，考虑夜深了，中央首长不一定用车了，就答应了他。”周毫不放过地继续追问：“为什么不先问我一下呢？”接下来的是周的一大段批评，都是老套路老调门，不必照录。

事实上，周所担心的无非是给毛开车的司机因为没有经过他的允准，进行了所谓擅自的“休息”，万一这个人走漏了毛的行踪怎么办？而且因为没有他在场，毛没有用上防弹车被偷袭了怎么办？

记得劳动党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群众在前党在后。况且，这位给毛开车的司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是经过严格筛选和考查的，其背景应该纯之又纯。然而，一旦关系到他们几个人的安危时，同志不见了，兄弟也不见了，甚至连群众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周口中的“关系到毛主席行动的大事”。所谓的相信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言自明。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故事。

据车向忱的一份遗稿披露，在车向忱本人抗日期间搭乘京沈铁路列车时，一度与一个日本军人通路。车当时有点心虚，怀疑这个日本人是故意坐到自己身边的，就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大鸭梨“贿赂”他，日本军人吃的很高兴，不疑有他。车向忱想：“好，吃了我的东西，那就得为我服点务了”（此处为车向忱本人写

就的原文)。车过大虎山后，日本人上车检查随身行李，车向忱带的是机密材料，担心被抽检到，遂对那位吃了他梨子的日本人说，我的东西还需要检查吗？结果这个日本人向那个例行检查的日军打了个招呼便放行了。车到山海关，车向忱又顾虑到路面的检查，便装出负重感，“这位鬼子兵顺手接过了皮包并为显示他的力气，快步走到了检查站。他回身向我招手，表示随他过去。我带着妻子孩子急忙跟了过去，顺利、平安地通过了检查站。”

车向忱记录的时间是 1932 年上半年，那正是日军入侵东北不久，中日两国虽未正式宣战，但两国实际已成仇雠。一个车向忱眼中的鬼子兵居然只因为吃了车向忱送来的大鸭梨竟然连续帮了车向忱两个忙，尽管他本人并不知晓。而且日本人也居然没有怀疑车向忱这个中国人递过来的大鸭梨竟是“糖衣炮弹”。

这里略微补充一下车向忱其人后来的下场。车在劳动党建立政权后担任辽宁省副省长和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初期即被打倒。1967 年 5 月 7 日，车向忱被捕，遭到严酷的刑讯，其人年已 69 岁，他请求回家探望一下瘫痪在床的妻子，他找出毛在延安时代送给他的大衣，披在身上，劳动党官修史料上说：“车向忱内心翻滚着感情的波涛”，究竟是啥感情的波涛，恐怕也只有天知道。这之后，这份官修史料上又说：“那种被威吓、侮辱、殴打和劳动惩罚的日子，使他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车向忱的专案资料一度被上送到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时任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亲自调阅了这份材料，而且那上面还有周的亲笔批示。如果车向忱有知，不难想到他内心又该翻起什么样的“感情波涛”？

两件往事，一件是周的警惕，一件是日本人的麻痹。或许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我们以前不愿意看到的景象，内心也许也会升起一点感情的波涛：“为什么怀疑压榨摧残中国人的往往多半又是中国人自己呢？”

10.周恩来的三场表演

周恩来一生多场表演至今让有些人流连忘返、涕泪横流，现在举出内中三场戏，供大家参详。

李锐在“大跃进”期间三次给毛泽东上书，深受毛的器重，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会议，毛大喊道：“李锐来了吗？……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毛甚至还提出让李锐兼任秘书，并叮嘱胡乔木说：“他（李锐）是新来的，你们不要欺负他。”

适时，李锐很受宠。1959年6月29日，李锐等人登上庐山后，四处游玩，周恩来也列身期间，大抵是七月上旬，他们同游东林寺，在寺门口，因匾额是康有为题写的，周便大声询问李锐：“李锐，康有为的字是中年写的，还是晚年写的。”李锐随口答曰晚年。

此次演出周并不很着痕迹，到底是因为舞台背景尚不激烈，且李锐“旦角”入行尚浅。但接下来的这场戏分明就有些看头了。

戚本禹“字挟风雷”靠着毛这棵大树写出了评价李秀成自述的文章。1963年9月，“阎王殿”的“铁面判官”周扬坐不住了，召集人马火力齐射，一起批判戚本禹。当时戚本禹还未“挂帅”（戚在文革中有“戚大帅”的外号，故有此称），而且，此次批判会来头很大，据丁守和说周扬是请示了周恩来之后搞出来的。只是来头再大的会议一旦碰到毛也即刻卷刃。江青带来毛的亲自批示，十六个字，“忠王不终”这四个字尤其印在了周的心间，结局不光彩，前面就是白玩。

1966年5月在锦江饭店，周借口约请戚大帅到饭店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的当口，亲自躬行致歉活动，他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其实我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之前相约到顶层呼吸新鲜空气，按理戚大帅位卑，理应先到，但周反客为主，以总理身份屈身静候戚大帅到来。这场戏的戏份很足，让戚大帅刻骨铭心，所以，到了晚年回忆时还不忘了将其罗列出来。

其实，不论是康有为题写东林寺的匾额，还是李秀成自述到底变节与否，这都不是周最关注的情节，周心中唯一在意的就是大毛拉的态度。

这里不妨再顺便看一下第三场戏。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盐碱地在联大的合法权利，毛决定派出代表团参加。出发前一天晚上，毛召见代表团成员，周在介绍代表团成员时，是这么介绍秘书长符浩的：“他是符浩，秦符坚的符，现在这个姓氏不多了，他是陕西人。”接着周很专业的又问符浩本人：“你是少数民族吗？”符浩这才意识到周是把他这个符同苻坚的苻给搞混了，他不得不解释说他自己本姓符，并引百家姓“祖武符刘”作证。

如果稍有十六国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苻坚祖父蒲洪，“以孙坚之生，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苻是草字头，而符是竹字头，两者相差很远。南开中学的毕业生的历史知识和语文知识真的不是盖的，这倒是跟第一师范出身的毛在庐山会议上将陈庆之搞成了沈庆之好有一拼。

周压制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曾经经他手里提拔起来的人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有名者如乔冠华。这里一则是周不愿意给人以“坐大”的感觉，其实也是一种自保的手段；再者，对于被提拔者本身来说，周也认为其人的缺陷如果一旦上去了会暴露得更为明显。至于在处理这方面人事时，周则历来是严三分，从不宽三分。而事实上，如果宽三分的话，效果未必会很好，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就拿乔冠华为例，周始终压着乔冠华一头，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乔的缺陷所在。何方后来有过回忆，说乔本人对此一肚子怨气，经常抱怨说别人都是副部长或者部长，他还只是个司局长，文革前也还只是个副部长。

事后证明周对乔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压制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对乔的一种保护。乔此人名利心太过热衷却又缺乏肩膀，一旦受挫便萎靡不振。且其人政治眼光特别迟钝，不宜介入高层争斗。周虽压乔一头，但知乔者惟独周，周去后，乔只能被投闲置散。男邓女邓对乔均无好感，外加李先念，乔不死也得脱层皮。周在，当能用乔一技之长。

在周看来，乔任外交部副部长，这是最好的归宿，既能发挥他的业务长处，也能让他避免卷入上层争斗。乔冠华、章含之都是空有一肚皮妄想却无配套操作本领，所以最终被抛弃。在这点上，他从周身上并未学到半点真东西。周在政治上的行事作风很可琢磨，甚至写几本书都不能全然道此。

周每当政治风波之际，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失败了又当如何？退路在哪里？退路有几条？几条通畅并安全否？

中国近代史一百多年来，能做到周这点的也就曾国藩和毛泽东两个人而已。如果毛作为老大可以不计，那么也就只有曾国藩比肩了。

周在政治决战中，往往会故意留下一些小破绽出来，让对手抓住不放，自己则以退为进，到处检讨四处检查，以“哀兵”姿态最终赢得人心，所以，对手尽管强悍却不能完全无视人心走向，这也就是对手虽然时而对周有所惩戒却也最终无法奈何得了周的缘由。而故意流露破绽诚如兵法上所说“围师必缺”一样，既给对手以希望不至于令其狗急跳墙，也给自己留下转圜余地。

这种火候的把握和拿捏，殆非一般政坛人物可以企及。

11.有关中央苏区的部分疑云

湘赣边界洗党过程中的很多做法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很多做法都很接近，或者说基本类似。比如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每逢大动作之前，毛泽东最喜欢搞的就是解散现行党组织。现在这一招又被有的人给学去了。

李志民后来回忆说袁王事件是跟陈正人谎报军情有关。

这就牵扯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东西来。

富田事变前夕也是有人派遣曾山、陈正人去刺探，然后又是陈正人回来密报。

怎么每逢这种时候都会有陈正人的身影呢？

毛的两个心腹大患，李文林、曾炳春均于 1932 年 5 月被杀。而此时毛尚在漳州一带，坐镇瑞金的是手握重权的苏区中央局书记、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周恩来。

按照现有史料介绍，枪杀李、曾的命令来自于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主管该局工作的正是周本人。

李文林、曾炳春死后第二天，周即迫不及待地给毛发去一封电文。

《周年谱》1932 年 5 月，缺五月上旬的所有记录，为什么？

因为头十天，周始终吃住都在国家政治保卫局。

5 月 11 日，主持中央局工作，发出反右倾的号召。

同时，提名毛泽覃为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后改为邓颖超。以前把湘赣边界的“洗

党”看作是肃反运动的先声，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事实上，不论是洗党还是后来的肃反包括整风、反右倾、四清、文革，它们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属性，那就是对权力的掌控。

实际上，江西时代的肃反与苏共的教唆既有直接的关系，也有借助了苏共的所谓题目做了自己想做的文章，挂羊头卖狗肉。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干扰着真相披露的行进。那就是江西苏区时代的肃反运动主要应归咎于毛的始作俑者和扩大化。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总责之一的周恩来往往充当了“救火队长”或者“擦屁股”的角色。

然而，事实证明这也只是一一些人“美好”的臆断。周在苏区肃反运动的三个主要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或可说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比毛差，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了周的支持和偏袒，毛不会在那么长期的过火运动中泰然自若、得心应手。而且，在毛黯然下课之后，即长征之前，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又是在周的批准下开始了。以往这个屎盆子一般都是扣在王明和博古的头上。

应该承认的是，江西苏区（扩大为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是毛、周在政治上的第一次的完美配合。在这个过程中，有趣的一个现象是文革中的“三驾马车”尽管扮演的角色不同，分量不同，但任务相同，目的相同。即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三人组合的雏形。只不过，此时的林彪还不过是“跑龙套”的“排头兵”罢了。

正是在解析了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的全貌以后，才会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兴起，至少在高层资源的配备上从三十年代就已经搭好了台子，甚至连角色也做了预先的安排。当然，包括毛、周、林在内，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的，也几乎根本没有料到在三十多年后，他们合作的空间会那么大，各自的结局会那么诡异。

可以说，文革的预演不是在陕北，不是在北京，其实是在江西。

此外，关于“袁王事件”表面上看与苏区肃反无涉。但事实上却也是前奏曲之一。在这起事件中的几个关键人物也很值得琢磨一番。比如宛希先。

宛希先是被他的主子给干掉了，然后又给平反了的一个冤魂。

这种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的苏区里，有很多，现在都一律改名叫“烈士”。在延安时，毛对何长工说：“长工啊，希先杀错了，要平反啊。”何长工就只有哼哈的份儿了。

红军的历史最好看，为啥？因为它是开场白，后面的戏不过是照本宣科罢了。为啥要杀掉宛希先？那么斯大林为啥要干掉基洛夫？晚年的斯大林为何又要干掉自己的顶尖亲信梅赫利斯（红军政委、国防部副部长）？

毛自己跟陈正人说过，革命有几个重要转折点，也就是所谓的“恩人”。一个是上井冈山遇到袁王；一个是东固碰到李文林；一个是陕北会师刘志丹。你回头不妨看看，李文林、高岗他们都哪去了？

长征中中央队三人团密谋推翻博古等人，张闻天、王稼祥又哪去了？王稼祥独生儿子被迫自杀，张闻天欲回北京养老而不可得。

程中原写的《张闻天传》中这一段描写的尤其传神，张闻天哀求回京养老（字面上虽没有哀求二字，但内容和形式已经说明了这点），毛当时刚做完眼睛的手术，尚未拆掉，让护士代为批示，不准回京。

王稼祥最后的死亡其实是吓死的，表面上看始作俑者是康生，但康生的背后呢？总不会是外星人吧？

斯大林说得好：“报恩是狗才有的顽性。”

大家阅读党史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凡是某个事件的责任者被笼统地归结于路线、方针或者政策的时候，这个事件就一定与最高层有着密切的关联。现在官修本的定义袁王事件责任人，首先是中央左倾路线，其次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再其次红五军偏听偏信，再再其次边界特委蛮干。

1.中央左倾路线？中央啥时候右过？所谓的“右”不过是左的不过瘾的代名词罢了。

2.彭清泉是谁的铁磁？有点常识的都知道。

3.红五军偏听偏信？那么，红五军的掌门人为啥晚年回忆录里说这件事跟“富田事变”差不多？

4.边界特委朱昌偕是谁的亲信？难道是外星人的吗？

宛希先死在袁王之前或者死在袁王之后，其实都无关宏旨了，因为当时在边界能够决定这个级别干部生死的甚至不是远在天边的中共中央，而只能是也必须是近在眼前的某个人。

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从来或者是极少认真去反思体制问题的。既没有认真思考过过去体制的实质性弊端，也没有认真考量过未来的体制出路。

可就是这么一个底子的前提下，突然有一天大谈体制如何如何，你不觉得奇怪吗？

而且，举凡诸如肃反、抢救运动、大饥荒、文革这种重大悲剧，一律“高瞻远瞩地”直接扯到了体制上，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皇军难道不抢粮了吗？

凡是能忘一些批臭的人身上推的，就推到他们身上，如果实在推不动的，比如总不能说江青发动了文革，那么就扯到了体制上，反而体制是个什么玩意儿，至今大家也搞不清楚，更别说追究责任了。

彭在这件事上说到冤枉二字也不全然如此，他的所谓“冤枉”不过是带了一顶重要策划人的帽子或者拍板人的帽子罢了，说起来他一样也是帮凶，否则彭全传的作者们对这件事始终支支吾吾、言不及义。

党内斗争是绞肉机，有的人有时候充当肉，有的时候充当绞肉。要说立场清白、身形洒脱的一个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即便将来公开档案，你也不可能看到有个什么人批示个什么东西说干掉袁王。

你看他后来的那些个重要批示，包括对邓、刘、林、周等人的处理决策，绝无一个字沾血。这个东西他如果琢磨不透，他也就不是他了。

旧作《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中写的最多的就是借刀杀人或者杀人不见血，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驭人术的最高境界之一。只有老大这个量级的人物才会对此门清，才会玩的炉火纯青而不留大部分痕迹（一点痕迹不留是不可能的，蛛丝马迹总会有的）。

其实材料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不会将这些材料结合起来看是另外一回事。历史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河，只有将所有的珠子串起来，才能有看到全貌的机会。

就袁王事件甚至还可以扩大到中央苏区肃反这些大事上来，我相信肯定没有什么所谓的机密档案等待解密，那个时候，执政党尚处于草茅时期，杀人的手续非常之简单，更没想到会留下什么文字的东西，往往是头头们的一个暗示或者是一个手势，一个人乃至一个集体的命运就决定了。

比如屠杀红二十军的决策肯定不会有文字的东西留下来的，最多是一句“你们看着办吧”。这样的例子，在他的一生中多次出现屡见不鲜。

穆欣当初不是回忆过吗，他最恼火的时候也只是说“让他去办三件事！”仅此而已，绝不会说出“杀无赦”一类的直白。

12.许继慎与“白雀园肃反”

(一) 峣峣者易折

(二) 各色嘴脸

(三) 白雀园

(一) .峣峣者易折

张国焘曾经如此形容许继慎：“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234页）应该承认，张国焘的这番勾勒大抵画出了许继慎的政治轮廓。因“才华毕露”而崭露头角，也因“爱谈政治”最终折翼。

不仅张国焘，举凡接触过许继慎的国共高层人物都为他的“才华毕露”、“头角峥嵘”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许继慎殉难四十一年后的1972年6月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专门提及许继慎：“这个同志我了解，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与他有很大关系。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事实上，就连叶挺本人在1927年兼任武昌卫戍司令时伸手向周恩来索要军事骨干，唯一指名要的就是许继慎：“就要许继慎……搭起师的架子。”【注】（马德俊《许继慎传》，57页）而包括周恩来在内，考虑整合鄂豫皖军事力量的首要人选时，想到的也是许继慎。

鄂豫皖根据地的发轫起于三场暴动，即商南暴动、黄麻暴动、六霍暴动。这三场暴动分别“诞育”了三块地盘，即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出于“做大做强”的目的，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将鄂豫皖进行合并改组成为鄂豫皖特别委员会（特委），任命郭述申为书记，任命曹大骏为前委书记兼新改建的红一军政治委员，而将红一军的军事指挥权交到了许继慎的手中，红一军与地方党委是横的关系，直接接受中央领导，其部队行动方针由红一军前委决定。。鄂豫皖的“三驾马车”在周恩来看来，属于比较强的班子。然而，事实却没有这么乐观。特委书记郭述申与红一军前委书记曹大骏都是“武高”（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

同学，都有搞“农运”、“工运”的经历，但他们都没有真正地摸过枪杆子，没有经历过那种脚踏实地的军营生活，或许这也就是周恩来将军权交给许继慎的缘由。而且，郭、曹等人本身的短板也是很明显的。例如曹大骏，陈潭秋就指出过其人的毛病所在：“长处是大胆猛干，短处是有勇少谋而粗心大意。”【注】（侯亚英《陈潭秋同志在北伐宣传训练班》）

当时，新建的鄂豫皖根据地内部矛盾比较复杂、尖锐。集中表现在商南暴动的带头人和红三十二师创建者周维炯同鄂豫皖特委之间的对立上。周维炯出身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有一股子闯劲，为人干脆、豪爽。他利用老师漆树仁的关系打入商城县民团，人称“炯爷”。利用这一层保护色，周维炯才拉起了武装暴动的队伍。以后成立红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表兄漆德玮任副师长，参谋长漆海峰，党代表则由徐其虚担任。徐其虚是黄麻暴动的重要骨干，从鄂东北根据地直接派到豫东南，到了豫东南以后，与周维炯等人发生了冲突。徐其虚本人身兼四个要职，即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简称商罗麻特区或特区）委员、军事委员会书记、红三十二师党代表、师委会书记，权力较大。据中共商城临时县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记录，徐其虚会同徐子清自行组建了中共鄂豫皖特区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拒绝执行之前中共豫南中心县委和中共鄂东北特委的联席会议上所作出的有关商南组织交由中共商城县委负责的决议。在这份报告中还披露了徐其虚和徐子清的部分言论，诸如“我们是鄂豫皖特区区委，不受商城县委的指挥”、“鄂东北的组织十分健全，豫南的组织简直是反革命的大集团”。在这份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徐其虚、徐子清对中共商城县委的头头脑脑的各种指斥。与此同时，报告还援引了周维炯、王泽渥、肖方等人对徐其虚、徐子清的揭发材料，并且认为应该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徐其虚等人。【注】（《商城临时县委关于处置鄂豫皖苏区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9日）

商城临时县委提交的这个报告不是说着玩的，周维炯他们很快“剑及履及”，将徐其虚、徐子清秘密处决。“二徐事件”的起因便是1929年6月11日召开的“柴山堡联席会议”上的关于红三十二师、商南党组织的归属问题。而该联席会议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巡视员（专门负责巡视豫南）的郭述申（原名郭树勋）提议召开的。这次联席会议“领导归属虽然明确，但是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留下了后遗症”。所谓“后遗症”具体体现在中共信阳中心县委按照联席会议的决定接收中共商城党组织时，遭到了徐其虚和徐子清的拒绝。“这种错误行动影响了鄂豫两省党组织的团结，也违反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促使党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所抬头”。【注】（《追寻郭述申的足迹》内部交流稿）由此

可见，徐其虚、徐子清的作法直接印证了商城临时县委给中共中央报告中的部分内容的属实。

作为联席会议的始作俑者的郭述申本人，在他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强调因国民党军进攻商城南区，导致红军和党组织的“退却”，“因此不能去商城”。也就是说，“二徐事件”的处理和善后工作被延宕了一段时间。（8月间，徐其虚被杀）迟至1929年10月下旬，郭述申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巡视豫南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郭述申是如此描述中共商城县委的：“没有支部生活……上下关系不好，……负责同志官僚化”。对于商城县委临机处决二徐，郭述申也提出了反对意见。【注】（《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巡视豫南报告》，1929年10月22日）

1930年1月，郭述申再度主持召开中共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的联席会议。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波澜再起。自徐其虚、徐子清被杀后，红三十二师又把党代表戴亢若给处理掉了。中共信阳中心县委派孔文彬、刘英、郭天民到红三十二师和商城县委工作。不料，这几个外派干部仍旧不能与当地干部打成一片，“竟与他们又闹成不能合作的裂痕”。而孔文彬、郭天民都是深受郭述申信赖的。郭述申除开布置任务外，还传达了有关指示，即将富农、地主出身的人员从红军中清除出去，引发红三十二师内部的骚动。特别是当郭述申“代表中央意志”提出要红三十二师向广水方面发展时，受到了商城县委的抵制，郭天民则表态“坚决要将红军拖出”，事态逐渐激化。郭述申有鉴于此，自己便同刘英、孔文彬、郭天民等外来干部不辞而别，自行离开了商城。【注】（《鄂豫边特委关于成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经过的报告》）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郭述申两次给中共中央打去报告，汇报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的有关情况，内中尽情地控诉了一系列事件的经历和曲折。1930年3月，中共中央复信，对“二徐事件”以来的相关问题做出结论，结论中除开批评商城县委的错误做法外，另对郭述申的所作所为提出意见：“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同志在他巡视商城工作中，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树勋同志没有纠正商城党内同志的错误，而更给与同志以不好的观念助长了这种错误，因此中央特别将树勋同志的错误公开指摘出来……树勋同志要负主要的责任。”【注】（《中央告商城县全体同志书》，1930年3月18日）

正因为有了上述的历史恩怨纠缠，就下一步如何统一规划红军的部署，郭述申、曹大骏等人都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只有许继慎大胆提出只身前往红三十二师驻地，将周维炯等人彻底团结起来。对于许继慎的提议，郭述申、曹大骏、徐向前他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郭述申且不说了，徐向前对周维炯的印象

也不好，直到晚年还回忆说：“周维炯……有点骄傲，看上去像个白面书生”。为此，经前委同意，加派王宏恕带红一师手枪队护送许继慎前往。【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54、67页）

到了红三十二师驻地以后，许继慎很快拿到了第一手材料，对此前发生的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红三十二师之所以对郭述申他们比较反感以至于闹得不可开交，源于四个因素：第一，郭述申下车伊始，衣着华丽，引起当地红军指战员们的反感；第二，郭述申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反地主、富农出身的指示，按照这一标准，商城地区的红军中一半以上的人马都会给清除出局，且郭述申只是口头传达，并无文件出具；第三，郭述申身后带来一批外来干部，孔文彬、刘英、郭天民等，准备就此对红三十二师进行彻底的改造，类似于“一锅端”；第四，在处理“二徐事件”及其遗留问题上，作法不够服众，有欠公允。【注】（马德俊《许继慎传》103、104页）

仅用了很短的时间，许继慎即捋出了解决问题的头绪。他首先肯定中共中央在给商城县委的《告同志书》里对红三十二师与当地党政干部的基本评价，肯定他们的成绩。其次，又对自1929年6月以来的过火、过激行为提出严肃的批评。最后，许继慎拍板，不要算历史旧账，翻过去，重新来过，都团结起来。许继慎噼里啪啦地讲了半个多小时，干净利索，给红三十二师全体指战员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周维炯、漆德玮等人都为许继慎的果断、豁达所折服。也就是在这很短的相处的日子里，许继慎挖掘了红三十二师领头人身上久被人忽略的宝贵的品质。例如，他评价漆德玮“智深勇沉”、“厚道正直”。评价周维炯“大义灭亲”、“革命坚决”。（周维炯曾亲手干掉了他的小舅漆自州。）可以说，许继慎的这些评价话虽不多，却扎到了点子上。如他给漆德玮的定义，郑位三也说过：“漆德玮是好品质……后来处分他有些‘左’，但调他到上海中央又转调到中央苏区当团长，仍然安心工作，这不算好品质吗？”。【注】（郑位三《关于豫南初期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4月26日）不过，徐向前给漆德玮的评价并不高，徐后来说：“漆德伟太软弱了，中央没有办法处理他，以后送到中央苏区，在路上牺牲了”【注】（黄文治《徐向前、徐立清1958年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

许继慎在红三十二师的所作所为，于公而言，年甫 29 岁的军长给红三十二师的官兵们摘掉了头上乱扣的帽子，卸下了心理上的包袱；于私而言，他兄长般的豪迈也令包括漆氏兄弟在内的不少的指挥员感念不忘。1985 年出版的红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艰苦的历程》上下两册，唯一一篇单独回忆许继慎的文章即出自漆远渥之手。【注】（漆远渥同许继慎接触时间不长，仅自 1931 年开始。）

经过许继慎的努力，新编成的红一军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徐向前说：“他（许继慎）到商南、皖西后，顺利改编了部队，……有力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的局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许继慎并不以自己亲临商南整编红三十二师作为本钱，在稍后的红一军混编的问题上，他仍旧一秉至公，让全军上下心服口服。正如徐向前晚年讲的那样：“通过混编，各部队亦能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许继慎同志一直主张部队早日混编，做过不少动员工作，我们也赞成。把三个师捏在一块，他有很大的功劳”。【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67、75 页）如果站在鄂豫皖苏区的发展史上回看许继慎整合红一军的过程，其功绩显然是相当独特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周维炯、漆德玮、漆海峰等人让特委“憋”的这口“恶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让有的人忘却，且有着变本加厉的嫌疑。1930 年 10 月，特委决定在光山召开红一军全军党代表大会，大会开了三天，主要议题是两个，一个是改选前委；另一个则是部队混编。而这两个议题其实都把矛头集中对准了许继慎等人。特委书记郭述申首先向许继慎开炮，指责许违背中央路线，到商南整军充当“和事老”，没有坚定执行上级的指示，包庇漆海峰、漆德玮等人。甚至郭述申还借他人之口说：“农民说二师、三师是土匪……在作战方面，二师负责人处处存在有保存二师实力的观念，每次合作作战二师不积极向前，一师受了几次损失，也不满二师。”【注】（《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续，交抄时间：1931 年 1 月 8 日）关于这一指斥，徐向前后来补充说：“军部令我带着一师从北面强攻，……不知什么原因，南面的二师却按兵不动。我们有个最好的营长叫高汉初，牺牲了，我很痛心，气得和许继慎大吵了一顿。”关于混编，徐向前还说：“对一师，拆得太厉害，将一些干部调往外师降职使用，是不妥当的，也是军领导对一师不够信任的表现。”【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73、75、76 页）可是，徐立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也值得重视：“光山整军，实际以一师为核心，皖西地方党的同志没有很好重用”。【注】（马德俊《许继慎传》，149 页）1958 年，徐立清还专门说过这件事：“听说黄麻斗争皖西北的人。”【注】（黄文治《徐向前、徐立清 1958 年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

话》)本来,许继慎到商南就是为了平息鄂豫皖三个“山头”的矛盾的,而且做的也比较成功。可是,随后特委和一师的某些人的作法与他的努力背道而驰,不仅不抚平旧伤口,反而火上浇油。由此让三个“山头”的旧恨又添新怨,为后来鄂豫皖的“肃反”埋下了祸根。

同时,郭述申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许继慎和徐向前进行了区别性的描述。他说:“许继慎同志虽然在军事知识是有很多的经验,但在指挥游击战术上,不及一师师长徐象谦。因此,一般士兵都信仰象谦,军长的信仰还少一些。”

【注】(《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续,交抄时间:1931年1月8日)给许继慎等人定下了批判的调门后就是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岗位调整,许继慎、熊受暄落选红一军前委委员,而曹大骏、徐向前、姜镜堂、王培吾、孙永康、曹学楷、刘英等进入一军前委,曹大骏任书记。很难想象,作为一名指挥全军的最高军事主官一军长,居然不是前委成员。而伴随着对许继慎的打压,特委负责人又将红二师作为开刀的对象。用“枪决”这一极端的手段杀掉了红二师参谋长漆海峰,将漆德玮撤职送中央处理。徐向前评价漆海峰时是这样说的:“二师参谋长漆海峰错误严重些,品质不好,吸食鸦片,与反动亲属关系不清。”但徐立清的回忆略有不同,徐立清说:“漆海峰权力大,当时说参谋长专政,军阀主义,闹独立,毙了。其实,漆海峰治军极严,看到很多事不好就打人。”【注】(马德俊《许继慎传》,149页)对“二漆”(漆德玮、漆海峰)的处理,徐向前也承认一点:“他(漆德玮)是商南起义的领导人 and 二师的创建人之一,在二师中有较高的威信……他(漆海峰)在创建二师中出过力,决定枪毙他是过火的。”

【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76页)凡是反对枪决漆海峰的红二师的人都被安上“有背叛党的路线的企图”的罪名开除党籍,周维炯也被降职为团长,特委还利用“出身论”的观点将很多红二师、红三师的人清洗出局。

这是许继慎到达鄂豫皖之后第一次遇挫。好在时间并不长,光山会议开过不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鄂豫皖地区的有关指示就传达到了红一军前委。这份指示对此前的“左倾”的作法有了部分的“纠偏”。更为主要的是,决定派曾中生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全权负责根据地的党政军事务。徐向前回忆道:“前委听了传达,认为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那一套是对的,符合大家的心愿,表示拥护。许继慎同志很高兴,因为他被原特委视为消极分子,在光山会议上批评了一顿,连前委委员都被选掉了。”【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77页)许继慎还兴奋地对曹大骏等人说:“是否出击平汉线,我讲了一个多月,你们就是不听,中央一否定,你们全通了。今后,我希望你们不要盲从,我看,你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全部搞懂,是不是?”【注】(马德俊《许继慎传》,151

页) 其实, 不论是许继慎也好, 还是光山会议上批判他的那些人也罢, 双方“还没有全部搞懂”, 许继慎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错误”恰恰就是在“不要盲从”上; 而那些一旦有了机会, 将更“盲从”。

许继慎的话音未落, 新的难题就扑面而来。新来的特委书记曾中下车伊始就给原特委的一帮人包围, 原特委的人马“告御状”, 说许继慎不重视苏区云云, 引发曾中生给红一军下了第一份指令, 即红一军必须回到黄麻老苏区所在地, 进行苏区根据地保卫战。许继慎权衡利弊, 决定再度抗命, 大胆做出“东征皖西”的决定。面对这一决定, 曹大骏等人颇有难色, 毕竟曾中生刚刚走马上任, 如此抗命不遵, 结局很难料想。但许继慎还是从实际出发, 毅然给曾中生去信,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自 1930 年 12 月 4 日许继慎率红一军师出但店至 1931 年 1 月 4 日前后, 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 连续取得东西香火岭和四顾墩等战役的胜利。而更为关键的是, 经他创建的红一军其作战方式已经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注】

(《解放军将领传》第三集, 196 页) 关于这一点, 徐向前晚年总结鄂豫皖苏区军队战斗历程时也承认: “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围点打援, 运动歼敌; ……已发展为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在东征皖西的过程中, 许继慎再度抗命, 用自己的真知灼见一举扭转了战局。可惜, 当时他的“知音”少得几乎可怜, 仅有舒传贤等极少数人。

在许继慎满载东征硕果返回苏区时, 迎接他的竟然是一纸命令, 即将其由军长降为红十一师师长。这次临阵换将, 连徐向前都看不过眼去, 他晚年议论道: “其实, 旷继勋并不比许继慎强。许继慎这个同志是行的, 指挥打仗有一套, 带兵也有经验, 就是英雄主义厉害点。”【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89、90、94 页) 而且, 更令人惊诧的是, 在鄂豫皖地区执行“立三路线”“最出力”的郭述申仍旧被任命为新特委的组织部部长, “整理军队缺乏多量把握的”的蔡申熙却成为新成立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事实上, 这些矛盾的“线头”在新任特委书记曾中生眼中同样也是一堆“乱麻”。从现存的曾中生于 1931 年 2 月上旬(此材料并无准确时间, 编辑者根据内容判定是 2 月上旬)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我们可以知道, 在鄂豫皖新特委中, 曹大骏、余笃三、许继慎等人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而且, 并不容易解决。不过, 曾中生也指出一点: “军委的指示于许(许继慎)是没有异议的, 惟一般对许是有点过于工计的。”而且,

曾中生最后还说：“许继慎的问题，熊一暄（应作熊受暄）的问题，……已无问题。”【注】（《鄂豫皖特委曾中生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

由此可知，曾中生在新特委中为了调和各派的矛盾，可谓煞费苦心。而且，就前后三任主持鄂豫皖大局的领导者之于许继慎的态度和看法来说，曾中生无疑是比较公允的。他至少看出上层对于许继慎有些“误解”，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倪志亮从上海回来，曾经悄悄地跟徐向前讲过：“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101页）然而，许继慎之所以“关系复杂”，正是中共中央借助许继慎个人的关系所展开的统战工作所造成的。一边让他去同“非我力量”打交道，一边又指责他关系复杂，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无语。而能够对着这类“令人无语”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的，在鄂豫皖三任领导中，曾中生是唯一的一位，也是最突出的一位。尽管他也承认许继慎“有问题”，但同时却表示这些问题“已无问题”。虽然他还不能完全跳出旧有的用有色眼镜看待许继慎的窠巢，可在实际使用上，他还是尽可能地发挥了许继慎的专长，相对比较充分地尊重了许继慎的意见。也唯独在曾中生这一任鄂豫皖党政军一把手当政的背景下，许继慎的“抗命”是较为“安全”的。

可是，包括曾中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再向中共中央申请派来更多的政治、军事干部的结果是让张国焘等人因之钻了空子，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句老话居然在鄂豫皖大地上变成了至今都令人难以忘怀的血腥的事实。

（二）.各色嘴脸

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一行抵达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当时是中共中央三位常委之一（另二人为向忠发和周恩来），他是“自愿”提出到鄂豫皖苏区来整合“革命力量”的。而且也深得中共中央的器重。不过，中共中央还是给他安排了两位副手，即陈昌浩与沈泽民。陈昌浩、沈泽民是王明在莫斯科时期的“亲密战友”。王明回到国内，主持中共江苏省委（即江南省委）工作期间，陈、沈二人又不遗余力地支持王明。1930年12月底，王明策动召开江苏省委出面的一个扩大的上海市各区区委书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沈泽民、陈昌浩主要发言，陈昌浩还指名攻讦何孟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直接向中共中央要了一批干部由江苏省委使用。而这批干部的人选名单是陈昌浩、李竹声事前在王明住处同王明一道商量决定的。【注】（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因此，这次陈昌浩、沈泽民“驾临”鄂豫皖本身也带有“监军”的职能。所以，张国焘之到鄂豫皖同夏曦之到湘鄂西还有一层不太一样的地方。

张国焘下车伊始，首先了解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干部的情况。他从一些人的口中以及他自己走访的经过了解到两点关于许继慎的基本情况。第一，“师长之中又以许继盛（许继慎）最能干”；第二，“许继盛（许继慎）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在军事指挥上，张国焘是“门外汉”，宋人范镇《东斋记事补遗》言道：“欧阳永叔每夸政事，不夸文章，蔡君谟不夸书，吕济叔不夸棋，何公南不夸饮酒，司马君实不夸清节，大抵不足则夸也。”正是这种“不足则夸”的思想作祟，张国焘在晚年回忆自己在鄂豫皖的所作所为，极尽笔墨渲染除开军事指挥外其他的“名山事业”。不过，这套把戏即便在张国焘没有给“批臭”之前也被人给看穿过，比如曾中生就曾一语道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方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题。”【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212页）事实上，不独张国焘，此类“不足则夸”的现象在后来的历史行程中仍旧被反复地上演且花样翻新。

张国焘当然很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军事上他必须借重于一批鄂豫皖现有的军事骨干。环顾左右，无疑，许继慎是最为出色的。可许继慎无疑也是最难剃的“刺头”。于是，张国焘一方面提拔蔡申熙、徐向前进一步到军事决策层圈，一方面则借助于6月底召开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沈泽民的公开发难，敲打许继慎。

1931年6月28日在新集召开的中共鄂豫皖分局扩大会议上，身为分局委员的沈泽民突然公开炮轰许继慎，“在大会中公开指斥高级将领，在鄂豫皖区还是空前的创举”【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244页）而沈泽民罗列的所谓“罪责”，无非是指责许继慎的生活作风问题。遍观鄂豫皖苏区领导人留下的回忆文章或者回忆录，谈及许继慎生活作风的只有张国焘和徐向前，徐向前只说了一句“（许继慎）生活上散漫些。”【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102页）而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则铺陈了相当一部分内容。应该说，侵袭妇女问题在鄂豫皖苏区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突出现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任皖西北特委书记的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也专门提出。然而，具体到许继慎个人，及至他最后被诬陷、错杀之际，属于在政治上已经被打倒的对象，能够真正摆在桌面上的所谓“生活作风”也就是他与王望春之间的恋爱关系。诚然，许继慎尚有妻室谭冠玉，可在当年那种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共党内相当一批领导人都有着类似许继慎的这种经历，包括批判许继慎的张国焘早年被捕后，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呈送的报告中直接谈及张国焘的个人生活“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由是观之，利用所谓“生活作风问题”敲打许继慎其目的就在于要从政治层面上搞臭许继慎的名声，这是举凡搞“左”的一套斗争手法中特为常见也最为卑污的一幕。

但是，眼下张国焘还不想利用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彻底搞臭许继慎，既然有人唱了白脸，这就更利于他出来收拾残局，唱红脸。正如王海容所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以往的党史教科书喜欢将张国焘脸谱化，仿佛这个人到鄂豫皖就是为了作恶。其实，我们不应该忽略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组成鄂豫皖的政治“三驾马车”，以陈昌浩、沈泽民之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张国焘很难做到像夏曦那样“唯我独尊”，至少一开始不具备这种条件。实际上，即便是后来到了川陕苏区，张国焘还要让陈昌浩几分。有一次，陈昌浩在发布的布告中署名排列在张国焘之前，张国焘看后不满，私下里议论：“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么签署布告行吗？”【注】（《徐向前传》，164页）在对待许继慎的态度以及对鄂豫皖苏区现行的一些政策上，沈泽民远比张国焘“激进”，他很早就鼓噪要搞党内斗争，许继慎同他之间的矛盾以及曾中生对沈泽民的不满都是半公开化的。如果仅仅注意到张国焘打击许继慎的一面而忽略了沈泽民、陈昌浩等人在其中所扮演的令人玩味的角色的话，那么诠释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必将不会是完整的。

张国焘综合了沈泽民的意见，也夹带了自己的看法，写成了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内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一部分红军干部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行为，给日后算总账留下了余地。而在同时期产生了另一份由张国焘所作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却只字不提妇女问题了。张国焘给许继慎端上来两道“菜”，一道是团伙斗争六霍暴动的领导人舒传贤，舒传贤是鄂豫皖苏区内为数不多的全力支持和理解许继慎的，打掉舒传贤既是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形成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效忠，也是对许继慎的一种警示；另一道则是任命许继慎为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北分会主席。这两道“菜”又打又拉，目的就是要许继慎“靠过来”。而且，不仅仅是针对许继慎，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形成的决议中多处刻意强调“加强纪律”、“加强军纪”。加强纪律本无可厚非，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强调“纪律”的背后实则是旨在培养一大批驯服工具作为他们日后推行“极左”路线的马前卒。

当然，“缚虎不得不紧”的道理张国焘也很清楚。虽然许继慎头上顶着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皖西北军分会主席的桂冠，可实际地位却有所变化。张国焘将其从原十一师师长的位置上调换为十二师师长，是为“调虎离山”。同时，张国焘提升徐向前担任军长。在张国焘的眼中，徐向前有两个优点是许继慎“无法比拟”的，一个是“并不露锋芒”，再一个是“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242页）周维炯在任命下达后就公开讲：“军委会用人不公。”【注】（马德俊《许继慎传》，245页）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共中央去的报告中也说：“在军委会上一致通过以许（徐）向前同志担任军长，旷任十师师长，但是许（徐）的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注】（《方英关于红四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7月1日）许继慎死后半个多世纪的1983年4月18日，少将徐国夫还对来访者说：“在鄂豫皖，红军战士都知道许继慎，他威信高，大家对许继慎印象最深。”【注】（马德俊《许继慎传》，259页）当日，徐国夫还只是一名班长而已。

张国焘等人就是试图用这种一拉一打的作法逼许继慎就范。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1931年7月初，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讨论红四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时，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被迫接受曾中生、许继慎的正确意见，同意红军南下作战向外发展，但因为无谓和外行的争论，已经使这一正确的主张被足足延误了一个月之久。南下后仅一个月的时间，曾中生、许继慎就率部连续攻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城，前锋威逼黄梅，武汉、九江全线震动。根据对战争的实际情况的考察，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人普遍认

为中央分局指示他们拿下英山后出安庆的作法并不切合实际。因而，他们临机决断，并且就此情况的变化给中共中央去了报告，专门详细地阐述了他们的全部想法。在这份报告的结尾处，曾中生、徐向前提到了许继慎，谈到了第三党方面派人同许继慎进行联络的事情，而且为许继慎做了一下担保：“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

1931年8月27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措辞严厉的来信，指责曾中生犯了“政治错误”，并要求他们“接信后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早在决定红四军是否向外发展的军委会会议上，沈泽民就反对南下的主张，张国焘反倒是支持曾中生等人的意见。【注】（《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七月间，张国焘患病卧床不起，由沈泽民代理中央分局书记，蔡申熙代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27日的这封口气异常严厉的来信是沈泽民起草的，蔡申熙也应该是主要知情人。因为之前沈泽民等在红四军向外发展的问题的固执己见已经使得红四军的领导人在心里对他有了成见，这次得知来信又是出自于沈泽民之手，因此，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决定在鸡鸣河召开会议公开讨论分局来信，采用“大民主”的手段予以回击。鸡鸣河会议的结果是多数人反对红四军北上，并且责成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分局汇报。新近接替熊受暄担任许继慎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的吴焕先反对曾中生、许继慎的作法，认为在组织上，行动上应执行分局的命令北返。徐向前后来说：“鸡鸣河会议……但从组织原则上来看，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98页）1945年编撰完成，署名徐向前、倪志亮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一文中再次重申了徐向前的这一观点，“当时军部在组织上确有反抗分局命令的现象……这在军事组织上是不允许的。”

刘士奇带给中央分局的来自于红四军多数干部的来信是10月21日送交到沈泽民、蔡申熙等人手中的。这封信抬头写的是“国焘同志 中央分局并转军委会”。由此可以看出，曾中生他们还对张国焘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之前的来信纯粹是由于一些人在张国焘卧病期间“播弄”出来的。红四军的正常讨论军事工作的来信却意外地激怒了中央分局的几个主要头头，他们旋即在很短的时间里炮制出《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撤销曾中生的军政治委员职务，并把这一事件上升到政治高度和路线高度。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人竟然将此间来信同几个月前第一次扩大会议后人们对于沈泽民等人的议论联系起来，认定散布“谣言”的始作俑者是许继慎。【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265页）

这样一来，夹杂着大量个人私怨和工作分歧的决议案即将给许继慎带来的必定是灭顶之灾。而且，最为可怖的是中央分局几个头头的看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中共中央的指示较之中央分局的安排还要严厉。本来，张国焘考虑要曾中生除去军政委职务后可以继续留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一职，中共中央强烈反对。在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的信中重点提到了许继慎的“问题”，还用了“密”这类的字眼。许继慎接下来的命运似乎已经无须预告了。

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派遣王明的亲密战友陈昌浩赶赴红四军军中代替曾中生出任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亲自驾驶飞机飞到红四军所在地。他一下飞机，先让人杀了红四军 28 团团团长潘皈佛。此前，鄂豫皖政治保卫局“破获”了一起投毒案，以虚妄的罪名抓捕了潘皈佛的妻子，经过酷刑熬审，潘皈佛妻子“招供”参加了“AB 团”，据此还供出了李荣桂，继而搞出了一个“庞大的 AB 团反革命组织”。其实，AB 团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陈正人的老师李松峰给陈写信专门提及此事，他在信中说：“你们牵强附会地把 A 与 B 两个字母联在一起，错误地认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 AB 团，……你们捕风捉影地杀 AB 团，死了一大批你们的好同志。”【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正人传》135、136 页）然而，肃反运动的推动者却并不在意这些内容。适时，中共中央已经给各苏区转发了关于“富田事变”的相关文件，效法中央苏区大抓“AB 团”已经成为大趋势。许继慎从前线归来，征尘未洗，方英冒死派人送信给许继慎，告知陈昌浩来了，大肆抓人，肖方等均已被捕，许继慎自信能够讲得清楚，坦然回到驻地，可等待他的是政治保卫局的绳索。

许继慎被捕不久，周维炯也被诱捕。陈昌浩从军部获取了此前许继慎主动上交的国民党曾扩情的来信，曾中生早已确认这是敌人的“破坏”、“挑拨”。但在陈昌浩眼中，这封信却有着不同的含义。而且，也正是以这封信作为开端，许继慎就此跌入深渊。在红四军军部驻地，许继慎、周维炯受到严刑拷打，用担架蒙着白布抬着行军。据张国焘回忆，陈昌浩之所以能够顺利接掌红四军的领导权，“尤以徐向前的立场坚定，起了领导作用。”在处置许继慎的问题上，“徐向前等认为，……许继慎和他少数亲信的言行，应当彻底查究。”【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269 页）而徐向前晚年回忆则表示许继慎的被捕他并不知情。两说究竟孰是孰非，有待历史的考证。不过，许继慎被捕后，时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的蔡申熙致徐向前、刘士奇、王树声等人的信中如是说道：“兄等能以坚绝之手段，处此稍纵即游之事，不仅挽鄂豫皖苏区前途于累卵，直已建最后胜利之坦途矣……。”【注】（《张国焘传》，205 页）张国焘在事后的 1931 年 11 月 25 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四军干部如陈昌浩徐

向前刘士奇甘济时倪志亮康永顺王树声都非常坚决，大大锻炼了他们。”【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1931年11月25日）如果前方主要军事领导在抓捕许继慎过程中完全置身事外的话，想必蔡申熙不会发出如此高调的议论。

前方抓捕许继慎，后方有人心花怒放，各类表演相继登台。就在中共中央11月3日的来信下发三天后，沈泽民便迫不及待地抛出“什么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淘汰异己分子”的文章。陈昌浩也不甘寂寞，也抛出“红四军中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文。直到许继慎已然遇害一个月后，时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徐宝珊还抛出“肃反工作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情急之中居然将“许继慎”的名字写成了“许继勋”。由红四军的肃反进而演化成为整个鄂豫皖苏区的肃反狂飙就是这样开场了。

以往党史教科书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解释往往侧重于对张国焘的谴责。事实上，如果没有当时中共中央的批准和支持，没有一大批中高层干部的理解和追随，张国焘区区一人何能为也？张国焘强调阶级成分的作用，大力排斥知识分子，这是事实不假。但早在1928年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中便已然有了这样的苗头；成仿吾、梅少卿等人都回忆说张国焘诱迫一些十五、六岁的勤务兵为他侦察干部的言行以至于一大批干部一夜之间不知去向。【注】（梅少卿《回忆鄂豫皖边区的斗争》）可是，诱使未成年进行政治犯罪的迹象并没有因张国焘的去国而彻底消失。而且，在鄂豫皖苏区（包括后来的川陕苏区）内部，一些老资格的领导主动充当张国焘与中央分局的眼线进行告密活动也是史有明载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廖承志与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下河洗澡，郑义斋偶然间发现廖承志的旧腰带里缝了纸币和金戒指（这是廖母何香凝给廖的盘缠，廖本人并不知情），旋即告发说廖承志是国民党特务，廖因此被捕。【注】（铁竹伟《廖承志传》，93、94页）王树声的二嫂、弟弟、妹妹均在肃反中被清洗。然而，在西路军战败后，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原任红四方面军独立一师师长）李彩云不过对张国焘背后发了点牢骚，即被王树声以“擦枪走火”的名目打死了。事隔50年后，杜义德亲口承认此事系他与王树声共同所为。【注】（董汉河《西路军沉浮录》，423-432页）在“鸡鸣河会议”上坚持“组织原则”的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后来受到中央分局的格外器重，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政委以及鄂豫陕省委书记等要职。徐文伯根据其父、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生前回忆整理的历史资料显示，红二十五军历史上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肃反，从1932年10月至1934年11月，主持肃反的是鄂豫皖省委负责人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注】（徐文伯《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

的一些情况》)前两次肃反期间,鄂豫皖省委书记系沈泽民;后两次肃反期间,鄂豫皖省委书记系徐宝珊。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始终系吴焕先。1935年7月17日,身兼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的吴焕先还在《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里指称陕西党组织的上层同法西斯分子有联系。据此引发红二十五军深度介入陕北肃反运动,而这时距离吴焕先战死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历史的真相从不会因为岁月的推移而消逝,各色嘴脸的表演也不会因为暂时的遗忘而变得模糊。在许继慎被错捕的话题上,所有参与者的灵魂势必都将接受历史的拷问。

（三）.白雀园

冷欣后来对陈毅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这段话历来被认为是杀害许继慎的一个有力佐证，即历来习惯给戴上的帽子一上当受骗。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轻松，纵观党史，因国民党方面施行反间计导致中共方面出现重大伤亡事故的现象并不多见，尤其是像许继慎这样的高级将领居然能够死于“蒋干盗书”一流的把戏，更是匪夷所思。国民党军进驻赤城时，由飞机上丢下一封刘峙给张国焘的信，内容是张国焘派去的人已经见到，张国焘那么办事是中国民族前途的大幸，请趁早下手云云。该信被沈泽民看到，沈泽民认为这是典型的挑拨，付之一笑，随即交给张国焘本人。【注】（《沈泽民关于自己“左”倾错误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0月4日）可见，想要识破诸如此类的把戏并不困难，问题在于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头头们不想“识破”。为什么不想“识破”，那是因为“斗争”的“需要”。

1931年6月28日召开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三天后，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就宣告重新改组成立，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员周纯全担任局长。从此，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成了张国焘树立个人权威的一柄利刃，也成了苏区上下谈之色变的“怪物”。可是，这柄利刃究竟应该刺向谁，怎么刺，刺多深，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头头们的心目中自有其尺度。比如曾中生、方英的结局就很能说明问题。1930年2月12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合并中央军委和军事部，组建新的中央军委，以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为常委。曾中生不仅在党内上层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其印象也很深刻。直到林育英在给张国焘的电报时还用共产国际的名义要求张保证曾中生的生命安全。所以，曾中生尽管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但一直到长征结束仍免于牺牲。至于他在卓克基是否死于张国焘之手，党史界历来有争议，刘统所著《北上》一书也将此问题存疑。再比如方英，因为有着留苏的特殊经历。因而也躲过被公开处决的厄运，死于长征途中多种疾病并发。再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那就是有些鄂豫皖的高级干部、军事领导人，尽管自己的枕边人或直系亲属被肃反运动杀害，却并没有影响本人的地位，这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好理解，或者就被解读为某某同张国焘做过斗争的依据。实际上，这在国际共运史上并非罕见。联共十八大后，斯大林问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听说米哈伊尔同右派有来往，你知道吗？有确切材料。”卡冈诺维奇毫不犹豫地说：“那就逮捕他。”米哈伊尔是卡冈诺维奇的兄长，时任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是一位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在得到弟弟的电话通知后自杀了。而卡冈诺维奇则因为经受住了“考验”继续青云直上。那么，作为同样是由中共中央派遣来到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为何就

一蹶不振了呢？如果从内因来说，许继慎身上有着突出的“弱点”。苏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斯大林式的政治局委员（以卡冈诺维奇为例）通常具备以下三个要件，第一，超人的工作能力；第二，在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自己的见解；第三，绝对执行命令。【注】（《胜利与悲剧》第一册，458页）可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来自于上层的因素绝不可忽略。

我们前面提到过，在同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打笔墨官司时，鄂豫皖中央分局曾致电中央，中共中央随即答复肯定了分局的处理决定。就在这份电文中，中共中央是这样提及许继慎的：“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应作王葆斋）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注】（《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正是这封信成了日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许继慎问题上敢于杀伐决断的主要依据。

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这份中央来信是谁起草的呢？或可说代表了哪些人的意志呢？许继慎生前好友胡允恭回忆说许继慎在皖西时曾经将王明的堂兄陈铁的财产抄没，令王明怀恨在心，还借舒传贤的嘴说王明不满意许继慎在六安让地主们扫地出门。【注】（胡允恭《金陵丛谈》，115页）可是，张国焘的回忆则明确说一些地区的地主富农经常“出入许师长之门”。而且，1931年11月时，王明早已前往莫斯科，不可能代中共中央起草这份电文。1931年1月31日，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具体负责军委和苏区的工作。《周恩来传》说：“在四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红军和苏区工作的指导方面。”【注】（《周恩来传》1898-1949，上册，287页）另据罗青长回忆，红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工作始终是周恩来在领导。【注】（罗青长《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我们也都知道，1931年9月下旬，因王明要去莫斯科，周恩来要去江西，遂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为“看守内阁”。但在布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时，王明强调过，等到将来中央正式政治局回到上海或迁到有相当人数政治局委员的地方时，临时中央政治局结束并交出工作任务。且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王明同时还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轮流担任主席。【注】（《王明年谱》，215页）博古生前自述说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他负总责，但周恩来当时还在上海，一直到12月上旬才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下发的公函悬赏缉拿中共要人，以瞿秋白、周恩来赏格最高，银元两万元，王明、博古、张

闻天、沈泽民等次之，才一万元。这至少说明周所身处的实际地位。换言之，这份标识为11月3日的电文稿周恩来是否知情？《许继慎传》的作者认为这份电文可能出自李竹声之手，但却没有有力的证据。退一步说，如果出自于他人之手又是如何绕过周恩来的？陈昌浩在彭阳军事干部学校作报告时提到了一句“那时中央派人与他谈话，老许表示悔过。”这是讲许继慎同第三党的关系。这里的“中央”又是谁？“派人”谁派的派了谁？都不很清楚。按道理讲，许继慎的情况，周恩来无疑是最熟悉的。既然如此，所谓“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中的“情报”是怎么得到的？从谁手中转过来的？周恩来是不是很清楚？以上这些内容可能一直是个谜，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等人组织了对许继慎的“公审”。许继慎虽然已被血肉模糊，却宁死不屈，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口供便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是改组派。”11月下旬，许继慎、周维炯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被秘密处决，其后许继慎的新婚妻子王望春也被杀害。11月22日，许继慎尸骨未寒，陈昌浩就跑到彭阳军事干部学校大放厥词，表起功来了。他在这份又臭又长的报告中对许继慎极尽诋毁之能事，特别提到许继慎的新婚妻子王望春，陈昌浩的原话是“王鄂平的妹子，很漂亮的”。陈昌浩在个人生活上的丑闻，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晚年所作回忆录《往事琐记》中有详尽记载，此处不赘。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秦邦宪），表示拉拢，为博古所峻拒。【注】（黎辛《对秦邦宪同志的深情怀念》）就在陈昌浩的报告结束后三天，张国焘给中共中央去了报告，为许继慎一案做了“盖棺论定”，称之为肃反的“胜利”。

1945年中共“七大”上，许继慎连同很多被错杀的干部得到了平反，宣布为烈士。可不知何故，许继慎的家乡始终没有承认许继慎的烈士资格，家属也没有享受烈属待遇。直到有一年，许继慎的遗孤许民庆进京找到徐向前，徐亲自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写信才算解决了这一问题。【注】（《徐向前传》570页）

许继慎年甫三十，即被残杀。在他身后，类似悲剧层出不穷。鄂豫皖苏区一度为“成分论”、“血统论”所笼罩，举凡需要出头力争的，诸如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这样量级的人物都畏缩不前，推举詹才芳出面，王树声对詹才芳说：“你是贫雇农，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又读过几年书，还是由你出面，保险些。”多年以后，詹才芳悲愤地回忆说：“要知道那时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而知

识分子犯错误呐，要罪加一等啊。哼！这跟‘文化大革命’搞的‘唯成分论’不是一样的名堂吗？”【注】（《战将的足迹》，101页）借用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那句话说就是：“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13.夏曦与“湘鄂西大肃反”

(一) .不辞而别

夏曦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在北伐时期的主要首脑之一。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夏曦、郭亮等人立刻在湖南发声讨。4月14日，夏曦在有十万余人参加的湖南省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大会上情绪激动地发表了题为《肃清反动派与团结革命势力》的演说。他开宗明义地告诉与会者：“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要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反动派是什么？就是保护垂死的旧制度，反抗革命的人们。所以，革命必须扑灭反动派，肃清反动派。所以我们可以说，革命工作一日不停止，肃清反动派的工作，便一日不能停止。”【注1】五天后，夏曦又意气风发地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代表湖南省党部向会议报告了湖南省的土地情况。而半个多月后，夏曦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一共有32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夏曦在其中排名第17，列在向忠发、顾顺章之后，排在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张太雷之前。与夏曦同时入党的郭亮被选举为候补中央委员。而当年新民学会的战友，一度是夏曦的上级的毛泽东也出现在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里。应该说，此时的夏曦不仅在湖南党拥有了较高的声望，即便在中共领导层内也被看好。因此，大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就派夏曦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任中央负责组织工作。

在4月14日的演说中，夏曦曾饱含激情地指出：“……不能和平地建设新湖南了。要用革命的手段，同反动派作激烈的争斗。”事实上，“反动派”也无时无刻地不想同“革命派”作“激烈的争斗”。“五大”结束后大约十天左右，李维汉同夏曦开始办理交接。而此刻距离湖南“马日事变”（简称“马变”）已经不足两天的时间了。

其实，“马变”并非从天而降。之前已有所预兆。中共湖南省委还由此通告各县，工农武装要准备就地自卫。该通告原件虽未发现，但据柳直荀的回忆，“事变之前，我们知道事变之将到”。【注2】这样，就在五月二十日晚，夏曦以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主持省委会议。夏曦提出，如果事变发生，公开活动的领导人如郭亮、夏曦、李维汉等需要转移。同时决定成立秘密省委，指派薛世纶、

王则鸣、林蔚为临时省委委员。当晚，曾与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少将政治部主任的徐君虎找到夏曦，探询一下有关时局的想法。夏曦还很乐观地告诉徐君虎：“在湖南即令有一两万军队捣乱，农民的梭镖也可以解决。”【注3】

可是，到了五月二十一日，也就是“马变”发生的当天，身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夏曦却突然出走。李维汉回忆说：“马变当天，早餐后，接到报告说：夏曦未告知省委，出走了。他在国民党省党部留了一张条子，说是去武汉中央报告工作去了。”【注4】结果，原定在国民党党校开学上由夏曦代表中共湖南省委的讲话也只好改由李维汉出面了。对此，谢觉哉回忆：“马日上午，国民党党校正式开学，来宾不少，可是在国民党内负责组织工作的夏曦和党校教务主任李达……都没有来。”【注5】因为夏曦的“不辞而别”（此句为李维汉所用），湖南省委不得不临时推举郭亮任书记。而夏曦出走之前，由省委指派的秘密省委的成员之一的薛世纶也带着妻子跑了。后来看到情况还不算特别糟糕，这才重新又跑了回来。等到“马变”枪声响起来后，这位临时省委的成员薛世纶居然吓得钻到了床底下。【注6】

郭亮主持的省委会议原本决定动用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予以应变。但遭致反对，会议开到半夜议不出个所以然来，竟不了了之。夏曦到达宁乡、益阳以后才做出反击的姿态，他命令湖南省农民自卫军总队长武文元率领三大队回长沙集合一、二两大队，占据宁乡作为依托。转扑益阳，但未获成功。【注7】几乎与此同时，湖南国民党当局听闻夏曦隐蔽在老家益阳县桃江镇，遂派兵将夏曦全家抄没，夏曦本人逃脱。

因“省委自身走得很乱”，湖南党的其他成员开始也只能各自为战。临时省委成员之一的林蔚利用兄长林泽生的关系隐蔽下来做地下工作。而柳直荀则直接揭竿而起，率领农民自卫军围攻长沙，潘心源等也率众响应。一时间形成了“十万农军扑长沙”的阵势。可接下来的局势却是“功败垂成”。关于“马变”之所以落败，历来说法不一。例如柳直荀在事件发生一年后发表的文章中将失败原因归纳为这么几点——“当时的共产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而只是一个反攻，不是知道事变将至，取积极进攻的计划。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仅有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於五月三十一日进攻长沙的计划，同时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附近三十里的姜畲地方，但因没有适当的指挥人才，结果是被敌人

各个的击破。而约定进攻长沙的各处工农义勇队，因为在省的负责人不知道武汉方面的实际情况，又听说国民党中央派人来湖南调查和解释误会，以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收拾，中途改变方针，叫他们停止出发。……这次起义事件失败的总原因可说是中了机会主义的毒。”【注 8】蔡和森则将在《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和《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指责李维汉。柳、蔡等人的说法固然措辞严厉，却都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反倒是谢觉哉在事变发生十六年后的某些议论颇中要害。

谢觉哉认为：“不知道斗争要力又要术。……在政治上却不惜得罪人，硬要行自己的。对于人一反动的人，不知把弱者拉到自己方面来或使之中立，反而专拣弱者打，如…杀叶德辉等，使自己孤立，既无实力，也无阵容。”杀掉叶德辉正是出于柳直荀之手。对于以夏曦为首的湖南省委的表现，谢觉斋也如实记录：“后来我遇到常德一位负责同志，深怪当时省委没有点消息给他们。不知当时省委自身走得很乱，何况外县。”【注 9】一句“省委自身走得很乱”道出了“马变”结局逆转的部分真相，也道出了当事人对省委领导者的真实看法。

夏曦的不辞而别，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有的党史研究者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行为是“临阵脱逃”【注 10】而《中共党史人物传·夏曦》的作者也指出：“夏曦处此紧急状态，临时慌乱，枪未响先行离开。……作为省委书记，这是夏曦在‘马变’之际的一个突出缺点。”【注 11】

（二）.夏胡子

“马变”之后，中共中央部分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准备组建“湘南政府”，提出以毛泽东、郭亮、夏曦、柳直荀、任卓宣组成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但这个决定旋即被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否决了。原因很简单，柳直荀、郭亮被周恩来抽调去搞军事工作，夏曦此刻已经由湖北转道江西。

1927年7月25日下午，夏曦在牯岭大街上遇到了准备去南昌的沈雁冰。夏曦告诉沈雁冰，恽代英就是从牯岭翻山下去的，郭沫若因为晚了一步，这条路就给断了。夏曦给沈雁冰留了地址，约第二天见面。次日，沈雁冰去见夏曦，夏曦说此地不宜久留，他自己也很快要离开。果不其然，过了几天，沈雁冰就从

范志超那里得知“南昌出事了”。【注 12】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国民日报》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署名包括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夏曦等。据李维汉回忆，夏曦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7 年秋冬，夏曦来到上海。在上海的几个月是非常难熬的。夏曦是南京国民政府“清党”后首批通缉的要犯，在通缉的 193 人中，夏曦名列“前茅”，排第 14 名，他的后面才是邓演达、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注 13】特别是南昌暴动，上海地方当局严令缉拿由江西南昌过来的行为异常人员。因而，夏曦不得不格外谨慎。1928 年春，夏曦在组织上的掩护下，秘密抵达莫斯科，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有个外号叫“老头子班”。盖因学员中的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林伯渠年龄偏大所致，夏曦与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都编在这个班里。夏曦年方 27 岁，还算不上老头子，但因为留了胡子，得了个外号“夏胡子”。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银色别墅里召开。夏曦被选为浙江省的代表，却无缘于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注 14】7 月 21 日，夏曦在这幢别墅的宿舍里写成《夏明翰传略》，算作对已于 3 月下旬作古的战友的一种怀念。这篇短文至今读起来还仍旧能够感受到它的质朴的风格，虽然个别文字不够通顺，但相对后来的那些一律歌功颂德的文章又实在不可以道里计。夏曦肯定了夏明翰的坦率、诚挚，同时也不掩饰地流露出自己对夏明翰的真实看法。包括他认为夏明翰的弱点是“不能依据自己的主张与同志作坚决的理论上的争斗”。甚至夏明翰的一段恋爱也经由夏曦的笔端让人们有了不同的视角——“明翰同志在两年前还未结婚，他与一位女同志是有很深的爱情，但她已有了爱人。‘恨不相逢未嫁时’常是明翰的感伤语。因此，明翰同志做事虽然努力，又很精细，但常常总是疲弱的样子。”此外，夏曦在述及夏明翰力主武装暴动时，认为夏明翰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拼命主义”，这段议论区区几十个字，却将夏曦和夏明翰的各自主张以及思想轨迹勾画出基本的轮廓。可能是因为身居国外缺少足够的资料作辅，夏曦这篇文章搞错了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夏明翰死亡的时间，他记作 1928 年 3 月 23 日，实际是 3 月 20 日；夏明翰死前吟咏的是那首“砍头不要紧，主要主义真”，夏曦却记作“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竟把汪精卫的诗放进了夏明翰的口中。【注 15】

对战友的缅怀与对往事的追记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国内的政坛风起云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湖水”同样也深不可测。夏曦与王明等人原来素无渊源，用杨尚昆的话说：“夏曦……开始还和王明等作过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注 16】1929 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支部局改选，夏曦当选为支部局委员，与另一位新当选的支部局委员杨尚昆一起担任支部局宣传部副部长，这个位置之前曾经是王明坐过的。该年夏季，“中大”举行全体师生总结工作大会，又称“十天大会”，就书记所作的报告进行表决。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一个名词，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据说是余笃三给起的。夏曦忝列其中。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指的是支持党支部局的只有 28 名共产党员和 1 名青年团员，合计为“二十八个半”。孙冶方回忆：“据我所知，此事发生在中大一期毕业之后，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表决支部局一个决议，赞成者仅二十八票，弃权者一票。因为当时主持支部局工作的主要是王明派，即：博古、夏曦、杨尚昆、王云程等人，他们都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反对他们的人挖苦说他们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注 17】在“十天大会”期间，夏曦为了支部局方面能够获得多数票，做了不少的分化性的工作。例如吴玉章本来是投支部局反对票的，夏曦就对吴玉章说现在有人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吴玉章一听反党就不干了。【注 18】

“十天大会”后，“中大”内部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具体表现为 1929 年 10 月开始的“清党运动”。在这次“清党运动”中，有两件事无疑给夏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张言轻的自杀，一个是瞿景白的失踪。据称张言轻是所谓的“托派组织”的头子，他的死暴露了校内所谓“托派”的成员；而瞿景白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的弟弟，陈修良、杨尚昆等人都回忆说瞿景白因为撕掉（或者退掉）联共候补党员的党证，进而失踪。一直以来，包括瞿秋白的亲属也都认为瞿景白失踪或者遇害。一些党史研究者也是如此认为的。不过，有两个旁证可以说明瞿景白的结局并非那么简单。

1948 年 6 月 18 日，张国焘约请郑学稼办刊物。在此前后，张国焘还约请了魏道明、瞿景白等人。这段记载取材于发表在台北《传记文学》第 36 卷第 1 期的郑学稼的回忆文章。【注 19】如果郑学稼没有记错的话，显然瞿景白当时尚在人间。此外，还有一则有关瞿景白的史料值得关注。1931 年 3 月，已经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校阅《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录》，并为该书作序。刘少奇写道：“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在于有系统地叙述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几个重要地方的工人运动的情形，这些材料在中国有许多是散失了的。”而这本小册子就是瞿景白所编，于 1931 年由中共中央出

版局印行。【注 20】我们都知道，当时刘少奇是深受共产国际器重的，据张闻天在延安写就的“整风笔记”中介绍，1931 年 9 月宣布的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 9 人名单中，刘少奇、黄平两个人的名字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专门加上去的。以刘少奇这样的身份，出面亲自校阅瞿景白编著的小册子并为之作序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果瞿景白真的像一些人回忆的那样，或失踪，或遇害，那么，这本小册子怎么会在两年之后经由中共中央出版局印行呢？即便印行，也应该是用作批判的，而刘少奇的序言中，我们除了看到刘对这本小册子的不足之处的温和指出，丝毫看不到一丁点的火药味，更没有疾声厉色的指斥。由上述两份史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瞿景白的最终归宿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经过了层层“考察”和种种“考验”之后的夏曦终于在 1930 年回到了中国。先是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委那时的位置和作用举足轻重的，用向忠发的话说：“江苏工作是领导全国的”。【注 21】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王明一派的“土伦”，夏曦虽然没有在中共“六大”上“连庄”，却在这次全会上给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这次补选的四位候补中央委员，除曾炳春外，其他三人即夏曦、沈泽民、王云程无一例外都是备受王明等人重视的。1 月下旬，夏曦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阵容颇为强大，主席先后由张闻天、周恩来担任，委员则囊括王明、沈泽民、毛泽东、任弼时、李富春、关向应、王稼祥、博古（秦邦宪）、潘汉年等。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夏曦、沈泽民调往赣东北负责。但在 3 月里，中央常委会又改变了决定，调夏曦为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湘鄂西特委、湘鄂西省委、鄂豫边特委、鄂豫边临时省委，并指导湘鄂赣省委，权力很大，是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第三号政治地带。就此，夏曦的个人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当然也是带有浓重的“左”的色彩的一页。

事实上，在夏曦空降湘鄂西之前，“左”的这套东西已经在根据地横行了。具体表现在一些工作中的分歧会被上升到路线斗争的层面进而导致屠刀相向。1927 年 7 月加入中共，后任红 50 师师长，被国民党湖北当局悬赏万元捉拿的李步云就是死于“左祸”的一个典型。李步云以敌众我寡坚持搞游击战，却被中央代表、红二军团前委书记邓中夏、中共湘鄂西特委巡视员周小康（原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视为“再不能容忍的右倾机会主义”。红二军团前委在接到中共长阳新县委的汇报后未经调查，即派周小康率两个营的武装到县委驻地，以开会名义从前线调回李步云，立毙枪下。同时还处决了在家养病的红 50 师政委江山。【注 22】而之前，周小康已经以所谓“不服从党的领导”为名，在 1931 年 1 月

将 5 路军指挥陈连振等人杀掉，并撤销了该路军番号。贺龙的结拜兄弟邓仁山的未亡人谷德桃（人称“谷大姐”），曾经多次掩护贺龙，却被周小康扣上“通敌”的罪名杀掉，贺龙的妻子蹇先任作保也未奏效。【注 23】

本来，湘鄂西根据地的“老土地”段德昌、万涛、彭国材等人对邓中夏、柳直荀的过“左”的瞎指挥已经怒不可遏，希望中央能够尽早地派人来纠偏。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派来纠偏的夏曦较之邓中夏、柳直荀还要“左”上若干倍。以“极左”来“纠左”的做法在夏曦之前有过，在夏曦之后更有过。

1931 年 3 月 15 日，夏曦抵达湘鄂西根据地。3 月 27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正式成立。次日，中共中央批复分局成员，夏曦任书记。夏曦到湘鄂西，说两手攥空拳也不为过，自己带过来的只有一个江器也（又作江琦或姜琦），在根据地内部，只有贺龙跟他打过交道。所以，上面也考虑到这层因素，陆续往湘鄂西派了一批同夏曦相对比较熟悉的干部过来，协助夏曦工作，他们中间比较著名的有潘家辰、庄东晓夫妇、谢觉哉、毛简青、张昆弟、宋盘铭等。其中，张昆弟、谢觉哉与夏曦在新民学会时就是熟人，毛简青不仅在湖南与夏曦共过事。而且，在莫斯科的时候，毛简青还作为湖南省唯一的正式代表与夏曦一道参加了中共“六大”。不过，湘鄂西根据地说到底还是要依靠一大批熟悉实战、脚踏实地的本地干部。这一点，夏曦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湘鄂西根据地的灵魂人物无外乎四个人——周逸群、贺龙、段德昌、万涛。夏曦比较看重的是万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成员名单中提出“当地推 4 人”，夏曦就圈定万涛出任中央分局委员。同年 6 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万涛又当选为省委常委。不久，万涛又成为湘鄂西“军分会”主席团成员。尤其是当徐锡根被派到湘鄂西以后，一度几乎要取代夏曦成为新的中央分局书记时，夏曦更需要万涛等当地骨干力量的支持。应该说，在夏曦到湘鄂西的头半年中，他对万涛基本是“拉”的态度。

1931 年 9 月 28 日，万涛、段德昌所部红 9 师与贺龙所部在刘猴集会师。段德昌交给贺龙一封信，是夏曦的亲笔。夏曦与贺龙早有交情，1924 年 11 月，夏曦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也是中共湘区区委委员）的身份去找时任四川陆军第 9 混成旅旅长驻守常德的贺龙筹款，贺龙非常慷慨，一次就送给夏曦 5 万银元，解了非常之急。1928 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与夏曦在上海还有一次短暂的会面。段德昌直到这时对夏曦的到来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跟贺龙说：“你们来得正好，得把拥护邓中夏的那些人整一下。”在刘猴集会议上，

万涛代表湘鄂西分局宣布了有关文件和决定撤销邓中夏红三军前书记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由万涛接任。段德昌在会上罗列了邓中夏几十条罪状，算是出了口气。【注 24】

万涛、段德昌接回贺龙以后，准备搞一个会师联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 10 月 8 日，省委、省苏（省苏维埃）的领导请示夏曦时，夏曦勃然大怒，不仅不同意搞联欢活动，还将万涛置于准备严肃处理的地。夏曦提出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万涛率红 9 师接回贺龙所部是违背了中央分局的意图；再一个是万涛在永隆河的来信是把他自己凌驾于中央分局之上。两个理由实际是一码事，即万涛没有把中央分局放在眼里。

作为长期奋战在湘鄂西根据地的万涛，工作作风一向比较泼辣，且一直是与周逸群、段德昌、彭国材这类气质秉性几近相同的战友相处。因此，面对工作中的分歧从来都是愿意摆在桌面上谈，完全没有料到有人竟然动用组织手段来解决这类矛盾，更没有料到夏曦 10 月 8 日上午发的脾气定的性，下午就出手了，所谓剑及履及。

夏曦以“军分会”（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训令，指责万涛，内中有一句话至为关键——“而忽视其领导”，这句话虽然是指责万涛忽视军分会的领导，但军分会的背后站的是谁，则是不言自明的。夏曦另组红三军前敌委员会，以唐赤英、彭之玉、贺龙任之。唐赤英也是留苏的，所以，这个新前委实际是以唐赤英为主。这个训令甫一宣布，立时引起轩然大波，万涛、段德昌等都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意见，双方争论不相上下。随后，夏曦宣布撤销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务，调后方工作，但没有在会上讲，也没有同万涛本人交换意见。所以，万涛还蒙在鼓里，他还以为自己仍旧是红三军的政委，看见新前委中没有自己的名字，还给中央和省委去了一份报告，认为自己作为政委不参加前委是“破坏了红军中的政委制度”。【注 25】

万涛提交给省委以及中央的报告，得到了省委部分领导的支持，但同时也加深了夏曦和他之间的裂痕。11 月 20 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夏曦因在前方没有出席。万涛在会议上发言，批评了夏曦，在两天后省委发给中央的报告中出现了类似“极大多数对中央分局的领导表示怀疑”的段落。这次扩大会议以及这份报告，进一步激化了万涛乃至支持万涛的一批军政干部同夏曦之间的矛盾。万

涛的耿介、忠直却给有的人留下了“桀骜不驯、分庭抗礼”的“恶劣的印象”。若干年后，渡尽劫波的人们在总结历史时，都不无感慨的承认一个事实，即宁可犯政治路线错误，不能犯组织路线错误。因“抗上”留下的血一般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万涛以及后来的诸如段德昌等人其实都是死在这条路上。

1932年1月，湘鄂西党组织召开“四大”。这次大会实际等于“摊牌”。反对夏曦的人不断炮轰夏曦的错误行径，潘家辰、庄东晓夫妇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而万涛、段德昌等人则摆出事实，对夏曦的瞎指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贺龙回忆说：“我同下面的一些干部只是因为先是邓中夏同志来，使红军受了很大损失，现在夏曦又来整红军，有一种不相信偶像的思想。”【注26】夏曦面对凌厉的“攻势”也不甘示弱，甚至连老婆谭国甫都带出来帮忙了。事隔几年后，潘家辰的妻子庄东晓在中央苏区同瞿秋白闲谈时，瞿秋白还提及此事：“你华姐（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多次同夏曦的老婆谭国甫争论，说你和潘家辰怎么会是什么‘改组派’呢？华姐看过你从洪湖苏区写出来的血书。”【注27】

会议开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就风云突变了。夏曦的“救兵”到了。

原来，在“四大”前夕，湘鄂西省委秘书长尉士钧受省委和万涛的委托，带了一批材料去中央反映夏曦的情况。哪知道，中央看后派出关向应前往解决。在回来的路上，关向应说服了尉士钧，转而支持夏曦。

突然到会的尉士钧、关向应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大会，尉士钧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支持夏曦的论调。贺龙说：“尉士钧在这次会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帮助夏曦打击了地方干部，与地方干部形成一条大鸿沟。”只是尉士钧做梦都没想到，仅仅四个月后，他就死于夏曦亲手发动的湘鄂西第一次“肃反”狂潮中。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贺龙的评价是：“关向应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帮了教条、宗派主义的忙。他代表中央的一篇讲话有力量，压下了地方干部及潘家辰的意见。”【注28】连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在给关向应作传时都不得不承认对于关向应，“有些在‘左’倾路线下吃过很大苦头的同志，对他有些耿耿于怀的。”【注29】有了关向应的传达这柄“尚方宝剑”，夏曦的腰杆子一下子就硬了起来。虽然暂时还没有动万涛，甚至还把他选进“军分会”主席团，但一个更大的策划已经逐渐拉开帷幕。

1932年5月，湘鄂西第一次肃反开场。先从抓捕胡慎己算起，一路攀咬株连。如果以规模论，第一次肃反无疑是最大的。在这次肃反运动中，万涛、潘家辰、刘革非、张昆弟、周小康、尉士钧、彭国材、孙一中（孙德清）、柳直荀、彭之玉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遭到捕杀。省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材是参与创建洪湖根据地的重要骨干，“洪湖赤卫队”的创建人之一和首任队长，他在湘鄂西“四大”上曾怒斥夏曦：“只有你这个白面书生是红色战士？”【注30】彭国材的这一看法并不是孤立的，即便是作为中共组织的“叛徒”也有相近的意见，例如盛岳就如此谈论过夏曦：“我深知夏曦其人。他外貌丑陋，一脸凶相，看待事物时思想狭隘，过于简单，显然看得党内到处都是敌人，好像全党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注31】彭国材是被省政治保卫局局长马武带人秘密杀害的，尸体趁着雨夜扔进洪湖中。当地民众得信后冒着大雨和可能被株连的危险将彭国材的遗体打捞了上来。潘家辰死的最惨，是被用碗口粗的木棍直接砸中头部，脑浆迸裂。湘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死后还闹出一场风波。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周小康追随邓中夏搞过一段肃反，激变了贺龙的旧部贺沛卿和王湘泉，他们两个人拖枪出走。等到周小康死后，贺龙亲自带话给他们，让他们归队，他们就连人带枪都回来了。可是，本已经答应他们既往不咎的话音未落，两个人就给保卫局抓走了，未经审判，即行处决。贺龙对此非常愤懑，晚年回忆说：“到鹤峰后，我写信叫贺沛卿、王湘泉回来。夏曦、关向应皆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是决定杀。他们并不是真正反共，是被错误政策逼的。不然，他们为什么还同敌人打仗？还能叫回来？”

第一次肃反结束不到四个月，第二次肃反又开始了。这次肃反杀的代表人物是唐赤英等。1933年3月，距湘鄂西“四大”才一年零两个月，第三次肃反登场。这次把湘鄂西根据地的军事骨干的代表人物段德昌给杀了，同时还杀了王炳南。第四次肃反持续时间最久，长达一年。杀的主要是宋盘铭、叶光吉和盛联钧。宋盘铭也是列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照杀不误。贺龙说：“宋盘铭是个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小关（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注32】谢觉哉是夏曦的老相识，但夏曦公开骂他：“谢胡子是老糊涂”。1932年9月的第二次肃反名单中谢觉哉已经被列上了，只是因为被国民党军的清湖行动捕获，才意外地拣了一条老命。【注33】

杀人多数在半夜里动手，一般都是秘密处决。贺龙说：“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同志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人，条子根本不给我看。”像毛简青这样的老资格（毛简青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经济学硕士，是中共党内少见的大知识分子，1924年就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广西的党组织就是他和谭寿林一手搞起来的）到底是怎么死的？1949年以后的历次调查都没有结果，只有谢觉哉约略能说出他死在洪湖的瞿家湾，是死在狱中。夏曦信赖的肃反的“工具”有两个，一个是省政治保卫局局长马武（后投靠国民党），一个是红三军政治部政务科科长江器也（后被处决）。红三军老战士李生庭回忆：“当时，大家见了这个江科长，头发倒竖，走路都绕着他走。”有一次，军部特务班的几个战士在驻地后山玩，分不清东南西北，一个16岁的小文书就说他能分得清，我家就在西北向。就这么一句话，江器也知道了，就定小文书一个“改组派”，说他知道家在西北向是准备开小差逃跑，说话间就杀了。红7师师长叶光吉被捕以后，悲愤异常，在湖北宣恩县洗马坪附近的白头山突然跳崖，摔个半死，警卫员往军部往返五次冒雨请示，最终还是决定枪决。红三军老战士李方汉晚年回忆道：“到肃反后期，杀人杀得红了眼，两人上厕所、睡觉都不敢讲话，天一亮脑壳就发昏。”【注34】

湘鄂西四次肃反，死得最感痛惜的是四个人：万涛、段德昌、孙一中、王炳南。段德昌是彭德怀的领路人和入党介绍人，他最早到洪湖根据地拓荒，名闻遐迩的洪湖游击队、洪湖赤卫队都是他和周逸群、彭国材亲手创建起来的。在整个洪湖苏区，党政军和一般民众对他很有信仰，当地编创的民谣至今还在。他不仅天分高，能力强。而且对人坦诚，从不藏私。不管你是谁，错了他就敢说。贺龙曾回忆一件事：“关向应同志来洪湖，中央给他的职务有三个：一是三军政委，二是分局委员，三是军分会主席。但夏曦同志实际上只叫他当了三军政委。‘四大’以后，三军军部出发，叫他当政委，但不配备政治机关，是光杆当军参谋长，才叫当的。当时孙德清（孙一中）已经站在夏曦那边，他当参谋长是来监督我同关的。对于不配备政治机关的问题，下面议论纷纷。段德昌同志在新沟咀就说：‘没有政治机关，我们的政委怎么工作呀？军长，你和政委以后不大好工作。’我说：‘为什么？’段说：‘一个是立三路线，一个是旧军人。’关听了此话，很不好过。”令人唏嘘的是，段德昌以及他介绍入党的彭德怀能力水平相近，性情相近，最后连结局都相近。孙一中（孙德清）能征惯战，北伐时代就与许继慎、曹渊齐名，是叶挺独立团里最能打硬仗的军事干部。1927年5月的平定夏斗寅叛乱，孙一中独立指挥两个团打突击，起了决定性作用。南昌起义部队在会昌一战，又是孙一中保障了胜利，朱德对他最为看好，两次点名称赞，常常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他处理。王炳南，湘鄂西的传奇人物，能文能武，不但行军打仗、宣传文教搞得有声有色，而且还有一手好医术，一般性的

小病，经王炳南调治，药到病除。最拿手的治猪瘟。第三次肃反时，夏曦写条子抓了王炳南，严刑拷打。贺龙回忆：“在麻水我同王炳南谈过一次话，隔几米就闻到臭味，他身上伤得没一点儿好地方。我说王炳南没问题，应该放。夏非杀他不可，他把人整成这样子，怕结仇，非杀不可。”【注 35】说起来，王炳南还救过夏曦一条命。王炳南死前见贺龙最后一面，贺龙说：“你算什么改组派？叫喊什么？杀就杀么，掉下脑壳碗大的疤。”王炳南说：“好，胡子，我最后听你一次话。”【注 36】王炳南的两个儿子也被杀了一个，另一个是贺龙硬保下来的。王炳南死后，当地民众对他非常怀念，有的家里还供了一块牌位，上书“王炳南在此”，作为镇邪之宝。【注 37】

都说湘鄂西根据地“胡子”多，指的是根据地头面人物中外号“胡子”的有不少，比如邓胡子邓中夏，夏胡子夏曦、贺胡子贺龙、谢胡子谢觉哉。如今，其他“胡子”都不“灵”了，只剩下夏胡子的“一股独大”。据贺龙回忆，夏曦有一段时间居然把贺龙的警卫员的枪也给下了，“杀了段德昌以后，有的人说要是搞贺龙的话，就杀‘家鞑子’，这是针对夏曦讲的。我说服了他们，不能这样搞。”【注 38】而“夏胡子”的这个“一股独大”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湘鄂西根据地全盛阶段，共掌握 9 个县，拥有约 370 万人口，武装力量达 3 万余人。第二次肃反后，红军人数锐减三分之一，由 15000 人下降到 9000 人。第四次肃反后，红军人数从 9000 人下降到 3000 人。【注 39】此后，夏曦又提出解散党组织，跟“文革”中的“踢开党委闹革命”颇有一拼。等到红二、六军团会师时，红二军团（即原红三军）连队没有党的支部，部队中肃反的恐惧仍然存在。对于夏曦在湘鄂西的所作所为，根据地的老人曾有过一个评价：“后来，有当年和夏曦、贺龙一起工作过的老将军曾这样说过，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得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军队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注 40】

（三）.革命到“底”

1935年11月28日，湖南新化县城的一家照相馆里来了一批有说有笑，挎着枪，戴着军帽的人，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分别拉着一个蓄着胡须的男人坐到中间来，并且一直握着他的手。等他们坐定后，照相机被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多年后保存进了革命军事博物馆。那个被握着手硬是安排坐在中间位置的人就是夏曦。一左一右的两位分别是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和军团长萧克。这张照片是夏曦留在人间的最后的影像。【注 41】

湘鄂西根据地丢失以后，夏曦、贺龙、关向应率残部转战湘鄂川黔边地区。1934年7月，中央来信，着重对湘鄂西的肃反进行了批评。指出肃反是“极大的罪恶”，在这一前提下，夏曦被迫取消了第五次肃反的计划。1934年9月在酉阳会议上夏曦也做了一点自我批评，可当有人提问题时，夏曦又发了脾气。【注 42】

1934年10月24日，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部同红六军团主力会师。10月27日红二、六军团负责人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对夏曦的错误展开了批评。但这次会议因为行军匆忙，很多问题都没有展开谈。尽管如此，有人还是提出湘鄂西真正的“反革命”和“改组派”只有夏曦一人。【注 43】直到1935年1月下旬召开的丁家溶会议上，才算系统地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但夏曦并不服气，不服气的原因在于会议说夏曦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不力。会上宣布撤销夏曦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分会”主席职务，调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因为有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批夏曦不是批他的“左”，而是批他的“右”。贺龙作为当事人也不满意。他后来回忆说：“任弼时同志执行‘左’倾路线。一到湘鄂川黔他就转变了，不能这样说。那么他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接受？也不能这样说。他接受了，但改的是很慢的。解决夏曦的问题，他的批评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是不对的，他批评夏曦中提到‘北方落后论’和‘罗明路线’。对贺炳炎的看法也有问题，任弼时说自首了的就不能重用，很长时间怀疑他。我对他说，贺炳炎大字不识，连共产党都搞不清楚，又怎能是改组派呢？”对于夏曦任职六军团，贺龙也是不满意的。他说：“夏曦把干部杀完了还在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是大会决定的是小会决定的，我是不知道的，关向应也不知道。夏去六军团在前，中央电报在后。战士们看到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呀。”【注 44】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动员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时被激流卷走，终年35岁。有关夏曦的死因，党史界一直有所争论。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夏曦并非非死不可，而是有人“见死不救”。目前，能够提供夏曦死亡过程的主要是饶兴的回忆文章《我见到的夏曦同志牺牲经过》。此外，还有两个旁证，一个是袁福生的回忆文章《夏曦同志的牺牲经过》和贺庆积的回忆录。

袁福生是军团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他是奉命赶到“河边”的。贺庆积则是在夏曦身边的一个脱险的警卫员引导下赶到的“江边”。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均非目击证人。而且，他们各自的回忆也有所抵牾。袁福生回忆是共有二人被淹死，夏曦和他的警卫员。贺庆积回忆是三人被淹死，夏曦和他的警卫员、公务员。再来看饶兴的回忆：“贵州的三月，乍暖还寒，天气阴沉沉的，夏曦同志身上穿着一件皮大衣。由于连日来紧张的工作，休息少，身体已很疲惫，又有皮大衣阻碍，在河里走起来摇摇晃晃。蓦地一股急流冲来，一下把夏曦同志和警卫员冲倒了，他们都不会游泳，很快被急流卷进了漩涡。我在山顶听到枪响，以为有了敌情，立刻赶下山来。到了河边，早已不见了夏曦同志的身影。水的下游有一处被峭壁和侧立山石连成的一条细细的水上岩缝，水从下面流过，从岩缝里面望进去黑压压的很深，没有亮光，河水冲击着山岩，在这里快速旋转，发出哗哗的声响。战士们几次试着下去，无奈水流很急，几次都差点被水冲走。看看实在不行，我们找来一条小船，因为缝隙离水面太矮，船过不去……黄昏，在漩涡下游不远，我们终于找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体。”【注45】

从他们三个人的回忆当中，我们似乎还看不到“见死不救”的痕迹。然而，另外两个人的回忆资料却让这个结论再次被提了出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贺龙返回延安。在同师哲（任弼时秘书）闲谈时说起夏曦的死因。贺龙是这样讲的：“夏曦折腾的结果，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在长征过金沙江时，他失足落入水中，本来是可以救上来的，但谁也不愿去救他，他只好‘自我奋斗’，于是‘革命到底’去了”【注46】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担任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吴德峰为夏曦的死公开骂过娘，吴德峰认为夏曦是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终究是革命同志，不应该见死不救（当时有人在旁边）。【注47】贺龙、吴德峰虽然也不是现场目击证人，但由于他们各自身份的特殊，尤其吴德峰，身任主席团委员、保卫局局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如果不是事出有因，他是不可能公开叫骂的。而贺龙作为两个军团合并后的主要领导，更不会轻易在任弼时的秘书面前信口开河。由此益证，夏曦的死因确实非同寻常。

萧克曾评价夏曦是“两头好，中间错”。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有亲身经历过湘鄂西的残酷斗争的人，在臧否这一时期的某些历史人物时，究竟有些隔膜。湘鄂西的肃反往往被归结为制度因素或者说路线因素，这当然毋庸置疑。但具体到个人身上，因为气质、品格、视野等等诸多主观因素的作用，其效果应该也有

所不同。张爱萍晚年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什么体制？是人！……不要一出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注 48】个人因素和制度因素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非割裂开来。

夏曦因为死得早，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陆续给揭了出来。而有些人，当时也起了很坏作用的，却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长期被包裹在各色光环中，暂时逃脱了历史的惩罚。例如有个人，李建彤（刘景范的妻子）是这样说的：“她从苏联留学回来到了南方某根据地，跟着错误路线搞‘肃反’。和她一起从苏联回国的同学和战友、都被她伙同夏某人在苏区杀尽了，只剩下她一个人，从此平步青云。她踩着自己同志的脊背爬上了高位。”

1984 年，廖汉生故地重游。回到洪湖参加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典礼。一些红三军的老战士提起当年左倾路线的危害，仍旧痛哭失声，悲愤难平。有的人手指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火气十足，数落不休。【注 49】我们经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这一双双雪亮的眼睛下，夏曦的历史定位自然也就会呼之欲出了。

注释

【注 1】（《湖南民报》，1927 年 4 月 16 日）

【注 2】（李维汉《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1979 年 12 月）

【注 3】（徐君虎《“马日事变”前后见闻片段》）

【注 4】（李维汉《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1979 年 12 月）

【注 5】（《谢觉哉同志回忆（摘录）》，1960 年 6 月 27 日）

【注 6】（曾三《马日事变前夕湖南省委情况》，1980 年 1 月 6 日）

【注 7】（武文元《“马变”前后省总工会的工人纠察总队》，1973 年 3 月 20 日）

【注 8】（柳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1928 年 5 月 21 日）

【注 9】（《谢觉哉日记》上卷，第 472、473 页）

【注 10】（莫志斌、余柏青《马日事变前后李维汉评价新析》，《求索》2002 年第 3 期）

【注 11】（《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9 卷，第 233 页）

【注 1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卷，第 377、378 页）

【注 13】（沈卫威《新发现国民党南京政府 1927 年通缉沈雁冰（茅盾）、郭沫若的原件抄本》）

【注 14】（有些党史文章将夏曦算作湖南省代表出席中共“六大”，但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上）介绍，夏曦被列为浙江省代表，见该书第 45 页）

【注 15】（曾长秋《夏曦为夏明翰烈士作传》）

【注 16】（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注 17】（郭德宏编《王明年谱》，103 页）

- 【注 18】（《杨尚昆回忆录》44 页）
- 【注 19】（姚金果、苏杭著《张国焘传》，第 424 页）
- 【注 20】（《刘少奇年谱》上卷，第 108 页）
- 【注 21】（《杨尚昆回忆录》，第 49 页）
- 【注 22】（王守玉《【贺龙年谱】中的一个史实错误》）
- 【注 23】（《廖汉生回忆录》，第 28 页；蹇先任《桑鹤岁月》）
- 【注 24】（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 【注 25】（《万涛关于九师行动的报告》，1931 年 10 月 18 日）
- 【注 26】（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 【注 27】（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 【注 28】（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 【注 29】（穆欣《关向应传》，第 86 页）
- 【注 30】（原军委通信兵部副主任樊哲祥回忆，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38 卷《彭国材传》）
- 【注 31】（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 248 页）
- 【注 32】（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 【注 33】（《谢觉哉传》，56、58 页）
- 【注 34】（许义华《不尽的长征-一个老红军的回忆》，第 100-109 页）
- 【注 35】（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 【注 36】（黎白《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 【注 37】（蹇先任《桑鹤岁月》）
- 【注 38】（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 【注 39】（《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上，227 页）
- 【注 40】（黎白《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 【注 41】（圻水《夏曦犯错误以后●●●●●》）

- 【注 42】（《廖汉生回忆录》第 80 页）
- 【注 43】（黎白《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 【注 44】（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 【注 45】（饶兴《我见到的夏曦同志牺牲经过》）
- 【注 46】（师哲口述《我的一生》，第 197 页）
- 【注 47】（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吴德峰》，第 73 页）
- 【注 48】（张胜《从战争中走来》，第 327 页）
- 【注 49】（《廖汉生回忆录》第 83 页）

14.党史上的“通奸往事”

（一）罗绮园通奸事件回放

进入新时代以后，举国聚焦“通奸”。这一千古话题重又被翻检出来，不由得让我们一边哼唱着孙楠在电影《建国大业》中的主题曲《追寻》中的段落“我心驰神往不懈地追寻，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追寻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着发生在组织历史上的那些个尘封已久却又常吃常新的通奸往事。

罗绮园，广东番禺人，曾用名罗易元、王世义等。是中共党史上寿命最短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仅在位一个月。罗绮园还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党报委员会委员、《红旗》编委会主编（即《红旗日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有作副书记，不确，应作秘书，实际相当于副书记）、中共中央出版部负责人（该部领导仅为罗绮园一人，不称部长）等职。

老罗长期在白区工作，精神压力很大。1931年早些时候开始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胡章原的妻子通奸。胡章原得知奸情后并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而是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胡章原系黄埔军校四期，他在致校长的信中说他现在“政治觉悟了”，并且还向他们的校长通报了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机关地点—上海市东有恒路2048号。蒋介石接到来信以后交给陈立夫、徐恩曾办理，徐即通知中央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黄凯与巡捕房当局取得联系。于1931年7月25日晨6点30分，将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杨匏安以及罗绮园等人一并抓捕。

据黄凯后来描述抓捕杨匏安等人的经历，我们可知如下情景：“杨正在卧病（肺病二期），真是贫病交加……杨上车时，小女儿牵衣，老母哭抱，真是惨绝人寰……。”黄凯书写这份材料时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所以，用词比较夸张。至少“惨绝人寰”这四个字比照杨匏安等人被捕后若干年里发生的若干惨剧来说，实在有点“飘”。

杨匏安名气很大，国民党改组的“一大”上当选为中央组织部秘书，主持中组部实际工作，相当于部长（部长谭平山系中常委，故不常到部，部务一律委杨匏安处理），是丁惟汾、“二陈”等人的“前任”。因此，蒋介石对杨匏安的人才很看重，先后三次派人劝降。第一次派熊式辉，第二次派吴铁城，第三次派吴稚晖。熊式辉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把手，吴铁城号称“党国铁老”，吴稚晖更是国民党的“商山四皓”（其他三人为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虽然级别、人物一次比一次硬，但老杨还是不答应。最后遭致枪决，通奸在案的罗绮园也被枪决。

老杨被干掉之前，还曾写诗一首鼓励老罗勉作“完人”。诗曰：“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金。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上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

别，对视莫潜然。”要不怎么说老蒋很看重杨匏安呢，都死到临头了，诗中还连续用典两处。老杨要求罗绮园做张俭，不要做褚渊。应该说老杨肯定是不知道老罗跟胡章原老婆有一腿的事，否则绝不会用褚渊这个典故，这简直就有点骂人了。褚渊字彦回，南朝宋、齐禅代之际的大名鼎鼎的老高层，褚渊虽然有负于宋明帝“托孤之重”，却在私人道德上颇有模样。宋前废帝刘子业执政时，刘子业的妹妹山阴公主看重了褚渊这位老姑父，想跟褚渊睡一觉，褚渊硬是不答应，刘公主用了不少办法，愣是没奈何褚渊。而罗绮园则是主动投怀送抱，跟褚渊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所以，老杨一定要求老罗别学褚渊“叛变革命”又怎么可能做到呢？

罗绮园被枪毙后，“通奸”的事自然也被组织上知道了。于是便给开除党籍，变成了党外人士，大名叫“叛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有党史研究者为老罗喊了一嗓子冤，说这次大规模被捕的事情不是罗绮园造成的，而是胡章原所致。因而说老罗出卖杨匏安不准确。“伯仁虽非我杀，却由我而死”，老罗没有直接出卖老杨，但他的生殖器直接让老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也是事实。顺便说一句，与老罗通奸的女性同志叫陈玉英，陈玉英当时化名王玉英，在上海西安路206号住处被擒。日后释放，五十年代先去香港，后至台湾，只是不知晚年是否回忆过一段床第之欢竟然要了两个省部级领导同志的性命。

（二）康生通奸事件回放

“五四运动”前夕，北大的一些学生首脑便已开始蠢蠢欲动。其中著名者如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组织了一个“学生救国会”。伟大领袖生前曾将政治斗争总结为两句话：“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而“学生救国会”自然也难逃这类窠巢。甫一成立，就很快南下北上串联奔走。1918年暑期，许德珩衔命到天津、济南、上海、武汉各地同学生头头会面。据多年以后完成的《许德珩回忆录》透露，老许在济南结识了一位名唤张三洗的齐鲁大学的学生，其人当时已然是济南学生运动的领袖级人物了。

张三洗本名张宗可，字少卿，他一生中还用过诸如张叔平、张运（又作张耘）、赵云、赵容等，但都不如他于1933年在苏联起的化名更令人谈之色变——康生。在康生的一般性传记中很少人提及“张三洗”这个名字，事实上，“张三洗”是康生一生中若干化名里最为敝帚自珍的一个。何谓“三洗”，早年的康生将其解释为“洗心、洗脑、洗精神”，延至晚年，康生又将其解释为“洗脸、洗脚、洗屁股”（康生患有痔疮，后用温水坐盆的方式得以缓解，因之，康生戏称“洗屁股”）。康生生父兄弟三人，均有“堂号”，老大曰“北树德堂”、老二曰“南树德堂”，老三曰“宝善堂”。康生本人也有一个“堂号”，即“三洗堂”，他曾自谓“三洗堂主人”或“三洗堂老人”。

1965年10月9日，康生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自陈参加过“五四运动”，并因此同“地主家庭”“决裂”云云。后来康生臭了，这段历史受到党史教科书编撰者的质疑和否定。且不论康生是否参加过“五四运动”，仅就许德

珩南下北上会晤的学生代表的名单【天津张泰来（张太雷）、郭隆真；武汉恽代英；南京林祖烈（林伯渠弟）；上海张闻天、沈泽民；济南张三洗】来看，康生的响当当的程度已经不低了。

在齐鲁大学读书期间，康生结识了一位好友兼战友，大名叫李松野，别号“东歌”（取义辛词“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康生在山东家乡同陈宜结婚，李松野也找了一个女伴，大名叫曹文卿，曾用名“曹蕙芬、曹淑英”等，还有一个曾用名曹轶欧，这也是大名鼎鼎了。

曹文卿有位妹妹，叫曹文敏，后来化名苏枚，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位颇为有名的女性，她的几任丈夫都在党史上有相当影响。李松野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康生也在上海。李松野昼伏夜出，她的老婆曹轶欧也不甘寂寞，很快与康生打得火热。“朋友妻，不可欺”，康生因为宗奉主义，早已不把这样的“陈词滥调”放在眼中，康生的春风度过了曹轶欧的玉门关的同时也被李松野撞个正着。康生是李松野的上级领导，李松野愤怒异常，转而投奔国民党，改名叫李应臣。

李应臣回转山东，担任山东省反日会主席，在一次偶遇中，他意外地发现了曹文敏（苏枚）的踪迹。适时，曹文敏已经改名叫曹更新。【今人清秋子所著《国士牟宜之传》第 181 页转引中共临沂市委党史史志办提供的史料中称苏枚为曹根心有误，应作曹更新】李应臣就此做通了苏枚的“工作”，一举抓获了包括苏枚的丈夫刘晓浦（省委秘书长）在内的多名组织要人，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刘谦初、郭隆真等。被捕入狱的这批人除开苏枚，其余的均被枪决。刘谦初的妻子张文秋后来回忆说苏枚自首脱党，但却在康生的“庇护”下重新入党。

苏枚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厄运却并没有结束。她嫁给了另外一个长期从事锄奸等项秘密工作的头头楚文。楚文是广东汕头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担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1935 年 7 月，陈云秘密从长征途中返回上海，就通过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找到楚文，由楚文安排陈云住在朱军的楼上。不久，苏枚、楚文按照组织的要求前往苏联。1937 年开始的“大清洗”让苏枚再次成了寡妇。

苏枚从苏联被遣返回国，途径新疆留了下来做中学教师，并结识了黄火青，与之结婚。那时节的黄火青还叫黄民孚，公开职务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会长由盛世才兼任）。黄火青同苏枚在延安时期感情生活很好，所育幼女玛霞两岁时死于缺水，后傅连璋赶到给注射生理盐水，但已告不治。黄火青晚年回忆到此还不无心酸地说：“我每次回家，走上石阶刚露头，她一见就叫起来‘爸’。……这孩子如果还活着，已经 40 多岁。”遭遇了连失两女（苏枚同刘晓浦育有一女，出生后送人抚养，故苏枚不知其下落）的苏枚偏偏在上厕所的当口碰到了土崩滑坡，右臂当即骨折，可谓祸不单行。

1946 年 5 月，苏枚在张家口产下一子，名苏涵。随后被时任中共热河省委书记

的黄火青接走。在此前后，黄火青与苏枚的婚姻开始走上末路。黄火青的次子黄毅诚到冀察热辽分局党校没几天就听到了关于父亲黄火青同继母苏枚不和的传言，并说黄火青和另外一位延安女子大学出来的女同志很要好。作为人子的黄毅诚还去看了继母苏枚，劝告苏枚：“你无论如何也不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去。”事后多年黄毅诚说：“因为我知道，舆论和组织上都是支持她的”。可是，苏枚在气头上还是走掉了。黄毅诚回忆道：“父亲（黄火青）可能也希望她离开这里……。”苏枚走了一段又折了回来，没做成贺子珍第二。然而，二人的婚姻终于完蛋了。1948年10月，黄毅诚再次看到老爹黄火青时，老黄告诉儿子，他和马新结婚了，苏枚回了山东。

重返山东的苏枚自然又与姐夫康生、姐姐曹轶欧见了面。在有关康生的传记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康生与苏枚通奸的记载，但究竟本从何来则从未见过明确的史料源头。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指五十年代在杭州，因康生与苏枚的奸情被曹轶欧撞见，苏枚羞愧难当以至于跳楼自杀未遂。关于苏枚跳楼一事，凌云在回忆文章中予以证实，可凌云并没有谈及此次苏枚跳楼的起因何在。另有康生秘书沙韬的战友王涛江之子撰文于《百年潮》上的回忆文章也证实苏枚跳楼，至于起因，该文只说：“康生夫妇为是否带苏枚一起走的问题发生了口角，苏枚与曹轶欧之间也发生了争吵，苏枚为此还哭肿了眼睛。这之后，苏枚的情绪很不稳定，结果发生了苏枚跳楼自杀事件（但未遂）。”不过，该文中有一段也颇耐人寻味：“1950年5月，康生又想到杭州去疗养。走之前，康生提出，孙医生、沙韬把他送到杭州后即从杭州返回，秘书工作让曹轶欧的妹妹苏枚来做，但曹轶欧不同意，尤其反对让孙医生离开杭州。康生夫妇为身边工作人员走与留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如果康生真的与苏枚有染，那无疑是党内通奸历史上比较难得曝光的“双飞”故事了。

1967年4月6日，任职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的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身后掀起轩然大波。“苏枚被谋杀案”搅动大批人被关押、受刑以至于被打残和逼疯。苏枚死后不到一个月，黄火青即写诗一首缅怀前妻，诗曰：“天山冰峰泪成河，延安道旁寒风号。病中幸逢痛永别，苏儿长成堪自豪。”苏枚一生四次聚散，所嫁丈夫如刘晓浦、楚文死于非命；如黄火青、张鼎丞在她生前最后片段或看管或卧床，其人凄怆一生多少可以折射出革命的本来面目。苏枚有子苏涵，也和苏枚一样，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苏涵育有一女，名苏知涯，如今也年近五十。

15.北京·总参·中办

我们以前总说一句套话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道理也是如此。现在就说点党史，为某些沉浸在谣言和幻觉中的同志醒醒酒。

自建国以来，权威最高者无非毛，而以毛本人历史论，其最高时代无非文革。但只要详细看看中共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便可知道，政治之平衡远非个人威权所能全部企及。即令如毛者，也不得不率由旧章或者“和稀

泥”、“装哑巴”。

先来看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组合，毛林周陈康。而谁都知道，中共九大酝酿领导班子三人小组分别由周、康、黄永胜组成，黄之进入常委会已属于呼之欲出。但最终选举结果表明江青得票数尚在黄之上，于是就有江青“黄永胜当常委我也当”的传闻。另外，毛早就对陈伯达看不惯，早就有拿掉他的意图，所以，陈伯达再度当选常委，周恩来谓之“我真没想到”。而这个五人组合的名单并非毛的本来愿望，不过是顺水推舟俯从周等人的提议，即按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名单顺延下来。十一中全会上共选出十一位常委，其中刘少奇囚禁、邓小平调查、陈云下放、朱德靠边、陶铸弄死、李富春冷冻，只剩下毛林周陈康五人。然而，毛毕竟不甘心，所以，发明了迄今为止中共历届政治局常委排名绝无仅有的一条章法，即政治局常委除毛、林以外，剩下三人竟然按照姓氏笔画排序，以至于陈伯达位列周恩来之前。

中共九大名符其实的是分肥大会，文革初战告捷，各派人马急于坐享其成，虽然毛如日中天可以不得不左迁右就，比如中央文革小组，早已取代书记处，却在这次大会上被毛重点批示“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以至于江青大发牢骚说“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个闲人”。原本已经在解放军报掌权的李讷也不得不远走他方，被陈伯达晚年回忆誉之为“中央文革的第一号首长、第二号首长”的江青母子的如此神奇境遇如果仅从表面现象来看，岂非文革即将告终，国家步入正轨的信号？殊不知，稍后的大风暴直接将所有高层核心人物都送进了“炼丹炉”。即便有幸存者从炉子里走出来，可已然面目全非。

现在再来看“十大”，十大的秘书长是张春桥，这个角色以前分别由任弼时、邓小平、周恩来担纲，一个区区晋察冀的小干部如今已经跻身决策层，另外一个油头粉面的工人王洪文则直接飞到中央副主席的位置。然而，即便如此，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仍旧出现了上一届常委会中没有出现过的身影如朱德，如董必武，如叶剑英，如李德生，李德生尚可理解，而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的入选无疑是一种迁就，一种妥协乃至一种平衡。自建国以来到目前，从未有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常委的情况，董必武开了先例。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人中，文革中分别受到不同冲击的占了三席，最受知遇的文革新贵也仅占二席，但公认的是，“四人帮”的势力开始增强。

文革发动之初，毛再度外出，遥控北京，实则也是坐观成败，为自己稍后的选择留有余地。然而，剥笋却层层开幕，“彭罗陆杨”依次落马。这里面陆定一属于为“文化革命”题目做注脚，其他三位才是重头戏。

彭真掌北京，罗瑞卿掌总参，杨尚昆掌中办。换言之，北京、总参、中办才是毛真正食指大动之所在。换上来的三位当时分别是李雪峰、杨成武、汪东兴。现在有些人看待政治博弈中的换马总喜欢从山头角度出发，这有时会导致一叶障目。山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人心。毛最大的山头无非井冈山，无非

双一，而李雪峰资历尚浅，既不是井冈山，也不是双一，如果从地域论起，也应在“华北帮”之列。但丝毫不影响毛对他的重用，有人或以为这是邓的原因，毕竟李雪峰出身太行。可既然文革初起，以推倒刘邓为己任，又何能借重邓的部下？即便倒邓非毛初衷，但也不至于将李雪峰推到如此重要岗位上来。

事实上，毛在1960年自称“退居二线”，一改所谓“一元化领导”或“反分散主义”的老本行，竟然重建六大行政区，这与当年“五马进京”实出一辙，前者为集权，后者表面为分权实则还是集权。其中北京所在地华北局第一书记便授予李雪峰，李雪峰同时还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李立三素为建国后刘少奇所钟，为毛所讨厌，一旦打发到华北局，李雪峰立即对李立三不假辞色，其背景已经昭然若揭。日后，李雪峰对陶鲁茄说过：“我就迷信毛主席”。此后虽然李雪峰并不为毛所完全满意，并且在谢富治与之相较同时毛的天平倾向于谢，但毛仍旧批准九届一中全会上让李雪峰继续连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至于华北组简报的事便是后话了。

尽管换掉彭真，可毛还是未雨绸缪的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进一步完善局面。等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林貌合神离之际，毛再次耿耿于怀的还是北京与总参、中办这三个基本点。南巡时毛说过：“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后来请邓小平出来工作，毛公开讲过：“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邓兼任的总参谋长在毛看来无异于政治局的秘书长（实际还是总书记的意思，只不过九大以后书记处没有了而已）。

毛一生最讲究“根据地”，进了城以后的根据地在毛看来就是北京、总参和中办。只要腹心不动，其他的再动也只是风吹草动，动不到眼前的。

16. 从对陈毅的“始乱终弃”看两段政治局

陈毅是老井冈山，但却并非毛的嫡系，当初朱毛陈并称，陈以士兵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夹辅朱德，作为对秋收起义一支的有力挑战。且陈出身学生，并不同于工农干部那种简单盲从可比，这也是毛、陈矛盾由来之一。此后，刘安恭的出现，特别是红四军大会上的纷争，成为毛、陈关系的转折点，也是陈大半生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开端。

李韶九衔毛之命，勇于讨“不从命”，也把陈毅算在其中，可以想见毛陈关系之一斑，包括毛对宋乔生的念念不忘，不独水口上工人的一臂之力，更主要是宋乔生敢于在会上炮轰朱陈二人。从《赖传珠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嫡系出身的井冈山旧部都有与陈毅“拼刺刀”的光荣段落并以此自骄，像赖传珠这样被刘亚楼骂得如同“茄子皮”一样的人物也一样可以在饶漱石的“感召”下甚至不用扬鞭自奋蹄地批判陈毅，也可以想见毛陈关系的主流了。

可这也是毛、陈关系的一面，另一面，当毛环顾左右，尚无旧部可以招容之际，往往首选又总是派给陈毅，这也是毛终于决定对羁押在李韶九处的陈毅伸以援手的结果。质言之，毛深知陈的为人，陈“脑后无反骨”，尽管抗上可也有限，属于可以驾驭的毛驴而非骡子。因此，新四军掺沙子时，毛选定了陈毅。

只是，陈毅与项英虽然有种种意见上的不合，却并不影响此二人的私谊，经常吹捧陈毅的传记作者们也都承认一点，那就是陈毅、项英之间可以同吃、同住、同吵嘴，但也会同患难，黄桥险胜之前，项英在皖南拍桌子说：“这陈毅，这陈毅，要把老本赔光了。”还要李志高、谢忠良把地图拿给他看。后来险胜，项英又是大呼小叫：“这陈毅，真不错嘛。”行文到此，陈毅的传记作者们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正是项英的可爱之处，一点没有因为自己反对过却竟然成功而生嫉妒之心。他是真诚地担忧，真诚地欣喜。”

项英既死，陈毅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泰半，且陈毅在同项英的斗争中早已被视作“不足”，且陈毅还有被看做于新四军内部“坐大”的隐忧，于是乎，“黄花塘事件”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当日这笔账算在饶漱石头上，这也不够完全，从战阵布局和出马人员构成来看，仍旧属于井冈山旧部围攻，饶不过是“逢君之恶”而已。

建国后，削弱政务院的权限特别是外交领域的二度掺沙子，又让有的人想起了陈毅，陈毅主管外交部同样也是分权战略的一步棋，惜乎陈毅未能很好完成“任务”，终于被“恩准”烧一烧，不仅烧糊，且基本要了陈的老命。

摆在停尸间的陈毅却也属于“剩余价值”可供利用的一路，于是乎又有了“陈毅是个好同志”的盖棺论定。

诚如陈毅自己所言：“啥子英雄，啥子好汉，过五百年，过一千年，让子孙后代去评论吧。”

17. 懂政治的黄克诚

晚年的张爱萍曾经与儿子张胜说起一件事。有一次，邓小平听完张爱萍的汇报以后，闲聊了两句，邓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张爱萍颇感纳罕，他对儿子说：“我不明白，我怎么不懂政治？七五年，四人帮那么嚣张，我妥协过吗？”而后，儿子张胜将黄克诚写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交给张爱萍看，并且附了一句话：“人家这才叫懂政治呢。”可是，张爱萍并不认同。【注】（《从战争中走来》第 468、469 页）

张氏父子的争论引出黄克诚这位懂“政治”的话题。黄克诚的这篇文章始于 1980 年 11 月 27 日中纪委的一次座谈会，黄讲话的这第一部分后被公开发表在《解放军报》上，随即，《人民日报》等也予以转载。在这篇讲话中，黄克诚提出了一个观点：“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评价毛主席”。黄是建国后党内第一次重大“左”转过程中被抛出的第一批重量级的牺牲品，其“军

事俱乐部”主要成员的帽子一度“赫赫有名”，而从这样一个人的嘴里发出这样的声音，也就难怪“两报”争相报道了。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第 21 军军长的滕海清在“文革”中空降内蒙，党政军一肩挑，他在任期间所作的最大的“贡献”是搞了子虚乌有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专案。这一专案直接导致内蒙地区受到迫害的人数高达 346000 余人，其中致死 16222 人。这里不妨先照录几个真实的镜头出来。

镜头之一：将女牧民剥光衣服，用烧红的湿柳棍烫肚皮，肠子露出来，再烫阴道，外阴烧坏，变成不男不女。……将妇女剥光衣服，令其骑在毛绳上，然后两个人前后拉锯，把阴道、肛门拉通，连尿带屎混合而出。【注】（《内蒙古日报》社记者暴庆五于 1978 年 7 月 27 日写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专题报告，揭露乌审旗图克公社在内人党专案中的有关刑讯记录）

镜头之二：内蒙古物质局局长金雪云（女）被用铁钳将其牙齿一个个拔掉，并将耳朵鼻子拧掉，最后被折断腰部而死，此事在内蒙尽人皆知。【注】（图们《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 167 页）

镜头之三：骑兵第五师战士郭建奇受到严刑拷打，在被打到 1600 次以后，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将自己的心挖了出来，以证清白。【注】（图们《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 225 页）

1981 年 8 月 1 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兼内蒙军区第二政委的廷懋代表自治区党委致信中央，要求追究滕海清的刑事责任，同时请示黄克诚。9 月 23 日，黄克诚回信，信中对滕海清的问题如此解释：“念其在长期战争中，出生入死，为人民流血奋斗，……所以还从宽，不拟再追究刑事责任。”黄克诚还告诉廷懋一则消息：“最近，中央决定对原拟追究刑事责任在押未判的周赤萍、程世清等二十六人，也要分批解除关押，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廷懋接信以后不服，同黄克诚发生争执，黄克诚让廷懋去找胡耀邦解决。11 月 5 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例会上一语道破：“我们每个老同志都有一本老账，只有亏欠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到处算老账，天下要大乱。”

1994 年 8 月，图们走访廷懋，廷懋说，近几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苏东诸国剧变，与他们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失误关系甚深。回顾往事，他认为当时未追究滕海清的刑事责任“是英明的，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战略眼光”。

自古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功过原不能相抵，至少毛泽东在就“黄克功事件”致信雷经天时写过如下的话：“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然而，斗转星移，当这些简单的问题遇到“顾全大局”，遇到“历史挑战”，遇到“战略眼光”时，它们都无影无踪了。而这时像黄克诚这样懂“政治”的大将出现了。而这之后，廷懋这样的受害人也理解了，也感慨颇深了。

事实上，不独张爱萍不明白为啥黄克诚懂“政治”，只是历史更多的记录的是廷懋辈的“顿悟”，而非张爱萍们的质疑。

黄克诚一生多数时候保持了应有的正直（例如全军反教条主义，黄就未能独善其身，奇怪的是黄的回忆录中对此段描述也一笔带过，可见反思之难），身后家无余财，子女也未攀龙附凤，属于党内高级干部洁身自好的典范。惟其如此，他对“抱团取暖”的高度领悟才更令人不免沉思良久，对于滕海清之流尚且如此“理解”，更遑论对有些人的历史评价了。2001年，有人作《苏共亡党十年祭》旨在警醒党内，其实不过是杞忧，只需翻看一番黄老懂“政治”的言论便足以了然在胸。

如今这类懂“政治”的人或者言行甚嚣尘上，只是流品较之黄老则不可同日而语了。

18. “为什么只看形式不看本质，党性到哪里去了？”——关向应其人其事

关向应的未亡人马丹晚年回忆关向应有一次同贺龙评价他们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关向应说：“为什么只看形式不看本质，党性到哪里去了？”据马丹回忆说，这件事的缘起是这样的：马丹平素比较尊崇的一位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北大文理学院毕业），在运动中加入劳动党，因为看到了一篇张国焘跑到西安写的一篇《告国人书》进而发表个人看法，认为“张国焘的文章写的还不错哩”，由此引发关向应的不满，也由此引出关向应的那番话，责问这位本已经很左的青年学生兼劳动党新成员“党性跑到哪里去了”。

在关向应看来，文章写的好与坏只不过是形式，本质则是这篇文章是不是夸劳动党的，如果夸劳动党的，你可以赞美这篇文章，就算是这篇文章写的很烂，也可以说成朴素；反之，即便该文章写的再好，你一旦夸了，就是看不见本质，党性就跑丢了。

按照关向应的逻辑，《古文观止》中入选的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假如放在他们劳动党特有的背景下衡量也比较麻烦，那也属于“党性到哪里去了”的一类的危险读物。尤其是武曌后来被御赐为“法家”之后，讨武曌就等于讨法家，那还得了？

究竟党性是个什么东西呢？按照劳动党自己的解释，党性就是阶级性，说穿了就是选边站队。因为他们自认为劳动党是代表所谓人民的，你对抗劳动党即对抗全体人民，就成了人民公敌。

那么，党性和人性到底有啥关联呢？

劳动党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行话，叫：“不能离开阶级属性谈人性”。他们强调人不是独立的，是有着阶级属性的，倘若只谈人性而不谈阶级属性，或者不按照阶级的划分来谈人性，那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因此，他们在讲究人道的时候，是一定要加上“革命”二字的，即阶级性，即选站。

不过，也有他们偶尔说走嘴的那一刻，比如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中，杨成武情急之中大骂邱会作和李作鹏时就喊过一嗓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要有人性，要有良心。”

如此一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党性，实际上也就很清楚了，党性就是他们团伙内部的帮规，好了，不讲团队的帮规，总还要讲点人的基本底线吧？即所谓的人性和良心。但既然你早已服膺了“党性”，这时还扯个几把毛的人性良心呢？早尼玛干嘛去了？

关向应当年说的是一篇文章的事，其实党性早已笼罩在盐碱地的各行各业，渗透到猪狗牛羊的血液和肉体中。李承鹏在他的大作《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里回忆他少年时代在新疆的一些遭遇时，提到过一个吹萨克斯的问题，他很困惑为啥对领导吹萨克斯就叫汇报工作，在野外对着女人吹萨克斯就是“搞破鞋”呢？

只是关向应已然死了，他不能义正辞严地告诉李承鹏：“为什么只看形式不看本质，党性到哪里去了？”

惜哉！

19.苦孩子张太雷

现在不少人一张嘴就爱说“兄弟我也是苦孩子出身”。要说“苦孩子”，张太雷无疑是最苦中的一位，一般人跟他没法比（夏明翰应该可以比他更苦一点）。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老爹张亮采觉得家境太苦逼了，就给儿子改名叫“泰来”，跟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奔雷手”一个名，取“否极泰来”之意，张太雷的姐姐叫泰临，也是“泰来”的同义词。

张泰来八岁时，老爹病故，没看上“否极泰来”。以后，张泰来给自己改名叫“太雷”，取“镇暴”的意思。

1927年“广州暴动”中，张太雷中弹身亡，年仅29岁，死前两个月又当了一次爹。

张太雷有两个伴侣，前一个叫陆静华，是明媒正娶的，后一个叫王一知。公开的党史资料上都说他们是夫妻，但怎么结成的夫妻，郑超麟和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载，颇具戏剧性，大家可以找来一看。不过，这个“夫妻关系”看来并不如陆静华那般公开，至少《张太雷年谱》（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张太雷传》也没有明确记载，只有王一知自己写的《忆太雷》中带过一笔。

这位王一知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前后三任丈夫施存统、张太雷、龚饮冰都是党史上榜的。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见邵铁真、龚育之等人，当介绍到龚育之时，有人告诉毛说他爹是龚饮冰，毛马上就说了一句‘我认识你妈’（原话为“那你母亲我认识”，《龚育之访谈录》第378页）。龚育之意识到毛肯定搞错了，便说明了一下，王一知只是他的继母，至于他的生母，毛一定不认识，这才算是了了一桩公案。

张太雷死讯一开始是瞒着张太雷的生母的，张太雷的生母对儿媳妇陆静华平素总是挑剔不止，张太雷夹在中间不断做工作，说起来张太雷对原配还算够意思，1923年、1924年两度接陆静华母子三人到上海居住数月。

等到老太太知道了儿子的消息后自然痛哭不止，陆静华一直尽儿媳妇的责任，而且还抚养了张太雷和王一知的儿子张永明（1927年10月中旬出生，又名张知春，张太雷曾名张椿年）。

张太雷同陆静华生有三个孩子，女儿张西屏、张西微（现名张西蕾），儿子张一阳。建国后，陆静华算是烈士遗孀之一，受到礼遇，做过省人大代表和常州市妇联副主席。大女儿张西屏在文革中（1968年6月）被逼自缢身亡，陆静华看到女儿自杀的场景，当即自杀随长女而去。

长子张一阳被陈毅送到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旋即死于上饶集中营，年 18 岁。幼子张永明曾去苏联留学，后被打成“苏修特务”，患精神分裂症，终生未娶。

20.苦孩子沈泽民

说张太雷是苦孩子，沈泽民不干了，因为他比张太雷更苦，全家都死于非命。

沈泽民本人幼儿时代便经历过一次“死”，关于这点，其兄沈德鸿（即作家茅盾）有过具体回忆。沈泽民虚龄三岁的时候患过一场重病，大家束手无策，最后还是沈泽民的母亲搬动六叔渭卿（人称“渭老”）前来诊治，老先生下了一副重剂，茅盾本人只依稀记得内中有冬瓜皮、冬瓜子，众人对“渭老”医术不敢怀疑，但对于这服药是否能救人出死海却也不大放心。可奇迹到底发生了。沈泽民只服了两次，便已开始喊“饿”了。

按照中国人的见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其后沈泽民的境遇总体看来实在算不上什么“后福”。当然，如果有人认为他“勇猛”地投身到民主革命和加入中共算作人生大幸福的话，那又另当别论。

在沈泽民身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扎堆以后的情形。他们愤世嫉俗、特立独行，自以为可以拯救斯民于水火。且他们同时又多偏好文学，用“硬译”的手段给在梦中的中国人灌输一些他们认为是良药猛药的外国作品，至于是否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或者是否可以顺利消化则非所计。而从那个时候起，小知识分子必将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和民族导向的指引貌似也逐渐固定下来。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学昭本人亲耳听沈泽民这么对她说过：“现在我们同国民党一起革命，将来我们还要革国民党的命！”这句话后来被沈泽民及其同事们变成了现实。如今已经作为后辈们回忆他们时的“伟大预见”。

作为中共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二十八个半”之一的沈泽民理所应当地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受到提拔重用，成为鄂豫皖中共当局的“三人团”成员，他和张国焘、陈昌浩一道非常卖力气地推行了“肃反”政策，让“千百万人头”纷纷落地。其中白雀园大肃反便是他们的杰作。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样的：举凡为张国焘翻案的人都喜欢将肃反的账记在沈泽民头上；举凡为沈泽民树碑的人自然也都将肃反的账记在张国焘头上；而要为陈昌浩鸣不平的则必须将账记在以上这两位头上。于是，一副神奇的图画便呈现在观众的眼前了，他们三个人的头上都分别被记了若干笔肃反的账，不知他们彼此泉下有知，会不会因此对簿公堂？

传记作家卢振国在他的《血沃中原》一书中写过一段话：“头脑是狂热的，损失

是惨重的；心愿是美好的，事实是无情的；口号是神圣的，教训是深刻的；斗争是顽强的，挫折是深痛的；一言以蔽之，失败也是注定的！”虽然这也只是就事论事，然而它所昭示的内涵则远不止于鄂豫皖的事情。

在一番狼奔豕突（一般教科书喜欢叫“战略转移”）之后，沈泽民的身体被彻底拖垮了。据有关人士回忆，沈泽民死前连连喊饿，警卫员去找了三个快烂的野柿子，沈泽民尚未吃完便已断气。沈死后是被用临时拆掉的两扇门板夹起外加野藤缠绕勉强安葬的，门板上的铁门环都未来得及拆除。沈泽民死后，其妻张琴秋改嫁给陈昌浩。

张琴秋本人也同样是一个苦孩子，他的前后三任丈夫沈泽民、陈昌浩、苏井观都先她而去。内中沈泽民、陈昌浩还都属于非正常死亡。在第二任丈夫陈昌浩非正常死亡不久，张琴秋也被非正常死亡了。官修本的传记和教科书写明张琴秋死亡的时间是1968年4月22日。但据茅盾后裔韦韬、陈小曼转述张琴秋家的保姆的回忆，张琴秋是死于1967年8月28日夜。死因系自杀，但茅盾、孔德沚夫妇根本不予采信，他们都认为张琴秋不可能自杀。而围绕在自杀一事的疑点也是明显的，张琴秋当时被人昼夜看押，身边始终未曾离开过人，且从男厕所跳楼，跳楼时还身穿睡衣等等。而这些疑点，套用他老人家的那句名言便是“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沈泽民和张琴秋唯一的骨血沈玛雅文革后期在研究所工作，因“四五事件”被牵扯，受到轮番整治，七机部的头子舒龙山、叶正光等人对于系统内的苗头穷追猛打，沈玛雅自然难逃罗网。加之“不懂中国的国情，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茅盾原话），最终于1976年5月21日被迫自尽，时年49岁。

一家三口都曾充满了冲天的革命豪情，也都曾立志将革命进行到底。其结果也部分应验了他们入党时的誓言，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一切，自然也就包括生命。只是后人读史至此，不知云何滋味？

21.“抵制日货”的祖宗—方志敏

小时候看《大众电影》，里面宣传的一个影片叫《血沃中华》，写的是方志敏被俘以后的片断。片名应该取自鲁迅的那首诗。这部电影始终没有看全，同另外一部老电影《楚天风云》成为自己关于电影记忆库中的断档。不过，这部电影在放映之后还引出一段纠缠，说是电影中所表现的方志敏狱中出生之子方兰的下落追寻问题。当时有一本杂志提到方兰还健在，还喜欢经常披着大衣到处横晃，模样甚肖方志敏，而这部电影编剧之一便是方兰。而方志敏的后裔则坚称方兰早已夭折，孰是孰非，大概只有天知道了。

前几天，有位朋友引出一段有关方志敏的历史，即北上抗日先遣队途径旌德时杀害外国传教士的往事，因为方志敏身属北抗的首脑，因此便把这笔账算在方志敏头上。其实这也可，因为中共历来强调党管一切，方志敏即便不亲自批准，但至少应该与闻，说他完全无知，恐怕也说不过去。

说起方志敏同神职人员诸如传教士、牧师一流角色的早年恩怨纠缠，确有“说来话长”之感。

方志敏自幼聪敏，土豪劣绅辈竟不因方志敏家贫而愿意与之结亲。后来方考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类似于今天的工业专科学校，属于大专学历，在中共起家的行列中身膺“高级知识分子”。“甲工”期间，方志敏因为抵制日货等激进行动被官方关注，后来又考入教会办的南伟烈大学，即原来的同文书院。从此与神职人员开始有了邂逅。

1922年夏，方志敏到上海谋生，行前南伟烈大学校长因为赏识方志敏，就让方去找上海的一个牧师帮助找工作。方用南伟烈大学赠予的名片敲开了牧师的大门却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牧师非但不予帮忙，反而羞辱了方志敏。关于牧师如何羞辱方志敏一事，目前只据方志敏一人的回忆，也就是俗称的“一面之词”，方后来跻身革命先烈，所以，他的一面之词也就显得很重要了。更为关键的是，方还将这段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叫做《谋事》，发表在1922年7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一般意义上讲，方当时身份低微、生计无着，如非遇到难言之隐，想必不会如此激愤以至于公布于众。但牧师为何对老友南伟烈大学校长的举荐不置且对方志敏“羞辱一番”（方志敏原话），迄今为止应该已被历史湮没。不过，有一点则可证实，那就是自南伟烈大学学习期间，方志敏对“洋教”的不满，经过这一轮的发酵，无疑浓烈了很多。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发起抵制日货行动，以方志敏表现尤烈。据当事人回忆，方志敏拿着“查禁日货”的小旗看到街上有人穿灰色羽纱长衫的就跑过去号召“这个人穿的长衫是日本货，撕他一块下来！”，被撕的人还要陪笑道：“撕得好，你们不撕，我自己也会把它撕掉。”

方志敏还跑到码头发动烧掉商人购进的日本香烟。又跑到京果店告知店老板

说：“你们这些东西都是仇货，不能再出卖了。”其时，店内出售的仅为葡萄干、香烟、罐头、蜡烛等日货。店老板说：“我们是将本图利的，不能卖，我们吃什么？”方志敏大声质问老板：“你爱不爱国，是不是中国人？”

关于方志敏抵制日货的行动，官方教科书说：“这些故事，至今还在群众中流传”。我觉得这段话没有瞎说，去年国内抵制日货的行为多多少少还能看到方主席当年的身影。我们经常讲，发扬优良传统，传帮带云云，看来到底还是生根发芽了，方志敏泉下有知，会不会笑出声来呢？也未可知。

22.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李兆麟杀子

鲁迅当年回敬傻逼们的一首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后两句应该是典出明代汪广洋的那首《画虎》——虎为百兽尊，罔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盐碱地的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只是这么浅显的道理不知为何近百八十年来被人搞凌乱了，或者说经过改头换面以后，人们普遍不知道咋玩了。

金伯文回忆其丈夫李兆麟的文字中有一段描述值得关注。李兆麟同金伯文结婚后于冰天雪地的抗联前线诞育一子，孩子因为生长在艰难的时代，又瘦又小，但很懂事，从不惊扰大人的工作和生活。但李兆麟不知为何就是看他不顺眼，金伯文自述说李兆麟从不给这个孩子一个好脸色。后来有一次行军途中孩子由于饥饿而哭闹被李兆麟一把拎起，直接给扔到了野外，那时节的东北的冬季是可以随便冻死人，何况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李兆麟甚至威胁金伯文说：“你若敢把孩子抱回来，我就用枪把他打死。”还好，这一次孩子被一个普通的农户救起，在之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最终还是夭折。当金伯文得知这消息时居然不是来自于李兆麟，而是从金日成无意闲谈中说走了嘴。

李兆麟如此“无情”的合理解释是担心孩子的哭声引来敌军的追捕和围堵，担心因此牵连了大家的安全。理由非常高大上。好吧，就算成立。那么，请问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

对此，金伯文回忆说：“1940年春，……见到了兆麟同志，久别重逢……欣慰备至，不久，我怀了孕。”可见，因为久别胜新婚以至于让金伯文怀了孕。这里不禁想起劳动党的祖宗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布尔什维克人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里也不禁要问一句，既然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既然都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既然都有可以舍弃孩子的大无畏的勇气，那么当初在重逢之际为何管不住自己的鸡巴呢？难道不知道自己的鸡巴会留下种子吗？为了革命都能抛弃骨肉至亲，为何不能动手阉了自己的鸡巴？

绝逼不能，因为那叫顾全大局，什么是大局？领导们的片刻偏安，瞬间温柔就是大局。至于大局之后产生的孩子那都是包袱那都是道具，用来给傻逼们表演大义灭亲的老戏目的。

李兆麟算是劳动党内烈士中的“名角”，剩下的诸如卢涛啊，等等这些不太知名的小烈士也都有抛舍亲生骨肉的故事，且常被官方史料津津乐道。陈为人为保管中央文件宁可饿死亲生孩子的事迹还被拍成电视剧上演，用以教育后人。

这时，忽然想起一则历史，管仲病危时叮嘱齐桓公小白说三凶不能用，即易牙、竖刁、开方。其中说到易牙为了让齐桓公品尝人肉杀了自己的儿子奉献一事时，管仲道：“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爱于君！”同理，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人说爱群众爱人民，一群不把亲生骨肉放在心上却说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可以放弃一切，除开傻逼，其谁能信？

对自己的孩子能下得去手的也一定更会对别人下得去手，只要有所谓的理想和抱负就足够。

“无情一定最歹毒，杀子必然伪丈夫”，这才是人间常态。

23. 义愤填膺之余—巩天民小传

昨天又是一个让盐碱地义愤填膺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每年都有一些，“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有祭祀就要有牺牲。今天咱们不妨就回顾某位牺牲者的“壮烈生涯”。

当初日本人炮制满洲国时，国际上派了李顿等人前来调查，史称“李顿调查团”。有几个不怕死的身在东北的中、青年冒着生命的危险向李顿调查团提供了一批资料，旨在拆穿日本人的政治把戏。这其中有一位钱庄经理，叫巩天民。

巩天民是受到阎宝航等人的传染进而加入劳动党的。入党三年以后，又主动退党。但同组织的关系始终没断。因为参与揭露日本占领军的秘密，被抓入日军宪兵队。宪兵队在那时节是谈虎色变的玩意儿，进去的人能够活着出来的不多。可巩天民算是一头。刚被弄进去时，日军宪兵队特高课的岩塚还大骂巩天民，原话大意是，“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罪大恶极，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帮助你们建立新国家，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并且向国联告我们，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的丢脸，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

按说经特高课的头子给定了性“死有余辜”，基本下场也就确定了，哪知道，巩天民不但活着出狱，日后还做到了日本人在东北搞的资产重组项目—志诚银行的专务董事兼总经理。说起来，日本人也是活该完蛋。

接着，巩天民又同国民党打起了交道，三比画两笔画，被国民党发现有通共的嫌疑，抓起来了，陈诚还专门做了批示“重案犯，不准保释”。结果呢，比日本人还操蛋，这次巩天民自己不但没事，还利用偶然的把同案犯给办了越狱手续—“托上大墙逃跑了”。而咱们这位巩总真的很牛逼，一直不走，一直等到劳动党解放大军解放了才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你说国民党不完蛋，还有天理吗？

1945年，巩天民经孔原介绍，重新回到劳动党的怀抱，身份不公开。东北大区成立，巩天民的关系归口东北大区公安部副部长邹大鹏掌握。大区撤并后，巩天民的关系交由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侯西斌掌握，他同侯单线联系。侯西斌虽

然只是公安厅副厅长，但是在巩天民的使用上发言权很大。1956年，组织上准备将巩天民作为统一战线的样板推出，是侯西斌代表省委给巩天民做的历史结论，两条。然后，巩天民才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

副省长做了11年。1967年，巩天民被抄家。这次来收拾巩天民的既不是日本宪兵队，也不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是打着鲜明旗帜的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很猛，当着巩天民全家的面装卸枪支，枪口就对着巩天民一家。这时巩副省长始终没发话，反倒是初生牛犊子巩七郎巩国兴看不过眼，顶了“群众”一句，就这一句话，巩七郎立马被打成精神病，一年多以后卧轨自杀。

巩天民被关了将近9年，放出来时已经疾病缠身，死前唯一愿望是恢复党籍，愣是没被批准。1978年，巩天民死亡，至死也没有看到“东北帮”被平反的消息。死后六年之久即1984年被批准恢复党籍。劳动党官修本《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0卷收录巩天民个人传记，可奇怪的是，巩天民遇难前后经过居然一笔带过，连巩国兴的死因都未提及。

现在总结一下，巩天民反日，被捕，活着出来；巩天民反国民党，被捕，活着出来；巩天民拥戴劳动党，被捕，儿子死了，自己活着出来，不久也死了。

其实不光是巩天民，包括引诱巩天民上道的阎宝航结局一样很惨，甚至比巩天民还惨，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晚年回忆他发觉在监狱中有老爹的声音，竟然连问都不敢问。

昔日的日军很残忍，害死了不少无辜的中国人。所以，人们提到那段历史表示义愤填膺，恨透了日本人。于是，我们就要问一下，是不是所有残害过无辜的中国人的人群都应该得到日本人一样的待遇？或者再多问一下，到底是日本人害死的无辜的中国人多？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害死的中国人更多？南京作为无辜中国人遇难地得到公祭的地位，那么扬州、嘉定呢？是不是也可以追溯一下？包括河南信阳，甘肃夹边沟等等吧。是不是也应该获得应有的地位呢？

实际上，问了也是白问。因为发明“天问”的那位“楚二代”都不免被包了粽子。因此，最好是啥都别问。就像《约定》歌词写的那样：“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24.李涛和李荒

今天下午闲暇时读了两本小册子，一个是李荒的传记，一个则是李涛的。“二李”虽然秉性脾气截然不同，却也折射出党内山头的两个侧面。

在上层，有毛、周、邓这般的“三尊佛”，而地方上也有大大小小的“三尊佛”，辽宁省的诸如郭峰、黄欧东、李荒、李涛等，江苏省的诸如江渭清、惠浴宇、管文蔚等，广东省的诸如任仲夷、梁灵光等。这些人资历或许不那么一致，但大抵发挥的作用几乎雷同，所谓退而不休，在幕后仍旧成为本省政坛上的主要拐杖，甚至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地步。

李荒年长于李涛，但政治排名始终在李涛之前，其中两任省委常务书记，属于“老三”一流。李荒为人有笃厚的一面，文革中周桓怯于承认焚烧不合规格印制的毛选一事，李荒主动承担责任，黄火青后来在回忆录中专门补记此处，称赞李荒。周桓在上将中资历很浅，可提拔很快，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居然位至上将。究其内里，还是“秘书长出身”帮了大忙。周桓此人在辽宁口碑较差，文革后复出官运也很泛泛，仅给予文化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

李涛则不同于李荒，为人专断，好包揽，李长春、周勇顺均系其培养发掘。1958年，他成了“王、杜、李”反党集团第三号人物，从副省长的位置上降职抚顺矿务局副局长，号称“蒙冤二十载”。

“王、杜、李”反党集团是辽宁省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反党”也者，不过是李涛等人主张大种玉米而已，虽有张烈引起，实际上则是个别人借机收拾异己的盛筵。

黄欧东是红一方面军的底子，《辽宁省党史人物传》上提到一条，说五十年代初，凯丰任沈阳特别市市委书记，黄欧东由之前的书记改任凯丰的副手，表现出组织性、纪律性云云，令人不禁遐思。凯丰其人在党史上的地位一度十分了得，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成员，“战国七雄”一般的人物，建国后任重要工业

城市的一把手怎么也不能说是擢拔，黄欧东位在其下，谈何“组织性、纪律性”？貌似潜台词则是黄欧东本人当时在辽宁政坛上已然“老大”一级？

1958年的风云，还不光是黄欧东入股，另外“一黄”也是重要角色。此人大名黄火青，早在长征期间便卷入过是非，说起来黄火青也算是“毛派”的外皮，可是，只要认真看看黄火青的回忆录便知，毛死后，黄火青在回忆录中仅仅一笔带过，绝无半点多余，对照其他“毛派”人物回忆录中“如丧考妣”的模样，可谓异数，既然是异数就必然有由头。

黄欧东是江西人，江西老俵嘛，总是“不平则鸣”，当然，平的时候也鸣。在黄欧东看来，宋黎、杜者衡这些人“扎刺”，要“管一管”，而在同系东北老乡的林枫看来则是黄欧东“管不起来”。黄火青征求彭真的意见，彭劝他看看再说。而黄火青也没拦住火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总的说来这件事是处理的不好的”，哪件事呢？自然是辽宁省党内斗争的大事。黄欧东为了办这件大事，甚至用了手段，如盯梢等。

若干年后，这件事以平反了局，如李荒，曾经当着大家的面，给挨整的王铮道歉（王铮后任河北省委书记），王铮逢人便说李荒道歉了。而黄欧东则不同，以至于黄欧东追悼会当日，好事者最想看到的竟然是李涛送没有送花圈，类似的情况还有原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追悼会上竟然有人将余秋里送来的花圈扔了出去的趣闻。“党人的肚量”部分也于此可见一斑了。

李涛晚年在地方上大权独揽，李荒晚年则逊避退让。有两件事颇值一提：据铁道部的一位老领导讲，他回沈阳看望老战友，老战友领着他去见李荒，他本人从未见过李荒，到了李荒家里叫门，开门的一个平常朴素的老头，跟收发室的老大爷差不多，其人便是李荒，为人谈吐极为简易，委实想不到此公曾经担纲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位，且李荒是省委常委中带头“裸退”者。

而我一同学说，有一年他去东北沈阳游玩棋盘山，在度假村里某处玩的正在兴头上，服务人员过来告诉他们暂且回避，他问为啥？服务人员说李涛同志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都需要给李涛同志提供方便。

尽管从表面上看有很大的不同，但其内在并无二致，不过是手心手背罢了，诚如毛周邓的本质实无区别一样。李荒曾写过一篇《同志颂》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很多老同志纷纷电告李荒说真是“大快朵颐”，尤以李先念、黄火青等人评价最高，李荒在文中认为日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叫“同志”，而不该“先生、小姐”一味地乱叫。此说是否“与时俱进”姑且不论，从此倒可以看出当日叫孙中山一声“先生”，的确是把他当“外人”了。



25.高自立任职小考

有人在网上公开为高自立叫屈，说老高后来的职务越来越低，应该是出了什么岔子的缘故，其征引资料无外乎百度百科，用毛泽东七十年代初南巡的话说就是“可见风格之低”。

先来说百度百科中关于高自立任职上的错漏，百度说高自立 1949 年任冀察热辽分局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云云，根本就是胡扯。

因为，中共中央早在 1948 年 11 月 20 日即明令撤销冀察热辽分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12 月 13 日，这两个机构正式摘牌。可想而知，头年年底都已然结束的机构，何以第二年还能冒出个副书记高自立？中国梦也不是这么做的吧？

再来看高自立担任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和办事处副主任是不是委屈了他。

因为冀察热辽分局是经历过两个历史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叫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第二个阶段叫做东北中央局冀察热辽分局。高自立在这两阶段中都担任分局委员，顺便说一下，第二阶段的冀察热辽分局 1948 年 4 月起，中央决定该分局不设副书记和常委。

冀热辽分局委员名单如下（不按姓氏笔画排列）：程子华、黄火青、肖克、罗瑞卿、李运昌、胡锡奎、赵毅敏、詹才芳、欧阳钦（时名杨清）、高自立、吴德、李楚离、云泽（即乌兰夫）。

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名单如下：程子华、黄火青、肖克、罗瑞卿、李运昌、胡锡奎、赵毅敏、詹才芳、欧阳钦（时名杨清）、高自立、吴德、李楚离、云泽（即乌兰夫）。黄克诚、刘道生在 1948 年 4 月起被增补为分局委员，其中黄克诚接替程子华任分局书记。

由这份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冀察热辽分局班子都是些什么人物主持工作的，像黄火青、罗瑞卿、欧阳钦这都是毛一时的亲信大将，即以欧阳钦为例，欧阳钦是 1924 年入党，比高自立入党早了两年，欧阳钦 1925 年 8 月在苏联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营地同朱德一起接受军事训练。顺泸起义的战略构想“三人团”就是朱德、刘伯承、欧阳钦。欧阳钦从 1930 年 1 月起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直至年底，当时同他平行的还有参谋部部长刘伯承。

然而，就是这个欧阳钦，建国后却担任了中共旅大地委书记、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等职。直到 1954 年才调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顺便提一句，欧阳钦去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秘书长时，苏区中央局书记正是毛泽东，欧阳钦在旅大任书记时，斯大林都同他喝过酒的。

而在冀察热辽分局中，欧阳钦与高自立都是分局委员，也都是兼任分局中层部门领导，欧阳钦兼任秘书长、联络部部长，高自立兼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事实上，建国前后领导干部职务的暂时沉浮虽说一定程度上不排除派系、山头的作用，但正常调动、使用也有一定原因，不能简单地将某某人的升迁或者下降完全归结为“失宠”一路的理由。

像吴亮平，众所周知他是王明的死对头，在江西临时中央时，吴亮平的职务同高自立一样也是部长级的（国民经济部部长），可建国后吴亮平却担任了上海市沪西区区委书记。以后才升回到化工部副部长这一位置上来，高自立早逝，所以，后面的历史我们无法假设，但如果就静止在所谓冀察热辽分局委员上并由此断定此公的官位是越来越低，那真是胡扯了。

26.党史上两位“妨主”的“黑”秘书

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会对那匹叫做“的卢”的马有印象，“的卢妨主”是该书的一个亮点，既衬托出刘先主的牛逼，又写出动物世界的惊魂。其实，不独小说中有如此神马，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趣闻。广东人习惯把运气差叫做“黑”，今天就来说两位“黑”秘书吧。

第一位叫做赵家梁。赵家梁侍候的第一位“主公”叫做高岗，此人的下场不用过多介绍了。高岗在赵家梁的陪伴下走完了余生，至今谜案不解。高岗去世后，赵家梁又跟上了一位“主公”，此公名为贾拓夫，一个被毛曾经赞为“党内贾宝玉”的人物。1955年定级时，贾拓夫被定为行政三级（《贾拓夫传》中介绍为行政四级，但贾拓夫之女贾莉莉则记忆为行政三级，一般说来，这些官二代对爷娘老子的头衔往往会记得很清楚），同马明方等人同级，属于副总理一级，集中体现了当年周恩来的一句话：“也是陕北救了中央”。赵家梁跟随高岗时，办公室就设在国家计委，那时候贾拓夫是国家计委副主席（高岗为主席），后来国家计委领导的官衔由主席改为主任，贾拓夫便也由贾副主席变成了贾副主任，但贾副主任还有一个“正”主任的差使，那就是国务院四办主任兼轻工部部长。

赵家梁跟着贾副主任时间较之高“主席”要长一点，到了1959年以后，贾副主任也走了背运，被贬到辽宁抚顺当一个厂长，本来是老大的宠儿，属于宝二爷一流的人物，忽而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突遭老大点名说1937年的陕西省委不尿延安。而1937年的陕西省委正是贾副主任在当家。贾副主任虽然罢官，可赵家梁的秘书运程却没有结束，他又被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看中，选作秘书，其时李富春是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只是跟随李主任也才几年的光景便又迎来了麦城的岁月。

毛对国家计委早已不满，派定余秋里等人掺沙子，组建“小计委”，实则夺权，用周恩来的话说：“冲破一潭死水”。李富春表面上还是主任，实质上已经让权。自此，赵家梁跟过的三位“主公”先后都以这样的结局离开了权力核心，其中高岗至今未能全部翻案，贾拓夫死因至今未明，晚年的赵家梁集中精力和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投身到为高岗鸣冤的工作中去，为党史研究平添了更多的堵。

第二位叫做陈维仁，累官至中央党校副校长。此公当初参加西南联大受到组织的鼓舞从而成为秘密党员，进城后成了人民日报掌门人邓拓的秘书，这是他秘书生涯的开端。

“文章满纸书生累”的邓拓尽管以党内大笔杆子第一位策划出版毛选而著称却被他当初吹捧的人物贬为“死人办报”，要收他的“板凳折旧费”。由此从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位置上去华北局和北京市委安身。离开邓拓的日子里，陈维仁没有闲着，他被中央党校校长林枫选中做了秘书。

以发明“五虎上将”狠整高岗余部著称的林枫在东北期间同林彪曾有一些争执，例如林彪认为东北人性子绵软跟绵羊一般，林枫身为东北人，当然要起身辩诬。斗转星移，林总成了林副统帅，林枫的这些点点滴滴就成了“罪状”，林枫及其所在的中央党校有了一个新的外号—林家铺子。陈维仁也因此成了铺子里的伙计，其人其主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林彪出事以后，林枫的子女问过林枫又没有想到林彪会出事，林枫说了一句名言：“想到了，因为他离毛主席近了。”

文革结束后，陈维仁因为在党校的原因又称为新任校长胡耀邦跟前的“联络员”，只是没想到还不到十年的光景，胡耀邦也下课了。

相比之下，陈维仁的运气貌似比赵家梁好一些，他跟随过的三位“主公”毕竟都已经“盖棺论定”成了伟大光荣正确中的一员。

27.重读“胡风事件”

1955年发生的“胡风事件”早已离我们远去。今天的人们似乎很难想象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在那场政治运动中被无情卷入的各色人等又遭遇了什么样的挫折与蹂躏。所以，尽管有诸多当事人不惜笔墨来试图带领人们重新走进当年的现场。但健忘的属性和麻木的本色使得很多人仍旧拒绝领悟那场运动带给这个民族、这个社会以及稍后的所谓未来是一个如何惨烈却又无比真实的预言

般的涵义。因此，我们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无可奈何的面对不断复制成各种版本的“胡风事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掉入变异的早在“胡风事件”时期就已经准备好了的陷阱之中。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重读“胡风事件”的一丁点可怜的意义罢。

就在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案头放着一本褪色的红皮封面的《人民手册》。这是由大公报社在 1956 年出版的。曾经闻名海内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己任的大公报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姿态重塑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可以想见，这本《人民手册》将要告诉“人民”的是些什么内容了。

在这本《人民手册》的泛黄的页码里，我们读到了 1955 年讨伐胡风最为应景的两个人的报告。一个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兼文艺处副处长的郭小川。另一位则是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郭小川的报告发表于《学习》第七期。而罗瑞卿的文章是发表于《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 30 日。虽然这些东西虽不脱“马后炮”和“秋后算账”的嫌疑，但其杀气腾腾的风格依旧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郭小川做过王震的秘书，罗瑞卿当过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这两位昔日经常在领导身边领会首长意图、执行首长意志、完成首长任务的人的报告能够被《人民手册》选中应该不是偶然的。

长着一副憨厚的面孔的郭小川貌似还带着一丝“土气”。这与那位曾因战争的原因给自己脸上绷紧的面孔肃杀的形色带来十足的理由的罗瑞卿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的相同。但拿出手的这份沉甸甸的报告却全然可以用“人不可貌相”来形容了。

郭小川为胡风总结了六大罪状。第一，反对学习共产主义世界观；第二，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第三，反对思想改造；第四，反对向苏联学习；第五，反对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第六，反对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六条罪状其实只是一条，即“抗上”。

以上六条罪状自然不是郭小川这个级别，这个层面能够总结得出来的。而通过这张厚厚的嘴唇说出来的唯一理由可能就是让大家看清楚，连郭小川这种“老实疙瘩”也按捺不住愤怒了，连他都要声讨胡风了。这是组织一贯的手法，让“人缘好”的“老实人”充当政治运动的急先锋，迫不及待地举起屠刀砍向同类，在血淋淋的祭坛面前交上一份让组织满意让首长欣慰的答卷。

说起来，郭小川也好，罗瑞卿也罢。他们都是奉命作文。而且，话也骂在明处。关键是还有那么一个人，是被胡风一直尊之“佛”的。居然早在事件发生前夕就已经暗示周扬可以放手一搏了。

绿原在公安部发还的材料里读到了周恩来给周扬的一封信的原件。周在信中告诉周扬：“就让他（胡风）到群众斗争中去，慢慢地长期的求得解决。”而在另一封心里，周又“告诫”始终巴望着能够“面圣”的胡风：“我没有时间约你谈……舒芜的检讨，希望你多看几遍！”

结合这两封信我们不难看到这位胡风心目中的“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谓“到群众斗争中去，慢慢地长期的求得解决。”的广义理解自然可以解读为“思想改造”。而狭义的呢？就像《新星》中林虹对李向南发出的质问：“狭义上的蹂躏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什么含义？”具体到胡风身上，他自 1955 年失去人身自由到 1985 年去世，三十年中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当他身陷囹圄遭受非人的摧残和折磨时，谁又能说这些仅仅是个人的独立施暴呢？谁又能不承认这些暴虐本身也是“群众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即便是在胡风死后，胡风的悼词里居然还能出现“胡风先生带着复杂的思想感情走进了新社会”的字眼。换句话说，即使胡风肉体生命归于完结，针对他开展的“群众斗争”仍然没有结束。

周在告诉胡风，要学舒芜，不要“给脸不要脸”；周在告诉周扬，既然胡风“不要脸”，那索性把群众放出来吧！但这些内容，谁能从那张布满了慈祥、和蔼的脸，从那张永远说出的都是善意的理解和大度的包容的嘴巴里读出来呢？既然你们都读不出来，也自然就配十里长街给他做最后的发送。

老实说，胡风全然没有想过要对抗新社会，对抗新政权。相反，他心中同样跟群氓一样充满了激情与躁动，那一大段一大段的史诗般的颂词，什么时间开始

了，什么欢乐颂，什么安魂曲，无一不是为了颂扬那个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城楼上的老江湖的。而且，胡风尽管自认抱有独立的文学思想、精神逻辑，但究其内里，他跟丁玲在仆从社会主义制度上并无实质性区别。

问题的全部就在于胡风要“建群”。而新社会的标配是“不准扎堆”。胡风回忆说鲁迅根本不认为冯雪峰像他，乃至说出：“一点都不像”的狠话。那么，胡风就像鲁迅吗？也许在芦甸这些冤死狱中的人看来胡风无疑是一位文艺界的领军或旗帜。但胡风也同冯雪峰一样，“一点都不像”鲁迅。

鲁迅生前说过一段话，也是为他身后做了伏笔，也是旨在告诉做梦的人们，这个世道并没有任何真的改变。鲁迅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胡风有没有做“盟主”的想法已经无关宏旨，只要有人愿意围绕着他叫他一声“胡风先生”就足以让最高当局“食指大动”了。何况，胡风在自己的小圈子也却有“把柄”捏在人手。当初，芦甸私下里将胡风比作继马恩列斯毛之后的人物，已经是在包揽祸事了。

所以，胡风 1955 年后的命运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起“事件”虽然属于“事有必至”。可当它启动之际，我们仍旧看到“沉渣泛起”、“鱼龙混杂”。那些身处高位的人无不露出吃人的嘴脸，那些底层无不显现恐惧的神色。而这一切恰恰是最高当局所喜闻乐见的。于是，郭小川、罗瑞卿以及周都一定会应运而生。

当然，如果仅仅是胡风被揪出去了，这幕闹剧便收场也委实冷清。就这样，在稍后的日子里，郭小川不得不检讨，不得不下放，不得不在蒙赦之后点燃了那神奇的棉被熏死了自己；罗瑞卿也不得不自污，也不得不跳楼，不得不在重用之间阻止了那多动的心脏的颤抖；而周呢？他挣扎的喊出自己不是投降派，他

疲惫地唱出了东方红，他机警地吞下最后要说的话。可他逃得出“魔掌”吗？他摆脱的了厄运吗？

所有人的宿命其实早已注定，时间是公元前 221 年。要问为啥就在这一年，因为之前已经预演过了，且不止一次。

28.“蒋干宋美龄”——略谈冯雪峰

据冯雪峰回忆，毛泽东曾经写过一首三句的打油诗，第一句就是：“蒋干宋美龄”，后面两句将在座的林伯渠夫妇、李维汉夫妇都捎带进去了。目前只查到了林伯渠夫妇的这一句，李维汉夫妇的那一句还没有找到。冯雪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是用非常艳羡的口吻来谈及毛的所谓出口成章的才能的。与此同时，冯雪峰还向陈早春透露一件事，那就是毛经常同左右开一些比较豪爽的玩笑。什么叫豪爽呢？从蒋干宋美龄这句诗上 就能找到答案。

不过，这首诗的第四句也不是没有人写出来的，比如康生就写出来了，而且也有人知道康生写的是是什么，特别是康生写的这个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是比较贴切的一个对仗。只是康生不敢拿出来，只不过随口一说而已，这也就是迄今为止该诗还只有三句的原因。

在回忆中，冯雪峰这么说道：“这样的才能和机智，一流文人也赶不上，开玩笑能开成这样，很简单。”被毛亲自点名打倒的冯雪峰在人生的尽头还能如此深情的回忆造成他后半生蹉跎的主公本身也是“一流文人也赶不上”的。这里倒要写点关于鲁迅对冯雪峰其人的有关评价。

胡风写过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如此谈及鲁迅对冯雪峰的一个侧面评价——“我（胡风）提了一句‘雪峰模仿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一点也不像！’”

毛泽东认为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仅毛泽东这么说，海内也是如此公认的，从这个“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和“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角度上看去，冯雪峰的确一点都不像鲁迅。冯雪峰的骨子里是软弱和怯懦。

鲁迅生前说过“奴在身者”与“奴在心者”这两种类型。对于周扬、夏衍一流的货色，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得分明。

冯雪峰后来也写过一个《两只锦鸡》来评议他和周扬，只不过，锦鸡再锦也是鸡，因为鸡永远跳不出“奴在身者”或者“奴在心者”的圈子。

29.宿命—翦伯赞剪影

盐碱地真是滑稽，你要是说宿命，人家就骂你是封建迷信；如果你说必然性，人家便只好封你为马克思主义了。到底啥是马克思主义，不妨往下看一看。

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在抗战期间蜗居重庆，仍旧坚持不懈地讲授马克思主义。以至于国民党当局的党部部长不得不光临问候，希望翦伯赞不要再讲马克思主义了，但翦老（当时人称年未五十岁的翦伯赞为翦老）不同意。国民党党部部长问了一句：“先生莫不是共产党吗？”翦伯赞大声回答：“我还不够资格”。党部部长访问翦伯赞的时间是1939年，翦老1938年便已经宣誓加入了劳动党。当然，会有人站出来替翦老辩护云，那是对敌斗争的手段不妨撒谎。

既然党部部长无能为力，陈立夫本人就只好出面了，陈立夫敦请翦伯赞不要讲马克思主义，结果翦伯赞还是不同意。

现在想想，也真是好笑啊。身在陪都，就在国民党高层的眼皮底下，居然大讲马克思主义而安然无恙，国民党真是他奶奶的弱爆了，这样的政党真没资格统帅盐碱地数万万猪狗牛羊啊，所以，它很识趣地滚到一个小岛上去了。

因为对国民党反动派撒谎，翦老很快见用，连周恩来都亲口叫翦伯赞为“翦大哥”，这是让翦老惶恐和闹不懂的地方，周比翦伯赞大一个月，居然还反叫翦老为“大哥”，而之前党内早就叫翦大哥为翦老了，这就让翦老更加受宠若惊。其实说起来，翦老还是不懂党文化，在党内，凡是牛 X 的人才会被叫大哥，不论年纪大小的。比如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在延安她初见大毛拉时，他老爹朱德便让她管毛泽东叫“毛伯伯”，谁都知道朱德年长于毛，但朱德的逻辑是：“我们都很尊敬他”，自然也就该叫大哥了。

然而，翦大哥也有不撒谎的时候，海罢事件起来后，翦大哥公开给吴晗的遗泽当保镖，说吴晗都被批判，那些当年在国统区工作过的知识分子会寒心。接着在揪斗刘少奇一事上，翦大哥被逼无奈，编造不出专案组需要的材料，进而被吓自杀，夫妻双双把家还。

一个曾经对国民党反动派高层抗声相加的翦大哥居然被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轻而易举地给弄死了，直到死，翦大哥还是没搞明白自己一生都在玩命地效忠劳动党效忠马克思主义，为何受到如此待遇？说好的翦老、翦大哥都哪儿去了呢？

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了，宿命。道理很简单，毕竟你翦伯赞是知识分子，哪怕你是教授马克思主义的，只要你披上知识分子这张皮，你的宿命就是这德性。

记得八十年代末，杨尚昆有过一个讲话，我等屁民自然是没可能亲耳聆听了，听到的是传达稿，杨的原话大意是：文革搞错了，一方面是发动本身就是错误的，再一个就是毛过于听信了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反动知识分子的坏话把事情搞坏了。

众所周知，文革顾名思义就是收拾知识分子，没想到深受其害的老杨居然还能把文革的祸端仍旧扣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头上，只不过加了个反动加以区分。

如此想下来，只要你还是知识分子，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旦遭受祸乱，你是凶手肯定是逃不脱的了，至少也是帮凶。

什么叫宿命？这就是宿命。

韦君宜死前写过一本《思痛录》，里面记载了她麾下的一个 19 岁参加革命的转业军人李兴华的故事，这位李兴华壮志豪言说过在伟大领袖领导下“再不干还是人吗”一类的话，随后他也就被“干”成了右派，上级组织特意派了一个患有肺病的人看守他，结果他也染上了肺病，在后来的运动中，李兴华被整成了绝症患者。

者。可就当这位绝症患者进京鸣冤叫屈之际还对其他人讲：“当中国的右派也比当洋奴强”。

面对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说那样的宿命不分配给他们，分配给谁呢？

同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不在盐碱地扎根又在哪儿扎根呢？而马克思主义到底为何物，或许从翦大哥和李兴华身上也能看到一些了吧。

30.遇罗克牺牲的零意义

遇罗克牺牲的日子与另外一个刻意塑造的偶像雷锋的“生日”相同，都是三月五日。这两个三月五日虽然在日历上是毫无差别的，但施之于遇罗克和雷锋却有着霄壤之别，虽然这两个日子都经过那只被号称为巨手的人物，可至今他们身上的创痕与光环还是那样的泾渭分明。而且这种泾渭分明不独官方，即便在民间也是多半如此。从这个角度看，遇罗克的牺牲是零意义。

老百姓常讲“瓦罐离锅沿远一点”，遇罗克则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拼死要争一条真理出来。但他应该没看过曾国藩同他的幕僚赵烈文的对话，曾国藩说：“天下无真是非”。更何况在一片有着悠久传统的盐碱地上，试图种出大苞米更是一种奇妙的幻觉，而幻觉之后是毁灭，用鲁迅的意思表达“那简直是一定的”。

1968年初春，江青通过人搞陈小鲁（陈毅的小儿子）的资料，江青的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要通过他，挖出‘联动’的总后台。”江青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揪出‘西纠’的后台让你们吓一大跳。”同年4月13日，周恩来专门找陈小鲁谈话，问陈小鲁参加“联动”没有，陈否认，周又问有无“联动”思想，陈回答有。周说了一番大道理之后安排陈小鲁“下乡”，去东北，此前周已经与陈锡联通了电话，为陈小鲁的去处做了指示。离开北京父母身边的那一天的陈小鲁是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中带走的。

另据当事人回忆，陷入“西纠”、“联动”泥淖中最深的孔丹等人本已上了江青的必杀的清单，可最终却都能化险为夷，尽管孔丹等人的亲娘早已死于非命。

而距离孔丹、陈小鲁他们的“罪状”不过“一墙之隔”的遇罗克却没有这么好运，他最初被判十五年徒刑，遇罗克拒绝签字，其实本来人家也没有准备让他签字，因为死刑很快就批下来了。据遇罗克的同学牟志京回忆：“据说，他的死刑是经最高层亲自指示，并委托重要人物办的。”可悲的是，遇罗克被捕前夕曾亲

手将一封厚厚的密封的信交给牟志京“在今后情势允许时，请交给毛泽东”，遇罗克生前也曾极度敬佩毛的诗词，尤为欣赏《蝶恋花》。

《出身论》换言之就是“特权论”，再换言之便是“封建论”，也正因为这篇文章背后的如此引申意义，才让遇罗克不得不死。但遇罗克的罪名却不是“出身论”，而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刑事案件”（预谋杀害伟大领袖）。

当年引发“血统论”的谭力夫辈于今早已官拜副部，他老爹在文革初期被大字报渲染的那些个“花边新闻”谁还记忆犹新？老百姓今天提起老头子无非会说，那是老一辈，那是井冈山上下来的云云。而遇罗克的亲人呢？

小时候，从老爹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本《文摘旬刊》的合订本，很吸引我，以后每期我都从老爹那里取走，偷偷看（在大人眼里，不看教科书是为“不务正业”，所以只能偷偷看），连着三大本的《文摘旬刊》合订本让我知道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她叫遇罗锦，是遇罗克的亲妹妹。这三本《文摘旬刊》不知为何（我当时的确不知）总是长篇累牍地渲染遇罗锦的生活作风问题，在一个少年的我的眼中，这个女人无疑是《我爱我家》中那个“穴头”口中的“破鞋”。

若干年后，当我读到延安时期被黄克功一怒之下枪杀的女学员刘茜的家属在建国后的遭遇时，遇罗锦受到的“破鞋”的渲染也自然就不奇怪了。众所周知，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一直是作为经典教材出现在党史教科书中的，它作为反衬伟大光荣正确以及它背后领袖的卓越卓伦等等的必备课本所起到的作用很长时间里都是巨大的。然而，没有多少人或者说也不允许有多少人认真的去挖掘一下牺牲者刘茜的家属之后的境遇。可惜的是，还是有人关注到了，简单的说，刘茜的家属后来很惨。为什么一个被领袖公开宣布为被害人的家属后来竟然会那么惨呢？那就还要回到《出身论》上面来。

实际上，何止孔丹、谭力夫、陈小鲁等人，即便是黄吴李邱这“四大金刚”的后裔何尝不比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后代强得多？“西纠”、“联动”被覆灭时，有人曾经高亢地叫板“二十年后再看！”，这话没有说错，二十年后很多事情都如愿以偿地发生了。

还是他老人家说得好：“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在有的国家里，反封建反特权永远都会碰壁的。所以，大师夜观天象后告诉我们说：“没啥悬念了，洗洗睡吧。”

俄共当年处于地下传销党状态时，很多领导人都给自己披了个马甲，便于在删帖封号之后很快便能转世。那时候的罗森菲尔德与一个叫朱加施维里的青年人关系很好，他们俩在商量新马甲时，罗森菲尔德为了表达自己狂热的传销意愿，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加米涅夫”，意思是石头。朱加施维里也给自己搞了件新马甲，叫“斯大林”，意思是钢铁。若干年后，当加米涅夫这块石头碰到斯大林这枚钢铁时，立马粉身碎骨，再无转世的可能。

在布尔什维克群雄并起的日子，斯大林的确算不上翘楚，他既不能与斯维尔德洛夫的兼收并蓄相比，也不能同托洛茨基的张牙舞爪相掎。但是，他却被列宁看作是备胎之一。为什么？因为列宁看重斯大林的性情中的翻脸无情，这一点与列宁本人非常相似。俄共草创之初，需要的就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玩命爆破的农村包工头。他们虽然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可绝对能够彻底毁掉一个旧世界。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中最早提出对普通民众执行烧杀政策的就是斯大林，尽管这一条后来被人们用史料试图证明并非出自列宁本意。然而，事实是在列宁健康的主持俄共中央工作期间，这个恶法一直得到贯彻和执行。

不过，列宁没想到斯大林的翻脸无情很快验证到了他们两口子身上，还在列宁健在时，斯大林就已经臭骂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强烈要求斯大林道歉，斯大林应景般地做了个样子。而加米涅夫他们则规劝列宁不要动气，斯大林会改好的。

也许受到这件事的刺激以及相关事件的观察，列宁给斯大林的评语中加重了“粗暴”这个词的定义。可惜的是，列宁大概是被梅毒烧坏了脑子，在俄共高层中，谁人不粗暴？是托洛茨基吗？是捷尔任斯基吗？是奥尔忠尼启泽吗？包括后来被害身亡的基洛夫，哪个不粗暴？所以，还是斯大林自己解释的最好：“我的粗暴是指对敌人的粗暴”。问题是，敌人是谁？谁说了算呢？

瘫痪失语的列宁对于日渐崛起的斯大林无能为力。而与斯大林共事的诸多高层领导人们也没看出斯大林到底有多么粗暴？更多的是这位总秘书经常表现出的木讷和沉闷让他们无从指责。相反，倒是托洛茨基锋芒毕露，几乎就是以列宁接班人自居。

列宁时代类似于盐碱地辫子兵的努尔哈赤，由于老头子一股独大的局面，不愿意过早扶植与指定接班人，老头子更希望看到的是他身后出现共治的局面。故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列宁的遗嘱中对于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鲁祖塔克、皮达柯夫等等，都是布满了负面的点评也是不足为奇的。

诸如这种重量级的老头子大抵过于轻信自己的权威了，他误以为凭借自己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手势，芸芸众生便可以落实指示不过夜。殊不知，“背叛”早已悄悄滴进村了。

托洛茨基回忆说，有一次列宁对他讲，如果“我们”（指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在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挑起担子吗？

这个回忆其实是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列的，且也仅仅出自托洛茨基一人之口，历来被苏共传统史家所轻视。但他们也承认一点，即斯维尔德洛夫无疑是列宁接班体系中的首选。不过，斯维尔德洛夫早死，这件事遂成泡影。退一步说，即便斯维尔德洛夫不死，以他犹太人的出身是否可以成为阻碍斯大林前进的绊脚石也未可知。

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托洛茨基是斯大林上位的最大的拦路虎则属不争。而且，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托洛茨基的人马已经布列要津，列宁强行改组并设立中央书记处，其针对性便是冲着托洛茨基来的，列宁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生前坐大。

正是因为列宁的改组书记处，将斯大林推出，这才有了斯大林得以起家的关键头衔—总书记（总秘书）。

中共八大前夕，毛为邓评功摆好，说过一段话：“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毛的这段话也就为斯大林当年的职务做了最好的注脚。

当初，俄共中央政治设计均为列宁一手操办，之所以叠床架屋设立了书记处，一方面既是遏制托洛茨基权势膨胀的手段，也是为了处理日渐繁琐的党务工作所需。书记处说白了就是护士站，总书记也就是护士长的角色。因中央另外设有组织局，书记处并不能过问组织人事方面，用杨尚昆的话说，便是“听用”。

只不过，列宁千算万算，没有想到的是斯大林这头咬人的狗从不露牙，他默默地做着书记处的工作，却日积月累地将总书记变成了“摄政王”，把书记处变成了“常委会”。而也就在这时，斯大林的牙齿终于露了出来，列宁发觉并将之定义为粗暴，可惜已然晚了。一则列宁本人由于身体原因不可能重返莫斯科主持大局清洗斯大林（或许列宁本人也从未如此严重地考虑过）；再则，书记处声望日隆，一批高级领导人已经被斯大林所折服，折服的理由之一或许正如加米涅夫本人乐观地认为的那样“他（斯大林）会听从我们的劝告的，他离不开我们大家”。

托洛茨基也看到了斯大林暴露出来的尖齿利牙。可是，人们此刻更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早就呲出的大龅牙，同时人们也误以为斯大林之所以露牙正是为咬嚼托洛茨基。

于是，一切就都不可以挽回了。

在基洛夫奉命接掌列宁格勒以后的一次聚会上，包括基洛夫在内的党内高级领导人都约而同地谈论着一个话题，那就是没有了列宁的日子里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由集体来领导党。这时，斯大林发话了。他说：“不要忘记，我们住在俄罗斯，一个沙皇的国家。俄国人民喜欢国家为首的是某一个人。”

斯大林的这番话让在场的人错愕不已。因为大家都清楚，在刚刚结束的针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正是斯大林高举集体领导的大旗一举挫败了托洛茨基幻想接替列宁成为下一个“伊里奇”的“图谋”。而且也正是这个斯大林信誓旦旦的向大家承诺，只要他继续担任总书记，就永远不会出现一个活着的列宁。

然而，现在呢？都懵逼了。

其实，尽管俄共党内异口同声地赞美着列宁，但没有哪一个人愿意一直接受这样的人物的领导，毕竟这位领导人太过精明、太过残酷、太过凶狠。他们更希望是“共治”，是“和衷共济”，是“九龙治水”。所以，当托洛茨基露出要成为又一个列宁时，大家都忘了列宁对他们的关于“斯大林太过粗暴”的告诫，在他们看来，眼前的托洛茨基似乎更“粗暴”，似乎要让他们回到列宁领导的轨道中去。于是，他们集体把屁股坐到了斯大林的一边。

历史上很多暴君或者专制极有特点的统治者在遴选接班人时，往往会去选择弱智的“儿童团”。比如唐太宗选择了李治、爱新觉罗·弘历选择了永琰，斯大林选择了马林科夫，毛选择了华国锋等等不一而足。内中的道理，我们在上面的阐述中已经给出了，独裁者本人不希望生前有一个“分杯羹者”，独裁者的麾下不希望再出一个独裁者。

而几乎所有人都忘了这句老话—咬人的狗不露牙。一般说来，在独裁者完成全套程序之前，他都是以平和的面目出现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被这种假象蒙骗了。俄罗斯著名的保皇党人舒尔根在1920年年底同别人谈话便指出，所谓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无非是为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上台做准备条件。但成为这位君主的一定不会是列宁或托洛茨基，因为他们不敢抛弃他们的信仰，信仰是他们的精神包袱和枷锁。而这时候会出现一个人，他将继承列宁的残酷无情，继承列宁的“法令”，却不必继承列宁们的精神包袱。

舒尔根的话过了十年，他心目中的全俄罗斯专制君主终于诞生了。

顺便说一句，在本文开头中提到的那次聚会上的所有人，除了斯大林以外，剩下的都被提前消灭掉了。这大抵从他们各自的傻逼表情中就能窥出端倪。

在一次斯大林同他的比较亲密的朋友们的聚会上，大家各自表演一个小节目自娱自乐。轮到斯大林的时候，总秘书唱了一首格鲁吉亚小调。这个小调不是日本人的《拉网小调》，而是格鲁吉亚人的约炮小调，内容之黄色低俗不堪入耳。尽管像奥尔忠尼启泽这些人几乎与斯大林一样保持着对粗俗的东西的足感兴趣，但他们或多或少还要兼顾一下在场的女人们的情绪。可总秘书丝毫不管

那些，他不仅唱完，而且明显陶醉其中。于是，连奥尔忠尼启泽的老婆在内的不少女性朋友都有些脸红有些难为情，自然也就无法为总秘书同志的引吭高歌喝彩叫好。

过了几年以后，大家发现，在这次聚会中除开斯大林以外的所有人都被处理掉了，连女性也不例外。奥尔忠尼启泽的老婆是斯大林老婆娜杰日达的闺中密友，斯大林留给她的最后评价则是：“闭上你的臭嘴，你个蠢货”。

作为一名低俗的人，如何才能让他变得高雅起来呢？最便捷的方式便是把他放在更低俗的人群中。

据苏共党史研究者发现，斯大林时代的主要镇压机器—内务部（以后一分为二，一为内务部，一为克格勃）的重要侦讯人员包括高级干部，其文化水平都相当低下。在他们中间甚至真的闹出过“把李时珍给我弄来”的笑话【该笑话描述盐碱地第一次文革期间，说是王洪文接见外宾，外宾谈及对李时珍的仰慕，王洪文当即下令“把李时珍给我弄来”。借此讥讽文革新贵的无知。】。可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怎么看”，即总秘书同志如何看待。

缅仁斯基之后提拔起来的所谓“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亚戈达，好歹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好歹还算是高尔基的好友，好歹还有那么点“文青范儿”。更主要的是亚戈达本人是列宁亲手指定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十三位成员之一，资格摆在那儿。

但是，斯大林在 1936 年会同日丹诺夫给莫斯科的指令性电报中却是如此评价亚戈达的——“亚戈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随后亚戈达就被干掉了，继之而起的是瘦小的叶若夫。

叶若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而且从未在情报、保卫机关中工作过，他最初发迹的起点是宣传处副处长。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学生出身的人亲手下令抓捕的“人民公敌”是亚戈达在任期间的三十倍。

就在叶若夫红的发紫之际，一位戴着平光镜的男人悄然地走进了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的办公室并成了这里的主人，他叫贝利亚。

不论是亚戈达还是叶若夫，他们都还算是早期投身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的。而贝利亚的出身背景却比以上两人可疑的多，这种怀疑在贝利亚高居榜首时就已经有人提了出来，并被总秘书斯大林收藏了起来。换言之，总秘书对于贝利亚的“历史问题”了如指掌。

不过，贝利亚的运气明显比他的前任好的惊人，居然活过了总秘书。贝利亚之所以活过了总秘书也并非由于他的运气，也并非由于总秘书的心存不忍。只是因为他比他的前任更为凶残地完成任务，乃至比他的主公还要凶残地提前预知下一次清洗的时间表而已。

倘若把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作为衡量底线的有无以及品行的高下的唯一标准，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比如贝利亚就比亚戈达、叶若夫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但无疑也比他们哥俩更凶狠。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斯大林在消灭了列宁的“老近卫军”之后提拔的一大批领导人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受教育程度较低，至少比那些被消灭的人们低。这绝非偶然。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后举行的私人宴饮活动中，领袖无论是唱什么样的小调，迎来的永远都是高倍的喝彩和雀跃。

卫国战争初期，用人孔急。航空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和他的战友们对掌握莫斯科的制空权没有足够的把握，他们决定冒险替已经被捕的副人民委员巴兰金求个情，这如果不是在非常时期，这几个人就是再给他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生出这样的念头。

在他们哆哆嗦嗦的说出自己的请求，请求再次审查（连释放都不敢用）一下巴兰金副人民委员的案件时，总秘书斯大林绕着办公桌走了半圈然后说：“他被关押四十多天了，没有一点供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想请问一句，这到底是谁干的？”没人敢回答这样的鸡巴问题。第二天，副人民委员负责飞机发动机的巴兰金已经穿着制服坐在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这样的情景其实还在不同的场合下重复上演过。例如三十年代末，大镇压刚刚结束，斯大林在询问有关战斗机性能时，发现了两位负责讲解的工程师是被内

务人民委员部羁押的在编囚犯，总书记忽然问他们：“在这里你们不受到迫害吗？”在场的所有人顿时都惊呆了。

1947年，斯大林在自己的别墅里招待了一位高级将领，他关切地问候：“听说你不久前还被关着呢？”高级将领受宠若惊，一时间说走了嘴：“是啊，我的问题才查清楚，刚被放出来，但有些同志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留在了那里，永远的。他们可都是些优秀的人才啊。”斯大林重复了将领的话：“是啊，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当总书记背着手离开后，马林科夫等人怒不可遏，痛骂这位不知趣的高级将领，而且，大家普遍认为今天的“瓜落”是吃定了。可是谁也没想到，总书记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两束自己亲自采摘的玫瑰花，他把一束送给高级将领，另一束转托这位将领送给她的妻子，并带去总书记温馨的祝福。

众所周知，图哈切夫斯基和乌波列维奇都是在总书记亲自关照下处决的要犯。然而，不止一个人听到过总书记在他们的身后是这么谈及这两个人的。斯大林说：“不可否认，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军事天才”。斯大林还说：“乌波列维奇不在了，但你们要像他在的时候一样训练部队。”

这就回到了一开始总书记的提问了：“这都是谁干的呢？”

1940年夏，斯大林同雅科夫列夫闲谈时说：“叶若夫是个坏蛋，他在1938年害死了很多人，所以，我们把他枪决了。”

看来是叶若夫干的？可惜，贝利亚生前未能按照总书记的指令焚毁所有有关叶若夫的私人档案中分明有着一份记录，是叶若夫请示斯大林的报告副本，叶若夫请求将嫌疑人一律进行调查，而总书记的批示是：“不是调查，而是逮捕。”

在布尔什维克的字典中，调查就意味着逮捕，至于逮捕则必须意味着处决。

每当总书记干掉一个又一个凶手，清除掉类似亚戈达、叶若夫这样的鹰犬时，总有些傻逼们要振臂高呼，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坏事都是亚戈达叶若夫辈干的。

关于这一点，还是总秘书自己看的很透彻，他在拿破仑的宠臣，警察头子富歇的传记俄文译本上写了这么一行字：“他愚弄了所有的人，他也骗过了所有的人”。

赫鲁晓夫虽然清算了斯大林，但没有妨碍在叶利钦之后又出现了约瑟夫二世。今天，这位约瑟夫二世明目张胆地告诉俄罗斯民众：“你们如果不继续选我，那就只好去选斯大林了。”

这倒让人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党胜选时的那句口号——如果你们不选择阿道夫·希特勒，那么你们就必将选择战争！

事实上，这是个单选题。

俄国人在上个世纪选择了斯大林，这个世纪选择了约瑟夫二世；德国人在上个世纪选择了希特勒，这个世纪选择了默克尔。

这到底是谁干的呢？

盐碱地长不出大苞米，这都是傻 X 们干的。

32.斯大林不够成熟的地方

提起前苏联在 1937——1939 年发生的“大清洗运动”，一般说来都会心有余悸的。那场骇人听闻的屠杀到了 1939 年终于有了点松动的迹象，但随着前苏联国家档案的陆续解密，任何之前被认为“松动”的看法也“松动”了。因为就在 1939 年的 1 月，斯大林签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的一封密码电报。电报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

1937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工作中采用体罚手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一种手段。”

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的报告对于“体罚”做了点侧面的解释工作：“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 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鲁哈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 是人民的敌人！’”

日后，这位说过“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的鲁哈泽少校被捕后说这位瓦西里耶夫夸大事实，因为“只有在夜里才打人，白天有来访者，没法打人。”

看到这里，我们不免感慨啊，多么不成熟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啊，为啥他们这么不成熟呢？因为他们有一位不够成熟的领袖斯大林同志。这位这位领袖亲笔签发允许“打人”的密电。叶群的名言是“千年的文字会说话”。《我爱我家》中老干部傅明老人的格言是“怎么能留文字的东西呢？”

若干年后，也有一件事在“浩劫”中发生了。中国的铁道部的副部长刘建章“文革”中受到非人的迫害，他的妻子给领袖上书，领袖，领袖看后勃然大怒，批示道：“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到底是“谁人”规定的呢？原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在回忆录中记述这件事时如此写道：“刘建章夫人刘淑清同志把监狱的情形写了一封信，通过王海蓉递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看了居然无所顾虑的批示。”

为何用“居然毫无顾虑”，李一氓没解释。李一氓接着针对毛的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又提出了点疑问，他说：“毛主席批示说这种法西斯的方式是谁人规定的，我自然更无法知道是谁人规定的，可是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是他规定的。当然我也不能随便猜想是谁人规定的，大概只有将来搞毛著注释的同志会有名有姓的指出这是谁人规定的了。”

可见，至今也没有人能出个子丑寅卯来，到底“谁人规定的”，也许正如领袖临终前所言：“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无独有偶的是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回忆乃父被“处理”时的一段情节也很类似“3月10日，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的报告送至叶群处。其中写到：‘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十六（日）。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接下来是周恩来批的五个字：周恩来已阅。（原件没有注明日期）”

为此，张胜也发了感慨：“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

当然也有不懂艺术的。3月24日，林彪说：“比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账，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这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

不够成熟的和不懂艺术的如今都臭不可闻了，而成熟和艺术自然也就永垂不朽了。

33.斯大林他妈问：“中央书记是多大的官？”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请他老娘去看他的新房，房子布置的很豪华。总书记不无得意地问老太太观感如何，老太太说：“列昂尼德，好是真好，但我有点担心。”总书记就问老娘担心什么。老太太说：“万一有一天布尔什维克回来了怎么办？”

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老娘居然问共产党回来了咋办，这显然是个笑话。但接下来发生的这段故事就不是笑话了

1935年10月17日，在联共十七届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斯大林去看望了他老娘叶卡捷琳娜·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当时尽管没有继续联共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模式成为联共中央总书记，但在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中，斯大林都排名第一，也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总书记。当然，正式官称是“中央委员会书记”。

终生信奉东正教的朱加什维利老太太并不清楚儿子到底当了多大的官，只是看到警卫随从乌央乌央的。就不禁问道：“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斯大林回答：“中央书记”。老太太又问：“中央书记是多大的官？”斯大林问老娘还记不记得沙皇？老太太当然记得。斯大林于是就告诉老太太说：“中央书记就跟沙皇差不多。”

老太太终于明白了中央书记是什么的干活了。等到斯大林走到门口时，老太太感叹一声：“可惜啊，他（斯大林）到底没有当上神甫。”在老太太的眼中，东正教的神甫无疑是最为圣洁的象征。可她哪儿知道，尽管儿子没有当成东正教的神甫，却成了另外一个教派的教皇。

无独有偶的是，若干年后，法国文化部部长马尔罗采访大毛时，问过大毛，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大毛肯定地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

御用文人们总是喜欢给他们的主子涂抹各色的油彩，将其狰狞的面目罩上华丽的外套。反倒是有些颇具个性的主子偶尔之际不惮以真面目示人。斯大林和大毛无疑是他们中间的比较有特点的两位。

十多年前，有人写过一篇《苏共亡党十年祭》，因为属于命题作文，所以也很难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苏共之所以能亡党，而盐碱地至今还在活蹦乱跳，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斯大林和大毛各自诠释自己的官衔之中。

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突击再到亚历山大一世的猛进，说到底是要追随欧洲前进的步伐。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封建专制的毒素一方面逐渐消退，另一方面则被近现代专制主义所取代，直到列宁斯大林时代才基本完成了现代专制的基础模式。说的通俗点，苏俄的现代专制的基石不是由最凶残最落后最残暴的封建奴隶制作为最广泛的铺垫而成的。也就是胡适眼中的“有面包无自由”。因此，一旦有一天面包成了问题，大家当然要起反了。

然而，盐碱地自古以来的深厚夯实的残忍的封建宗法与现代专制一经结合，很快锻造成新版的空前强化体系，所谓的“既无面包也无自由”。有的只是泔水，俗称猪狗食，即便是这样，也要“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但是，盐碱地上的屁民却从来都是甘之如饴。只有到了一天连猪狗食都吃不上，这才想到起反。而起反的目的无非是换一个喂猪的而已。所以二毛才会总结说：“老百姓只要有一口饭吃，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盐碱地的现代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阶段的表现形式是上层完成家族化的更替，基层完成黑社会化的布控，基本消灭中间层，普通屁民只有服从的份儿。这也正是盐碱地不同于苏共的地方，也正是它“顽强”的“生命力”所在。

34.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涵义

少年时代看过一本连环画，叫《商鞅变法》，这本连环画应该算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余孽”，里面充满了所谓儒法斗争的套话。只是这本小画书的结尾页留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源自于一句话：“商君虽死法未变，秦皇终奏统一功”。

满清囫圇以后，腾挪出来的巨大的权力空间环顾域内，一时还没有哪个个人或者团伙可以完全填充。袁世凯携北洋诸将最多也只是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地盘。南方则立宪革命各有分野。这一时期，表面上看大家都被统一到一个认知下面，即帝制同共和势不两立。但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帝制仅仅表现为称皇帝这一项上，如果皇帝换作大总统，哪怕大总统世袭，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老袁偏偏不接受。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袁虽说口头上对立宪君主很向往，可实际上接受的还是家天下的理念。且盐碱地也只承认这一种理念。同样的道理在同盟会方面也不是没有过，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等人逃往日本另起炉灶曰中华革命党，孙文意见是这个党的党员必须按手印承认只服从孙文一人，经胡汉民等人调解，改成只服从党魁一人，却遭到陈其美的硬性反对，而孙文终究听了陈其美的意见，孙黄就此分道。由此看，不仅在朝的袁世凯要搞一人一姓，落败的孙文也未能免俗。

事实上，两千多年来，盐碱地众多屁民所能适应所能理解的也只有一人一姓。这玩意儿最对胃口。

举个例子，比如第一次文革期间，号称“宁吃社会主义的窝头，不啃资本主义的面包”，这句话在当时便于民间引发反弹，因为屁民再猪狗也能琢磨明白，窝头

肯定不如面包。梁家河大队书记用面包（据说是过期的）喂狗的事迹一直成为后来书记本人接受采访时首先谈到的话题，于此也可见一斑。

可是，倘若把这句话换一下行头，比如改成“宁给祖国当牛做马，也不为洋人鸣锣开道”，或者宁做中国人的右派，也不当外国人的洋奴。怎么样？立马一多半人都含糊了，觉得有道理啊。

再换一下门面，换成“宁可砸烂国宝，也不让洋人买去”，这样估计全体傻逼都会举手赞成了。

因此，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话题，只要有人不称帝，只是把老大的名字改一下，或叫大总统，或叫党魁，或者叫总秘书一类的，人们自然可以接受。假如还适当地饲料精加工一下，即常说的经济搞一下，那简直算是天上人间了，不跟着跑才出鬼呢。

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这副对联活生生地刻画出老袁玩完的深刻背景。

老袁称帝失败绝非教科书中所说“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在盐碱地能深入人心的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主子我为奴”，哪里存在过什么共和国观念。

举凡要搞大事，都要搞小团伙，林立果给它起了个好名，小舰队。老袁的小舰队有两个，一个外宣办，即筹安会，一个内务部，即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

老袁很清楚，他要称帝，首先不服的是段、冯。这样也才有了模范团，有了陈宦出京等等。可惜老袁父子太着急了，起码应该让后起之秀再起一起，让先入关者率先囮屁才对。

不过，老袁虽死，却留下了一个庄严的课题，接班人到底是谁？别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老袁的死证明了一点，左右大将都靠不住。也证明了另一点，尽管

左右大将靠不住，但也还是能做到“活着不孝死了乱叫”的地步，老袁送终礼数最大，连一贯看不惯段祺瑞的袁克定都承认“得亏总理”。

老袁死了，可衣钵犹存，后继者又都在重复老袁的功课，有半途而废的，例如孙总理中山，也有完成但仅仅及格的比如蒋总统中正。当然，还有完成一半却被洋人给掀了桌子的蒋总统经国等。

然而，他们各自的法术和力度比起大毛来，实在不值一提，深得盐碱地传统文化渗透的两千年来首推秦始皇嬴政，这爷们属虎；其次则是大毛，这爷们属蛇。

正所谓，虎头蛇尾。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前夕，素有“权力摇篮”之称的清华附中的校长把一批包含了不少干部子弟在内的红五类分子找去训话，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比别人更严格的要求自己，时刻准备接老一辈革命者的班，决不能让印把子在你们手中丢掉。”

这段谈话或多或少地揭示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某种核心动机和手段，但这还不够，因为毕竟一个区区的清华附中校长算不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成员。

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披露了查抄毛家湾后获得一盘录音带中叶群与黄永胜之间的谈话，内容涉及到了各自后代的安排上。叶群说：“要考虑，每个孩子往哪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起，至少有五个吧，连新朝（吴法宪之子）六个，这五六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通过叶群、黄永胜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打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号的运动之矛头所指了。

一言以蔽之，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就是夺权，但夺权不是目的，夺权只是手段，夺权的目的是三个字——家天下。关于这一点，九大的政治报告开宗明义就说过：“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那么，是不是只有到了第一次文革时，无产阶级司令部才考虑到了这一点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文革前流传的某位领导的《海儿录》、柯庆施的遗嘱以及刘少奇把年仅 15 岁的儿子送去参军站岗等等历史镜头中都可以看出，集体接班是既定方针，诚如这些子弟们自己宣称的那样：“我们不接班谁接班？”

然而，第一次文革暂时中止了这段梦想。然而，这并不是说文革不是要否定血统论，相反，它是进一步强化血统论的最高级范本。可惜，文革的血统论范围更狭窄更专一，它的圈子仅限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统帅、副统帅。而且，时隔不久，副统帅囫屁朝凉，大权最终定于一尊。

换句话说，第一次文革的失败源于两个主因，第一，彻底横扫了集团内其他几乎所有家族的势力，做到了一股独大；第二，接班人羸弱、颞颥。

前者动了掌权的左派们的奶酪，必然导致反扑；后者因接班人的无能和被捕，必然成就了反攻倒算的成功。

可是，正如反毛的急先锋林彪家族所宣示的那样，用自己的子弟守大门。那些推翻文革的“还乡团”虽然表面上埋葬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果实，但第一次文革核心的衣钵却被基本完好无缺地保留了下来并得以继承。这才是我们主题中的那前半句话“商君虽死法未变”。

而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因为第二次洋务运动的到来中断，所谓“秦皇终奏统一功”，接下来的演绎让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洪宪百年后的又一场大戏。

鲁迅的若干文章中最喜欢的首推《隔膜》一文，多次读过还有再读的冲动。

冲突是怎么来的？现代人解释为缺乏沟通和理解。此为“隔膜”，但有些问题不是缺乏沟通和理解，而是无法沟通，更遑论理解。

现在不妨回顾一下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的某些情形。

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的很清楚，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一句话，就是“夺权”。

夺谁的权？夺下层的生存权，夺上层的议政权。

有人或许要问，毛已经如日中天，还怎么夺权？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市委书记不可能撤换市长甚至副书记、副市长的职务，最多只能调整分工。换言之，中共中央主席无权撤销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甚至不能随意撤销常委。

然而，文革这场运动却帮助他做到了。

现存的毛远新的黑皮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 1976 年 4 月 7 日上午 8.05-9.15 分之间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段谈话，事涉中央高层的全部政治安排。

主席：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注：这四个字为毛远新亲笔描述）

我（指毛远新）：应该干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不要约苏振华。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罢免邓的“三副一正”（指其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长的职务），以资历最浅的华国锋取代周、邓出任名义上的第二号人物，这种类似地震一般的大动作本应由常委会拍板决定，不料却在伯侄之间的一场对话中敲定了。

这在文革前是可以想象的吗？

但在文革中，这是最正常不过的。

毛拥有无上的权力，这不假。然而，这个权力及身而止。毛自己也同蒙哥马利等人谈过，在他退下来后，要由党内其他几位同志接班，这说明终身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文革解决的就是终身制问题。

然而，什么是终身制？关于这一点，毛、林各有其不同的理解。

在林等人看来，终身制是毛死后由他们来接班；

在毛江看来，终身制就是世袭制。

这里就出现了隔膜。而且是无法沟通的隔膜。

为什么说无法沟通呢？

道理也很简单，所谓大道至简。毛发动文革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倒一个刘少奇，再扶一个林少奇上来，用江青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期间说的话就是：“主席他说

过，不要黄袍加身”。况且，众所周知，在林彪的身后还有一个林立果。合着费了半天的气力，难道是给你们林家父子打天下吗？熟饭给人吃难道会是毛的风格？

而在林彪这边，又是另外一番计较。林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很清楚，刘邓等人并无大过，之所以打倒他们，无非是换马。自六十年代初开始，林便不遗余力地襄助毛逐次剥笋乃至达到换马的目的。俗话说，脏活累活都干了，不愿意干的也干了。能白干吗？会白干吗？

酬庸来了，接班人。林彪家族自认为接班是天经地义的。舍我其谁？

其实，毛、林的这场冲突，并非原创，实则再版，是袁世凯同冯国璋、段祺瑞内讧的升级版。

张作霖事后多年同徐世昌、曹锟、靳云鹏说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张作霖说：“项城要当终身大总统也好，洪宪皇帝也罢，我们都没意见，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穷光蛋，没有项城就没有我们。可他也不回头看看他的身后……”

老张的话点的很清楚，你袁世凯当到死都没问题，问题是袁克定这帮混蛋凭啥接班？

这个问题在林彪身上一样适用，毛在一天，就是毛说了算，毛不在了，凭啥江青说了算？

那么，国家主席呢？不过是投石问路的小石头。毛经常说，一个小石头可以砸烂大水缸。

的确，这个小石头确实砸烂了大水缸，毛、林都死在了这枚小石头上。

在毛来说，设立国家主席就是诱饵，一下子就可以钓出来别人的胃口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要“黄袍加身”？

在林来说，如果连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这样刘少奇都啃剩下的骨头都舍不得给，那么接班人算个鸡巴？

所以，如果没有上述的史识，反而去捕捉那些细枝末节，当年这起争斗也就无法解释其应有的运行轨迹。

陈伯达完蛋后，毛专门同林讲过，不要设国家主席了，两个主席会打架。林没有吭气。

也就是说，这个话题是永远无法在他们中间进行沟通的，隔膜是注定的。

江青说不要黄袍加身，说出了毛的心里话；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也说出了林彪的心里话。有人后来考证说叶群的这段话是后加上去的。退一万步说，即便这句话是叶群没有说过，但事实不是如此吗？林彪的确存在一个往哪里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经设立国家主席这个小石头挑破，便热闹起来了。

说到底，终身制如果没有世袭制配套，那么终身制就是一场梦；而终身制必然导致世袭制，这也应了邓二毛的那句话，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形势使然。

而另一种配套工程也要同时启动。

那就是，只要有袁世凯，那就一定会有冯国璋、段祺瑞；只要有毛泽东，那就一定会有林彪；只要有薄熙来，那就一定会有王立军。

终身制是绝路，世袭制是这条绝路的尽头。

35. 一个上访者的足迹—对胡耀邦冥诞的慨叹

胡耀邦去世那年，我正上初中。当时看报说包括王光美在内很多曾经挨整的人都跑到胡家去敬献花圈花环等，感到跟自己以往被灌输的信息有明显的不同。

因为之前总是被告知平冤狱那是邓的“绝活儿”，胡不过是在邓的支持下完成具体的工作而已。后来戴煌的那本纪念胡平反冤假错案的书出来后，对于胡的这段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老戴晚年曾想再版这本书作为提醒做文革迷梦的人们的一柄利器，却被有关部门“睿智”地制止了。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为若干人群平反的老人在他的生的最后关头竟然也成了一个上访者，有人回忆说胡晚年每逢提及邓、陈，均不直接点名，只能忽而摸摸左耳，忽而摸摸右耳，以打哑谜的形式表述自己那点子可怜的看法。而这位最高级别的上访者并没有在临终之际等来他想要的结论，好在“好饭不怕晚”，在胡去世 26 年后，也就是他的百年冥诞，他的上访的呼声终于得到了部分回应，他的家属再一次得到了组织的部分关怀，其关怀阵容之强大，为华国锋安葬以来所仅见。有人因此又瞎鸡*激动了，说什么这个那个的，但很快也被有关部门“睿智”地封了微博账号，踢进了转世的行列。如果胡在天有灵的话，看到此情此景，不知该作何想？

陈丕显、谭启龙等人的回忆录里都曾经热烈地回忆过他们在苏区同胡耀邦一道成为“上访者”的灰色事迹，并为差点提前成为身份不明的“殉道者”而感到庆幸，庆幸之余又萌发对组织的更深一层的热恋和点赞。然而，岁月荏苒，时代并没有忘却他们的纪念，苏区一别三十年后，他们老哥几个再度成为上访者，陈丕显、谭启龙深陷“牛棚”自不必说了，胡耀邦本人的日子在“文革”的激情岁月中也很难过。龙潜的女儿小贝后来回忆说她去见胡，胡用手指头指着天，意思是说不在于别人怎么看他，关键是毛怎么看他。假如把这段场景同他摸了左耳（陈）又摸右耳（邓）的动作联系到一起的话，可以得知，胡至死都没有放弃自己对组织的绝恋。

而事实上，包括胡本人在内以及他的身边人都更看重的是组织对他们的结论与评价，至于其他人等，就不要自作多情充当分母了。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关你屁事”。

今年的胡诞有些巧合的是，小邓（邓力群）也迎来了百年冥诞，一前一后，交相辉映，引发左右两派粉丝再度拌嘴。其实，两相对比，胡耀邦和邓力群都是组织的“铁粉”，而且是那种非常纯粹的“粉”，他们忠于组织的决心和程度远要

比某些“秀外慧中”的大佬们来得实诚。吴江回忆说邓力群以发烧之躯力疾从公为陈云编《文选》，而作为平冤狱的主角之一的胡耀邦在宣传部的例会上也说过：“我们每个老同志都有一本老账，只有亏欠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到处算老账，天下要大乱。”的话，他们虽然各自出发点未必相同的苦心孤诣却同时都指向一个出口，那就是希望组织的江山“红万代”。所以，今天胡乱掰扯什么左啊右啊这类概念的网民真的可以歇一歇了。组织的江山真心讲跟你们没啥关系，那都是人家的家事。司机高兴了往右拐，不高兴往左拐，你要是没死的话，就卯足了劲睡觉吧，别试图评价历任司机的好赖。

胡少年时代同表哥杨勇一起爬墙头看“闹红”，就此立下“素志”，表哥杨勇在浩劫中被打倒，叶剑英说：“对杨勇，上峰的意思是烧焦”，徐向前很幽默，他说这个上峰是林彪。陈先瑞的补充回忆更幽默，他说一开始上边问了杨勇哪去了，谁搞的，大家还都在查，后来汪东兴出面说不要查了，不要问谁搞的了。于是，答案就出来了。表哥杨勇劫后余生，跻身高层，惜乎浩劫留下的宿疾要了他的命。他死后六年多，表弟胡耀邦也追随而去。他们的葬礼都办的风风光光，他们的身后也都有模有样，但回顾他们一生上访的足迹，即便是专业粉丝也要为之唏嘘，至于说有朝一日真能编成“青史”的话，回答这个足迹的声音一定是两个字。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唯一落实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上访已经成为有的民族不可撼动的基因，它注定成为这个民族的每一个分子的宿命。

36.两组一会—文化大革命中三个重要的“爪牙”

盐碱地自古皇权扩张之路总是具体体现在同麾下的组织架构的拆解分和中。历史上的“两组一会”便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所谓两组一会，指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以及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

中央文革名义上由大毛的老秘书陈伯达主持，其实是江旗手执掌。中央军委办事组先是杨成武领衔，继而改由黄永胜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则一直由主任亲自领导。

这三个互不统属的机构也恰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格局。

中央文革由江在后台摇动大旗，实则是毛掌控；军委办事组更是林彪的私产；中央专案属于事务性工作，周当仁不让。由此可以看出，王张江姚辈不过是小四人帮而已，毛、林、周、江才是扛旗的主角，其中毛无疑是纲，纲举目张，仅此而已。至于康生诸人，说穿了，都是跑龙套的。

文革小组专司放火烧荒，军委办事组为弹压维稳，专案委收齐章程。三股力量表面上看互不干涉，实际上都汇入一条大河，即一组。也由此派生出另一个怪物，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称中央碰头会。虽然啰里啰嗦的，到底还是军机处奉上谕的翻版。

毛以反官僚主义作为号召的旗号，其实质则是彻底端掉盘根错节、叠床架屋的机构，大道至简，为的能够顺利一竿子捅到底。两组一会也正是应运而生。

但万事都是荣枯与共的，当初为扳倒刘等人，四人安坐一架马车，待到大事底定，还要率复旧章的。“九大”前夕，毛公然宣布恢复常委功能，取消中央文革，并将毛远新李讷下放，暗示林彪也要放弃军委办事组。林彪却装聋作哑，继续维护办事组声望。

“九一三事件”后，军委办事组自然不复存在，文革小组虽然借尸还魂于组织宣传组，可毕竟声势弱了很多，唯独中央专案委，由于黄永胜的倒掉，谢富治的死亡，几乎成了周家店。之后批林批孔批周公也就不难想象了。

时至今日，林、江早已批臭，然而毛、周依然在，且几度夕阳红，于此可知劫数。

